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東北亞外語論壇

No.3, 2018 Volume 7



Periodical of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期刊

Included in CNKI
中國知網收錄



ISSN 0025-7249



9 770025 724694

刊號：ISSN0025-7249



第四次SIBT在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舉行

2017年12月30-31號,第四次商務翻譯和外語教學研究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簡稱SIBT),在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舉行。

該論壇由香港恒生管理學院發起,旨在促進兩岸四地的商務翻譯學科建設和商務外語教學的發展和交流。第一次論壇(原名商務翻譯高端論壇)在香港恒生管理學院舉辦,由該校常務副校長兼翻譯學院院長、中華商務翻譯學會名譽會長方梓勛教授擔任論壇主席。然後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論壇。第四次論壇由商務翻譯和外語教學研究國際論壇組委會主辦,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和高級翻譯學院聯合承辦,此論壇會刊《商務翻譯》編輯部和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協辦。

第四次論壇前,經協商後將論壇名稱改為"商務翻譯和外語教學研究國際論壇(SIBT)",建立了第四次SIBT組委會,方梓勛教授擔任名譽主席,東北師大原副校長、中華商務翻譯學會會長張紹杰教授擔任主席,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院長楊玉晨等16所高校教授擔任副主席,同時成立了以方梓勛教授為主任,黃際英教授、俞利軍教授、翁

鳳翔教授、高巍教授為副主任的論壇學術委員會。本次論壇共有來自國內外的50多所高校的79名專家學者和90多名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教師和研究生代表參加了此論壇。

12月30日10:00舉行開幕式,SIBT組委會副主席、東北師大教授、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院長楊玉晨教授主持和致開幕詞。遼寧省翻譯學會會長董廣才教授、遼寧省高校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楊俊峰教授、內蒙古高校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馬占祥教授、第三



次論壇舉辦方代表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肖輝教授分別致辭。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副校長黃際英教授代表秦和校長致歡迎詞。

全體參會代表合影後,大連外國語大學原副校長楊俊峰教授作《譯事三談》學術講座,南京曉莊學院/南京理工大學紫金學院外語學院院長顧維勇教授作主旨發言:《商務翻譯無專不譯》。來自開羅的Dr. Sayed Gouda作主旨發言:“Business Translation in a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然後,翻譯碩士代表、歐洲中國企業家協會國際部主任王蒼作實戰演講:“How Could Translation Establish Business and Build Future?”。

12月30號下午,首先進行了兩場來自美國夏威夷大學的Dr.Dongping Zheng和Dr.Design L.Hudson的主旨發言,題目為“Translingual and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translation: Ecological, dialogical and distributed perspectives”和“Social Constructivism, Custom Tailoring and Lesson Planning for Teach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glish”。

隨後,進行分論壇討論,由長春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馬建華教授、大連民族大學外語學院院長王維波教授和遼東學院外國語學院院長趙麗麗教授主持,代表們分別就商務外語、商務翻譯學科教學和研究領域的學科定位、專業發展方向、師資培養、課程建設、學科研究框架、人才培養標準、教材建設等議題進行了熱烈和深入的研討。

12月31日上午,吉林大學李朝教授作了《商務英語學科研究之交叉研究》的主旨發言;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學系助理教授Birgit Bunzel作“Presenting Oneself: 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 Correspondence Translation”的主旨發言;天津財經大學孫建成教授作“語言經濟學視角下的商務翻譯研究”學術報告;來自美國的中國日報專欄作家、清華大學高級顧問Harvey Dzodin作了“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主旨發言;大連大學英語學院院長高巍教授作“工程商務文本翻譯研究與教學:基於修辭功能與互文性分析”的學術報告。

(轉封底)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Periodical of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期刊

《東北亞外語論壇》 (雙月刊)

No.3, 2018 Volume 7

Included in CNKI

中國知網收錄

Organiser: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主 辦: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組委會

Co-organiser: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協 辦: 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Publisher: New Vision Press

出 版: 新視野出版社

Editorial Committee

編輯委員會

Consultant: Yang Zhong

顧 問: 楊 忠

Chairman: Zhang Shaojie

主任委員: 張紹傑

Vice-chairmen: Yang Junfeng Liu Yongbing Li Zhengshuan Ma Zhanxiang Xu Wenpei

Jiang Yufeng Dong Guangcai Zhou Yuzhong

副主任委員: 楊俊峰 劉永兵 李正栓 馬占祥 徐文培 姜毓鋒 董廣才 周玉忠

Member: (Sorted by Pinyin)

Angela N. Enright	Chang Le	Cao Yulin	Che Lijuan
Chen Hongjun	Cheng Yingxin	Gao Wei	Gao Ying
Huang Xiaoping	Kui Xiaolan	Liang Jianmin	Li Li
Liang Zhengyu	Lin Zhengjun	Liu Fengguang	Lu Guorong
Ma Jianhua	Ren Quanqing	Sun Jiancheng	Tian Zhenjiang
Tong Minqiang	TongYuping	Wang Mei	Wang Weiibo
Wang Xiangfeng	Wang Yaguang	Wang Zuyou	Wei Chengjie
Xiao Hui	Xu Jianzhong	Yin Ling'ou	Yan Yixun
Yang Yuchen	Yu Jianhua	Zhang Deyu	Zhang Sijie
Zhao Lili	Zhou Zhen	Zheng Xianri	

委 員: (按拼音排序)

Angela N. Enright 常 樂 曹玉麟 車麗娟 陳宏俊 程迎新 高 巍
高 瑛 黃小萍 奎曉嵐 梁建民 李 力 梁正宇 林正軍 劉風光
盧國榮 馬建華 任泉清 孫建成 田振江 佟敏強 佟玉平 王 玫
王維波 王相鋒 王亞光 王祖友 魏承杰 肖 輝 徐建忠 尹翎歐
閻怡詢 楊玉晨 虞建華 張德玉 張思潔 趙麗麗 周 震 鄭鮮日

Chief Editor: Zhang Shaojie

主 編: 張紹傑

Deputy Chief Editor: Li Zhengshuan Wang Weibo Liu Hanzhi

副主編: 李正栓 王維波 劉寒之

Editorial Director: Yu Xiucheng

編輯部主任: 於秀成

Vice Director: Liu Wenyu Frank J.Sanches Yang Chunquan Yan Haifeng

副主任: 劉文宇 Frank J.Sanches 楊春泉 顏海峰

Editor: Solar Cheng Liu Bao Wang Min Hao Bo

編 輯: Solar Cheng 刘 宝 王 敏 郝 博

Copyright @ 2018 by New Vis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SSN 0025-7249 and ISSN 0257-2478 (Online)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itorial Office in USA (美国编辑部):

8414 Opulent Ave, Las Vegas, NV 89147

Email: williamliu0515@gmail.com

TEL: 469 867 2050

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 (中国编辑部):

沈阳市惠工街217号德郡大厦2202

Email: nafls@vip.163.com

TEL: 024-31994562

Publication Date: June 25th, 2018

出版日期: 2018年6月25日

Contents

目錄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文学文化

- 001 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紀行詩中的青島 / 劉霞
Qingdao in Korean Emissaries During Tang and Qing Dynasties / LIU Xia (Page 007)
- 008 Metarepresentation of the Mother Figure in Angela Carter's Cinderella Trilogy / QIU Xiaoqing

Linguistics 语言学

- 018 學術英語比較修辭研究——元文本在中國和英美經濟文本中的使用 / 呂中舌 李憶時
Contrastive ESP Rhetoric——Metatex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Economics Texts
/ LV Zhongshe LI Yishi (Page 028)
- 029 網絡語言暴力中隱喻的批評認知分析 / 朱淳熙 劉文宇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etaphor in Cyber Language Violence
/ ZHU Chunxi LIU Wenyu (Page 035)
- 036 二語聽力附帶詞匯習得中詞匯頻率研究回顧 / 常樂 馬軍財
Word Frequency i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A
Review Article / CHANG Le MA Juncai (Page 039)

Teaching 教学研究

- 040 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反思性研究 / 張富民
Reflective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in the Western Local
University / ZHANG Fumin (Page 017)
- 046 混合式教學模式下 Jigsaw 在大學英語閱讀中的教學設計 / 班煒
Teaching Design of Jigsaw Model in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der Blended
Teaching Pattern / BAN Wei (Page 049)
- 050 新媒體平臺下的大學英語教學 / 顏海峰 覃璐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Support of New Media Platform
/ YAN Haifeng QIN Lu (Page 055)
- 056 Chinese into English Education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 ZHANG Yunlong REN Quanqing
- 061 情境教學法提高現職幹部外語交流能力的實踐與研究 / 趙寶榮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Improving Naval Officer'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with
Situational Approach—A Case Study / ZHAO Baorong (Page 064)

Translation 翻译

- 065 文化取向與翻譯策略——以《飛鳥集》兩漢譯本為例 / 嚴雲霞 鄭丁 李正栓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A Case Study of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Stray Birds* / YAN Yunxia ZHENG Ding LI Zhengshuan (Page 064)
- 068 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視角、模式和方法 / 焦鵬帥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Perspective, Paradigm and Method
/ JIAO Pengshuai (Page 074)

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紀行詩中的青島

劉霞^①

山東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 山東青島 266590

摘要:明清時期,朝鮮使臣頻繁往返于中國和朝鮮半島,隨行官員和文人沿途留下了大量的詩文作品。青島地區作為朝鮮使臣的途徑地之一,經常出現在詩文中,其中描寫即墨故城和平度州的作品最多。詩文中既有對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的描寫,也有對當地歷史和人文的感慨,可以窺探明清時期朝鮮半島的青島認識。

關鍵詞: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紀行詩;青島;即墨故城;平度州

明清時期,朝鮮半島的朝貢使節團仍然頻繁入京,對兩國文化的交流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朝鮮使節團除完成政治任務外,還在途中游歷自然風光,與當地文人進行詩歌酬唱活動等。朝鮮使節團的文學作品大都遺失,而明清時期的相關作品在韓國保存的較全面,成為寶貴的一手資料。

山東半島與朝鮮半島隔海相望,是兩國文化交流最早、最頻繁的地區之一。“青島”這一名稱本指海灣內的小島,後逐漸擴大至今日的現代化城市。那麼,今日在中韓交流史上起着舉足輕重作用的青島,歷史上朝鮮半島是如何評說的呢?崔致遠編纂的《桂苑筆耕》中收錄的描寫大珠山(今青島市西海岸新區)的十首詩歌和嶠山(今青島市即墨區)的三首詩歌,是朝鮮半島的青島認識研究的寶貴資料。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的文學資料較為龐大,然而遺憾的是,青島相關的作品挖掘和研究工作却相對匱乏。本文將以朝鮮使臣的紀行詩為研究對象,以青島地區的兩個古地名—即墨故城和平度州(膠水縣)為切入點,探討這一時期朝鮮半島的青島形象。

一、“以一城復全齊”的即墨故城

即墨作為中國歷史古地,在朝鮮半島也廣為人知,並享有較高的評價。《括地志》雲:

“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裏。古齊地,本漢舊縣。”膠水縣位于今青島市平度市,曾隸屬萊州府。洪鎬曾對即墨作出高度評價,“舉齊七十餘城,而齊之恢復,實基乎即墨之一城。趙襄子幾為智伯所取,賴晉陽而得全。向使齊無即墨,齊不得為齊。趙無晉陽,趙不得為趙矣。”(洪鎬,2005:454)金功對本國“議罪之官,失于閱實。尋常訊問,竟皆原有。轉頭換面,還占仕路”的狀況表達擔憂,勸誡朝廷應“將明示勸懲,以為保民之地。”並以歷史上齊國之即墨為佐證,“若如今日之為,則阿與即墨,混為一途,而齊王之鼎鑊,亦不過枉殺之器耳”(洪鎬,2005:97),預示任其發展的不良後果。朝鮮中期文臣全有亨曾就國家存亡的問題與朝鮮國君進行辯論,他認為從古至今扶顛持危者,諸葛亮天下第一,并感慨雖然諸葛亮善于用兵,但無奈益州偏小之地,未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大一統。對此說法,國君提出異議,“田單以一即墨,復齊七十餘城,汝謂益州小乎。”有亨答道:“即墨雖小,齊猶在也。益州雖大,漢已亡也。復將亡之齊易,復已亡之漢難。”(李緯,2005:290)國君領會全有亨憂患國家存亡之深意,采取措施穩固國之根本,改變壬辰搶攘的現狀。

朝鮮後期學者柳馨遠,曾在《兵制後錄》

^①劉霞,女,講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韓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形象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青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青年項目(QDSKL150455)的階段性成果

中針對“城池、兵車、牧馬、郵驛”四個方面提出政見。在“城池”篇中，他批評朝鮮半島不重視“築城”和“習兵”，並稱贊“即墨乃列國屬邑，而三年圍窘之餘猶得牛千餘，則其平時城中居民之衆可知。不然，雖張巡，田單亦無能保守矣。”（柳馨遠，1783: 332）1901年，宋時烈提出固守的重要性，“自古成敗不系于多寡，趙之晉陽，齊之即墨是已，今不思固守而乃出此計。殿下獨不見欽宗被執之後，徽宗亦不得免乎”（宋時烈，2005: 424），以即墨因固守而復全齊的史實，批評本國主攻的官員。1917年，金齊閔曾就保邦護國提出“擇城堡、選將帥、明軍政、薦賢能”等舉措，其中，在“擇城堡”中，金齊閔與宋時烈政見相同，主張既要設城堡也要守城堡，以齊國莒與即墨為例證，“齊有莒與即墨，而能復齊國，豈必盡守小堡而後，能御敵乎。而況盡守小堡，則兵分而有必敗之道乎。此小臣之所以欲擇城堡而守之者也。”（金齊閔，2005: 38）在“勤攻守”一條中，金齊閔主張攻守互為表裏，不可偏廢，“田單之固守即墨，而鑿穴攻燕者，用此術也。何以知其然也，齊之七十餘城，皆以降燕，惟莒即墨堅守不下。”（金齊閔，2005: 38）

田單“以一城復全齊”的典故，不僅成為政客探討國事的佐證，也多出現在使臣的詩歌中。

即墨縣

眼見全齊次第降，謀臣與此慮弓藏。二城不待勞餘力，樂毅真先負惠王。（鄭夢周，2005: 575）

鄭夢周（1337-1392），高麗末期的文臣兼學者，朱子學泰鬥。1372年，以正使洪師範的書狀官身份入明。鄭夢周一生極力主張與明朝修好，曾于1376年，因公開反對“排明親元”的外交政策而被流放。1384年，以聖節使身份入明，在修復與明朝外交關係方面做出了較大貢獻。1387年，鄭夢周第三次入明。鄭夢周一生三次出使明朝，留下了不少描寫沿途風景、歌頌中國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詩歌和

文章。

“樂毅”將軍曾統帥五國聯軍攻打齊國，接連攻下70餘座城邑，《即墨縣》的第一句即是對這一著名戰役的描寫。“次第”意為“依次”，“弓藏”典出《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句踐世家》，“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後以“弓藏”指功成被弃。眼看齊國即將舉國投降，功臣謀士却開始擔憂因功高蓋主會遭遇鳥盡弓藏的命運。詩歌第二句的“二城”指莒城和即墨兩座城邑。“樂毅負惠王”出自齊國田單的反間計，最終導致樂毅背叛惠王。鄭夢周經過即墨縣時，聯想到樂毅攻城的史實，而作此詩。

即墨途中

轍環天下半，窮秋行路難。泥濘齊東遠，霜高灑水寒。蹇驢五更月，孤帆萬丈瀾。莫作遠游客，少年雙鬢斑。（趙浚，2005: 418）

趙浚（1346-1405），高麗末期、朝鮮王朝初期文人。1391年6月，隨賀壽使節團出使大明，途中寫下沿途感悟。1401年，趙浚再次以謝恩使身份入明，但因健康問題，中途折返。

“轍環天下”指乘車環游天下，“窮秋”意為晚秋、深秋，指農曆九月。乘車已游遍天下大半的風光，晚秋時節的路途也愈加艱難，此處道出出使路途上的艱辛。“齊東”即山東省齊東縣，“霜高”指秋空高爽。另外，原文中雖為“灑水”，筆者認為應指山東中部的泗河，又名泗水。道路泥濘而齊東縣還相隔甚遠，秋空高爽，泗水寒氣襲人，此處對糟糕的路況和天氣的描寫，預示了下文陰鬱的基調。“蹇驢”意為跛蹇驚弱的驢子、驚鈍的人，“孤帆”意為一條船。五更時分月色中緩緩行走的跛脚驢子，萬丈波瀾中獨自行駛的一葉扁舟，映照了詩人憂鬱、悲涼的心情。進而，詩人告誡世人不要做遠行的游子，韶華易逝，昔日的少年已兩鬢斑白。使節團一往一返動輒大半年，車馬勞頓可想而知。如遇惡劣天氣，更是苦不堪言，《即墨途中》是對出

使之艱辛的真實寫照。

即墨歌

崇墉屹屹地道通，火牛夜奔燕軍空。概園備來擁千官，綴旒之危盤石安。嗟哉單單亡國言，貂勃貫珠不可誼。(許楠，2005: 11)

許楠(1563–1641)，朝鮮王朝中後期文臣，無出使中國紀錄。“崇墉”指高牆、高城，“屹屹”為高大挺立貌，高城聳立，城內道路四通八達。“火牛”是戰國時期田單發明的火牛陣，“綴旒”比喻君主為臣下挾持或國勢垂危，此句意為儀仗林立、僕從萬千，簇擁着上朝的官員，這番聲色犬馬，絲毫不顧國勢垂危，依舊安如磐石。“貂勃”是豎貂裔孫，齊國著名的賢者、中大夫，曾經守莒城6年而不失于燕國大軍。田單以火牛陣擊潰燕國軍隊後，被齊侯封為安平君。“誼”通“謏”，忘記之意，“嗚呼哀哉”祇不過是一句感嘆亡國的戲言，貂勃的功績是萬萬不能遺忘的。這首詩歌高度贊揚了以火牛陣解除被困之危的田單和堅守莒城不失燕軍的貂勃，體現了即墨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

二、狀元鄉宰相裏一平度州

平度曾用名膠水縣、平度州，縣內設置丘西、灰埠、新河等驛站，主要負責往來使節團的接待工作。《朝天錄》中有載，“發灰埠渡濁河，名曰獨埠，水不甚廣而窪深。方物包子著筏而涉，輜輶高抬，水幾沒肩，僅免沾濕。”(李民晟，2005: 89)“獨埠”這一地名至今仍保留，屬平度市灰埠鎮，引文描述了灰埠濁河的狀況。除此之外，還有對平度新河的描述，“歷掖縣度沙河，夕抵灰埠驛，是日行七十裏。初十日丁酉晴，早發渡新河，河水渾濁，不見其底。”(申悅道，2005: 46)“掖縣”是今萊州市的舊稱，“沙河”在今萊州市沙河鎮，“河水渾濁，不見其底。”與上述濁河的描述相似，均突出了河水的渾濁。

使節團隨行人員進入驛站，不僅可以在接待官員的安排下四處遊歷，還可與當地的人文儒士進行文化交流，朝鮮使臣在平度境

內留下了不少描寫當地風光、歌頌名人雅士的詩篇。

宿丘西驛

憩宿丘西客，將歸海北人。一心唯報主，萬裏更思親。驛路加餐久，鄉關入夢頻。悠悠游宦裏，奔走馬蹄塵。(權近，2005: 70)

權近(1352–1409)，高麗末朝鮮初的文臣兼學者。1368年以密直司僉書事身份出使明朝，1375年，與樸尚衷、鄭道傳、鄭夢周共同主張親明政策，反對接待元朝使節團。1389年，再次以尹承順副使身份出使明朝。1396年，因表箋問題引起外交矛盾，自請出使明朝修復關係。

朝鮮使團一般采用先海路後陸路的方式，從登州(今蓬萊)口岸登陸。明朝時期定都南京，使節團于登州登陸後，經過萊州(朱橋驛)、平度(丘西驛)等地進入江蘇，返程亦如此。朝鮮使團少則200–300人，多至400–500人，除了正使、副使、書狀官等主要職位外，還包括譯官、醫官、使臣的親屬子弟、文人名士等(劉為，2005: 42)。據《明史·外國列傳一·朝鮮列傳》記載，由于使團往復動輒大半年，又多有海難發生，故朱元璋對朝鮮朝貢諭旨，“宜遵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其明諭朕意。”從詩歌第一句“將歸海北人”來看，此詩應作于返程之時。權近一生出使明朝三次，《宿丘西驛》主要表達了出使的舟車勞頓。“丘西客”一詞流露出客居異國的流浪感，“思親”、“鄉關入夢”則表達了思鄉之情。縱使一心報主，但想到悠長的為官之路和奔波之苦，不免悵然若失，朝貢使臣光環背後的心酸和苦楚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客夜在丘西驛

客夜人誰問，沉吟欲二更。詩從枕上得，燈在壁間明。默默思前事，遙遙計去程。俄然睡一覺，童僕報鷄鳴。(鄭夢周，2005: 575)

鄭夢周與權近在明朝建國初期，都極力主張與元政權斷交，與明建立穩定的外交關

系。驛館中誰人問時辰，有人答快二更天了。而此時詩人還沒有入睡，正借着隔壁微弱的燈光，伏在枕上作詩。默默地思量着出使途中發生的事，計算着歸程。不知何時入睡的，雞鳴之時在童僕的呼唤中醒來。與權近相比，鄭夢周的這首詩並沒有惆悵之意，而更注重敘事。同在丘西驛館留宿，權近感受到的是心酸和惆悵，鄭夢周則用輕鬆的筆調描述丘西驛館中的人物活動。

膠水縣別徐教諭宣

萬邦同軌日，聖主右文時。邂逅逢佳士，歡忻似舊知。
風儀傾後輩，經書即吾師。遠大宜相勉，何須惜別離。

(鄭夢周,2005: 575)

膠水縣即今山東省平度市，宋、金、元時古縣名，此詩為鄭夢周離別教諭(教諭為學官名)徐宣之時所作。從詩歌內容來看，鄭夢周與徐宣雖偶然邂逅，但志趣相投。“同軌”有一統之意，“右文”指崇尚文治，明朝統一邊邦各部，聖明的君主崇尚文治之時，詩人與徐宣邂逅，一見如故。徐宣之儀態令後輩傾倒，學問方面更是滿腹經綸，為人師表。最後一句，詩人強調不需“惜別離”，反而襯托了不捨之意。

平度州途中

春寒特地逼微衣，千山萬水行度歸。下馬焚香龍女廟，摩挲古碣字稀微。(李詹,2005: 330)

李詹(1345-1405)，高麗末期朝鮮初期文臣。1400年以傳位使身份出使明朝，1402年以登極使副使身份再次出使明朝。從詩文內容來看，李詹此次出使明朝路經平度州是早春時節。“微衣”意為旅人之衣或出征將士之衣，“行度”為執法，這裏指出使任務。寒氣逼入單薄的衣服，踏上萬水千山的歸程。所謂春寒料峭，一個“逼”字讓人真切地感受到刺骨的寒氣，浩浩蕩蕩的使節團歷經千山萬水，長途跋涉，早已是車馬勞頓，疲憊不堪。返途時到達平度州，已離登州口岸不遠，馬上要轉入海路了，故而，到當地龍女廟焚香祈禱。輕輕撫摸古碑，發現字迹依稀，可見年

代久遠。李詹的《平度州途中》與權近的《宿丘西驛》相似，主要表達了出使的艱辛。

過宰相裏

宋龍圖閣太學士蔡齊故裏也。在平度州灰埠裏
盛宋興文運，名符帝夢奇。首登龍虎榜，身到鳳凰池。
地屬東萊郡，坊傳宰相基。風聲今不泯，鄉社有遺祠。

(李民成,2005: 327)

李民成(1570-1629)，朝鮮王朝中期文臣，1602年和1623年兩次以書狀官身份出使明朝。這首詩歌創作於李民成結束出使任務歸程途中，《敬亭先生文集續集卷三》中記載了李民成在平度州的行迹，“過新河入平度州西界至灰埠驛，州西八十裏地，乃宋龍圖閣太學士蔡齊故裏也，表曰壯元宰相裏。”(李民成,2005: 490) 蔡齊為北宋官吏，萊州膠水人(今平度市)，曾被宋真宗贊其有“宰相器”。詩中所稱龍圖閣太學士是宋仁宗時期被擢升的官職，李民成出使途中路過蔡齊故裏，有感而發。

《過宰相裏》這首詩歌高度贊揚了蔡齊的學問和影響力。詩歌前兩句道出了蔡齊脫穎而出的過程，宋朝鼎盛時期，朝廷重視科考選拔人才，蔡齊的學問被宋真宗所認可。科考登榜首，從此成為人中龍鳳。明洪武二年(1369)，于膠水縣置平度州，屬萊州府。東萊郡為漢景帝時而置，歷史上所轄領地多有變動，大致包括今煙臺(萊州、龍口、牟平等地)、威海(文登等地)和青島(平度、即墨等地)的一部分。故而，李民成稱蔡齊之故裏“地屬東萊郡”。詩歌的最後一句感嘆蔡齊的聲名至今流傳，抒發自己的敬仰之情。

灰埠驛，次書狀韵

不愁羈旅鬢渾霜，魯聖遺風夏禹疆。岱岳蟠空寰宇小，
黃河橫派海門長。

清朝冠冕登多士，終古銅鹽轅遠商。詩為采謠非漫興，
檐帷時復駐周行。(吳翻,2005: 47)

吳翻(1592-1634)，朝鮮王朝中期文臣。1625年，以謝恩兼奏請副使身份出使明朝。1634年，擔任明朝使臣黃孫武的接待使。

灰埠驛(今平度市灰埠鎮)是明清兩代的

“登萊通衢”要地，也是接待使臣的重要驛站。“羈旅”為寄居他鄉之意，雙鬢霜白却不抱怨長居他鄉之苦，因為自己身在齊魯大地，此處表達了詩人對齊魯文明的敬仰之情。“夏禹疆”指夏禹治水時曾到過的地方，後泛指中國疆域，即魯聖遺風傳遍大江南北。“岱岳”指五岳之首的泰山，“蟠空”為延伸至雲端之意，“岱岳蟠空寰宇小”與“一覽衆山小”，“黃河橫派海門長”與“黃河入海流”有異曲同工之妙。詩歌的前兩句展現了齊魯大地的風采。1636年金改國號為清，晚吳翻出使十年之久，因而“清朝”并非指大清王朝，其與後半句的“終古”相呼應，應為歷朝歷代之意，“冠冕”指仕官，這句詩歌指出歷史上多位清廉之士登第。“輳”意為聚集，即自古以來各地商人聚集。詩歌的第三句體現了其歷史、政治、經濟地位，最後一句的陳述回到自己身上。“采謠”一般指民間采風，“漫興”指即興，所謂詩，是采風時的所感所想，并非隨手之作。“檐帷”為車帷子、車架之意，“時復”為時常，“周行”為大路、大道。即為了采風，詩人的車架時走時停。這首詩歌應在灰埠驛稍事休整期間所作，詩人的思緒馳騁在廣闊的齊魯大地上。

新河途中

宋蔡齊舊裏，有明狀元牌榜

草樹浮天氣，雲山襯水光。當時學士裏，今日狀元鄉。

筐果堪留客，尊醪報滌場。悠然得句處，落雁帶清霜。

(吳翻, 2005: 47)

這首詩同為吳翻所創作。新河在今平度市新河鎮，緊鄰灰埠鎮，吳翻詩中說宋宰相蔡齊故裏在新河，李民成詩中又言在灰埠。這應該跟前面吳翻的《灰埠驛》屬同一情況，來到平度州想到的是“魯聖遺風”、“岱岳”和“黃河”。可見，相較於地理位置，朝鮮文人更注重中國歷史、文化的社會影響。詩歌第一句是對新河自然環境的描寫，青草、綠樹、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是狀元的故鄉。“筐果”、“尊醪”體現了接待官的盛情款待，但詩

人之意不在觥籌交錯之間，“落雁”和“清霜”則襯托出詩人的高潔和清雅。

新河驛

費盡黃金劍獨俱，不堪迢遞向燕途。秋晴古驛疎槐柳，雨過新河長鱖鱸。

半夜幾憐長作客，十年空恨誤為儒。男兒四海平生志，快意明朝跨的盧。(韓應寅, 2005: 500)

韓應寅(1554–1614)，朝鮮王朝文臣。1584年以宗系辨誣奏請使書狀官身份出使明朝，1591年，再次以陳奏使身份出使明朝。之後，韓應寅又分別以奏請使和謝恩使身份兩次出使，成為朝鮮半島歷史上出使次數最多的文臣之一。

《新河驛》這首詩多有抱怨之意，蓋與其數次出使明朝有很大關係。朝鮮使節團動輒幾百人，還要帶上大量的朝貢禮品，說“費盡黃金”並不為過。詩歌的第一句對此表達了不滿和諷刺之意，而第二句筆鋒一轉，描寫了秋季雨後的新河。“疎”同“疏”，表示空隙大，晴空下的驛站，稀疏的長着幾棵槐樹、柳樹。雨後，新河的鱖魚和鱸魚又將快速成長，這與詩人此時的心境形成鮮明對比，更突出了詩人的失落感。第三、四句詩歌回到內心描寫，半夜幾次三番的嘆息長期客居異國的境遇。四次出使明朝，期間卑躬屈膝，讓他對自己文人儒士的身份產生了強烈的不滿和懷疑。而第四句體現了詩人的男兒本色，“的盧”曾是劉備的坐騎，因背負劉備跳過數丈寬的檀溪，擺脫追兵而聲名顯赫，此處引申為快馬。最後一句表達了自己的期望，男兒當志在四方，策馬奔騰在遼闊的疆域。

由于朝鮮使團大多從登州(今蓬萊市)口岸登陸，在登州地區逗留時間較長，故而明清時期朝鮮使臣紀行詩的中國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臺地區的登州和萊州等地。而青島地區的即墨古城和平度州祇是途中經過，沒有足夠的逗留時間，留下的相關作品也相對較少。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對青島地區的研究，不管是深度還是廣度上，都

存在諸多不足。

本文通過整理明清時期朝鮮使臣描寫即墨故城和平度州的紀行詩,探討了這一時期朝鮮半島的青島形象。“以一城復全齊”的即墨故城是朝鮮使臣推崇、歌頌的歷史名城,也是政治抱負的代名詞。而作為宰相裏的平度州擁有靜謐的自然風光和濃厚的文化氣息,反襯了出使的艱辛和無奈。朝鮮使臣的紀行詩,從自然風光、歷史和人文等方面,反映了明清時期朝鮮半島的青島認識。除了紀行詩,明清時期朝鮮使臣還留下了一些與青島相關的書、表、狀、策、日記等,期望日後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

注釋:

①樂毅統帥的五國聯軍,勢如破竹,而對於莒城和即墨,樂毅認為單靠武力,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所以採取了圍而不攻的方針,欲從根本上瓦解齊國。而田單利用此時機,對燕國施行反間計,造謠說之所以拿不下僅剩的兩座城邑,是因為樂毅與燕國新即位的國君有怨仇,故意拖延時間,準備在齊國稱王。燕惠王(燕昭王之子)本就對樂毅存疑,受其挑撥,立即召回樂毅。樂毅懼怕被殺,故而“負惠王”,向西投降趙國。

②燕昭王時,燕將樂毅破齊,田單堅守即墨(今山東平度)。前279年,燕惠王即位。田單向燕軍詐降,使之麻痹,又於夜間用牛千餘頭,牛角上縛上兵刃,尾上縛葦灌油,以火點燃,猛衝燕軍,並以五千勇士隨後衝殺,大敗燕軍。田單乘勝連克七十餘城。

③1015年蔡齊以萊州貢士身份赴汴京參加中央禮部試,其命題之《置器賦》被從一萬分答卷中選中呈于真宗親閱。閱罷,真宗贊其有“宰相器”,當即欽點第一。

References(參考文獻)

[1] Han, E. 2005. Back Joljae manu-

script.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60*. Seoul: Kyongin.

(韓應寅,2005.百拙齋遺稿.韓國文集叢刊卷60.首爾:景仁文化社.)

[2] Hong, H. 2005. Mu Zu manuscript.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22*. Seoul: Kyongin.

(洪鎬,2005.無住先生逸稿.韓國文集叢刊卷22.首爾:景仁文化社.)

[3] Kim, P. 2005. Back Am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50*. Seoul: Kyongin.

(金功,2005.栢岩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卷50.首爾:景仁文化社.)

[4] Kim, J. 2005. Oh Bong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4*. Seoul: Kyongin.

(金齊閔,2005.鰲峰先生集.韓國文集叢刊卷4.首爾:景仁文化社.)

[5] Lee, M. 2005. Gyeongjeong Sequel.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76*. Seoul: Kyongin.

(李民成,2005.敬亭先生續集.韓國文集叢刊卷76.首爾:景仁文化社.)

[6] Lee, J. 2005. Do Am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195*. Seoul: Kyongin.

(李緯,2005.陶菴先生集.韓國文集叢刊卷195.首爾:景仁文化社.)

[7] Lee, C. 2005. Suang Mae Dang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6*. Seoul: Kyongin.

(李詹,2005.雙梅堂先生篋藏集.韓國文集叢刊卷6.首爾:景仁文化社.)

[8] Liu, W. 2002. *A study of the contact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envoy in the Qing Dynasty*.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

(劉為,2002.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9] Yoo, H. 1783. *Ban Gye Anthology Vol-*

ume22.

(柳馨遠,1783.礪溪隨錄卷二十二.)

[10] Kwon, G. 2005. Yang Chon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7*. Seoul: Kyongin.

(權近,2005.楊村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卷7.首爾:景仁文化社.)

[11] Shin, Y. 2005. Na Jae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24*. Seoul: Kyongin.

(申悅道,2005.懶齋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卷24.首爾:景仁文化社.)

[12] Song, S. 2005. Song Siyeol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113*. Seoul: Kyongin.

(宋時烈,2005.宋子大全卷.韓國文集叢刊卷113.首爾:景仁文化社.)

[13] Oh, S. 2005. Chun Pa Antholog. *Kore-*

an literary house Volume95. Seoul: Kyongin.

(吳翹,2005.天坡集.韓國文集叢刊卷95.首爾:景仁文化社.)

[14] Huh, J. 2005. Soo Saek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69*. Seoul: Kyongin.

(許槁,2005.水色集.韓國文集叢刊卷69.首爾:景仁文化社.)

[15] Cho, J. 2005. Song Dang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6*. Seoul: Kyongin.

(趙浚,2005.鬆堂集.韓國文集叢刊卷6.首爾:景仁文化社.)

[16] Jung, M. 2005. Po Eun Anthology. *Korean literary house Volume5*. Seoul: Kyongin.

(鄭夢周,2005.圃隱先生文集.韓國文集叢刊卷5.首爾:景仁文化社.)

Qingdao in Korean Emissaries During Tang and Qing Dynasties

LIU Xia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eign Language College,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Abstrac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Korean emissaries plied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peninsula, leaving a great large of poems by the accompanying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s one of the ways of Korean Envoys, Qingdao often appears in poetry and prose, among which the description of Jimo Ancient City and Pingdu State is the most. There are bo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scenery and the customs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poetry and pros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Qingdao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an be explored.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orean emissaries; Qingdao; Jimo Ancient City; Pingdu State

Metarepresentation of the Mother Figure in Angela Carter's Cinderella Trilogy

QIU Xiaoqing^①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Abstract】 *Angela Carter's idiosyncratic rewrites of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create distinct images of Cinderella's dead mother and thus direct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in most versions. Drawing on Lisa Zunshine's insights into meta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ther figure and other characters in the Cinderella tale and compares the effects achieved by thes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giving a detailed and cr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imm Brothers' version and by filling in the gaps that Carter believes exist in the well-known variants, Carter foreground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inderella's mother and her stepmother as a mother figure and emphasizes th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marriage for gir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pectively.*

【Keywords】 Angela Carter ; Cinderella ; metarepresentation ; mother ; marriage

Cinderella is “the most recognized fairy tale character”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000 variants of Cinderella tale (Heiner, 2012:1). These tal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ATU 510A “Cinderella,” ATU 510B “The Dress of Gold, of Silver, and of Stars” or “Cap o’ Rushes,” and ATU 511 “One Eye, Two-Eyes, and Three-Eyes”. Of these three types “Cinderella” is the most famous and has attracted substantial attention from both writers and schol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late 1960s when anti-culture movement gave rise to a number of feminist fairy-tale writers who express a non-sexist view of the world through fairy tales or through criticism about fairy tales. (Zipes 2000). Anne Sexton, Olga Broumas, Roald Dahl, Tanith Lee, Angela Carter and many other writers all rewrote the Cinder-

ella tale. Apart from retelling such classic fairy tales as “Bluebeard,” “Beauty and the Beast,” “Snow White,” “Sleeping Beauty” and “The Red Riding Hood,” all of which are included in the well-acclaimed *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1979), Carter rewrote three versions of Cinderella tale entitled “Ashputtle or The Mother’s Ghost: Three versions of one story” and published them first in 1987. In 1993, this Cinderella trilogy was included in her post-humorous story collection *American Ghosts and Old World Wonders*.

Carter’s idiosyncratic rewrites of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create distinct images of Cinderella’s dead mother and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in most versions. More importantly, by giving a detailed and cr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①邱小輕,女,副教授,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童話改寫、敘事學和英美文學。

基金項目: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2015年度共建項目《認知敘事學視角下的現當代童話改寫》(批准號:GD15XWW12)階段性成果。

the Grimm Brothers' version, and by filling in the gaps that Carter believes exist in the well-known variants, Carter invites the reader to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canonical version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ltimate source of rep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 her mother and father, as well as the stepfamily. As Carter offers rewrites of the classic tale, she becomes another source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draws on Lisa Zunshine's insights into metarepresentation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me charact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arter's Cinderella trilogy foreground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mother as a mother figure, and emphasizes th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marriage for gir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pectively.

Metarepresentation and fairy tale rewrites

Jack Zipes points out that "For years the classical literary tales were mainly articul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a male viewpoint," and most of the feminist fairy-tale retellings are symbol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uthors' critique of the patriarchal status quo and of their desire to change the current socialization process"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xii). Carter is a well-acclaimed feminist writer and critic (Bacchilega, 1997:126; Zipes, 1987:163; de la Rochere, 2013:67; Gruss, 2009:186; Jordan, 1992:119; Tiffin, 2009:79; Lau, 2015:2). She is best known for her rewrites of fairy tales. Throughout her life she wrote, rewrote, translated, and edited fairy tales. She believes that Fairy tales are about people dealing with what happens in their daily life, so she places fairy tales firmly in reality. As she remarked: "A fairy tale is a story where one king goes to another king to borrow a cup of

sugar" (Warner xi). Here Carter employs the word "king" in its original meaning, which refers to the oldest of the clan in the ancient folk tales (Zipes,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6). What's more, Cart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narrative strategies. She said: "Even a change of narrator can effect a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Carter, Introduction xiv). She also notes that a change of context may result in a total change of a story: "...context changes everything" (Carter, Introduction xv). In fact, in her Cinderella trilogy Carter revises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in several ways. In "The Mutilated Girls" she changes the third-person omniscient narration in the classic tale into the first-person narration. In this way the narrator "I" directly talks to the reader about 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imm Brothers' tale. In addition, Carter adds some details in each of her rewrites, and this immediately alerts the reader to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in which the classic tale and the revised tale were written.

Since Carter's fairy tales are "solidly anchored in history and in folk literature" (Gruss, 2009:198), and since Carter's rewrite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consistently reveal and criticiz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male viewpoint, it is helpful to draw on Zunshine's work on metarepresentation to compare Carter's representations with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lassical versions and to look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these representations. Metarepresentation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 representation" and denotes our cognitive ability to keep track of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 metarepresenta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concerned with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one concern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Zunshine,2006:47). Carter's three variant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give representations of Cinderella, her mother and father, and her step-family. In addition, as these variants make explicit references to the classic versions by the Grimm Brothers and Charles Perrault, the sources of representations include the Grimm brothers, Charles Perrault, and Carter. And as these variants are rewrite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other writers' retellings of the tale also deserve our attention.

Carter's three versions center on the ghost of Cinderella's mother, and recurrently talk about the mother and Cinderella's marriage. How is Cinderella's mother depicted in the classic Cinderella tale and Carter's rewrites respectively? How significant was marriage for Cinderella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nd how significant is marriage for girls today?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ll answer these questions.

Similarities Between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mother

Carter's first rewrite "Mother's Ghost" is a response to the Grimm Brothers' "Aschenputtel". By doing a "close up" of the Grimms' tale almost scene by scene, Carter alerts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and that of her stepm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raises the reader's awareness of the small but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she makes of the Grimms' tale.

In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Grimm Brothers' tale, Cinderella's mother is at her deathbed and says her final words to Cinderella. Carter repeats part of the mother's final words in "The Mutilated Girls": "I shall always look after you and always be with you" (Carter,

1990:111). Both Alan Dundes and Maria Tatar adopt slightly different versions of translation which have the same rendition of these final words: "I shall look down on you from heaven and always be with you" (Dundes,1982:22; Tatar,1999:117). By using the expression "look after" instead of "look down from heaven" and repeating it once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tale "See how well I look after you, my darling!" (Carter,1990:116), Carter emphasizes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takes upon her shoulders for Cinderella. In fact, this corresponds to Carol Gilligan's finding that men are reared to cultivate an ethic of justice and women are reared to value an ethic of care based on nurturing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qtd. In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xiii).

A look at the complete words of Cinderella's mother at her deathbed reveals that the mother totally assimilates the Christian doctrine that the ruling class promotes. As her words are rendered more or less the same in the versions adopted by Dundes and Tatar, one of the versions will be cited here: "Dear child, if you are good and say your prayers, our dear Lord will always be with you, and I shall look down on you from heaven and always be with you" (Tatar,1999:117). These words have two-fold implications. First, Cinderella's mother is a good person throughout her life. Second, as long as Cinderella behaves herself like her mother, she will be blessed. Cinderella totally accepts her mother's advice, as the tale says: "Every day the girl went to the grave of her mother and wept. She was always good and said her prayers" (Tatar,1999:117). Cinderella's happy life depicte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testifies to her mother's words which have served as advise for young girls to lead a virtu-

ous life for centuries.

In fact, the use of third-person omniscient narration in the Grimms' version shows the Grimm Brothers' endorsement of Cinderella's mother's view. The two stepsisters are described as "beautiful and white, but whose hearts were foul and black". Derogatory words and expressions are ascribed to the two stepsisters and the stepmother. For instance, "They [the two stepsisters] took away her [Cinderella's] beautiful clothes"; "They ridiculed her". Cinderella is described as "the poor stepchild" (Tatar, 1999: 117), and "the beautiful girl" (Tatar, 1999: 121). In addition, by making Cinderella the protagonist of the tale and rewarding her with a happy ending,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obviously takes sides with Cinderella and her mother. The use of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results in the general reader's internaliz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s final words and belief in her mother's ability to protect her from getting hurt by others. It also reinforce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the goodness of the natural mother and the malice of the stepmother. However, Carter's rewrite brings to the fore the question of the source of our rep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It is true that it is Cinderella's mother who advises her to be a good girl. But another truth that deserves our due attention is that it is the Brothers Grimm who create the image of Cinderella's mother. Nance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 note that the ruling class possesses the key cultural terms determining what ar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be a human being (qtd. in Zipes, *Fairy Tale as Myth* 13). The classic tale is one of these key cultural terms. Therefore,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Grimms' tale is the ruling class. The Brothers Grimm act as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ruling class, and Cinderella's

mother plays the function of the Grimms' spokesperson, so the truth that it is the ruling class that gives advice to girls remains hidden in the story.

Carter's rewrite fully demonstrates readers' metarepresentation ability. By revealing the fact that Cinderella's father seems to play an in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rimms' tale, Carter alerts the reader to the source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Cinderella and other characters'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the classic tale. It is true that Cinderella's father takes up a disproportionately small space in the whole narrative, saying only a few words and given no thought presentation. He merely serves a passing reference in the tale. But Carter believes that Cinderella's fath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ale because he is a rich man and the tale is "economic" (Carter, 1990: 111). In fact, Zipes points out that "the household is a type of reinforcement of the capitalist socio-economic system"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3). What's more, Carter believes that "he is the invisible link that binds both sets of mothers and daughters in their violent equation." And he is a "God-like" person "to introduce the essential plot device" (Carter, 1990: 112). In other words, the absence of Cinderella's father in the classic tale reveals a lot about the patriarchal ideology that the tale carries and has been disseminating. The creation of an almost absent and silent father figure consequently foregrounds the conflict between Cinderella and her stepfamily, especially her stepmother, and resolves the conflict by rewarding Cinderella and punishing her stepfamily. This happily-ever-after endin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 obedient and virtuous girl and teaches a good lesson to girls and women who are bad and attempt to cheat.

In this way the father does not need to shoulder any responsibility, and it is women who are believed to cause all the drama. Carter's version alerts the reader to recognize the hidden fact that the ruling class is the ultimate source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father and other characters. This recognition corresponds to Carol Gilligan's finding that men are reared to cultivate an ethic of justice whereas women are reared to value an ethic of care based on nurturing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ies (qtd. in Zipes, *Don't Bet on the Prince* xiii).

Furthermore, Carter finds it strange that as a household head, Cinderella's father cares little about her well-being and pays no attention to the obvious conflicts between her and her stepfamily. She also expresses doubts about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inderella's father and the stepfamily. She finds it highly possible that his stepdaughters are actually his biological daughters whose legitimacy he cannot admit since he has already got a wife and a daughter. Carter points out that this possibility provid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his readiness to accept the stepdaughters. However, this fact has to be concealed, as the real purpose of the classic tale is to warn young readers, especially young girls, of the importance of behaving themselves.

If Cinderella's mother in the classic tale serves as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patriarchal power, Carter's three rewrites highlight the endeavors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mother have made to find a rich man for their own daughters respectively and the prices that these women and girls have to pay in order to secure such a man for husband.

In "The Mutilated Girls," Carter makes it explicit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and stepmother are actually more or less the same as a

mother figure. For one thing, they both try every means to make their own daughters desirable in the marriage market. Both mothers see to it that their own daughters look the most lovely in front of the prince. For another, both mothers are ready to do whatever they can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prince. Cinderella's stepmother does not hesitate for any second to cut off any part of her daughters' foot to ensure that her daughters' foot can fit the glass shoes. "she [Cinderella's stepmother] is prepared to cripple her daughters" (Carter, 1990:115). Cinderella's foot is "the size of the bound foot of a Chinese woman, a stump. Almost an amputee already" (Carter, 1990:116). The Brothers Grimm say nothing of the looks of Cinderella's foot, but here, Cart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er foot, revealing that they are extremely small. She even compares Cinderella's foot to "an amputee," implying that Cinderella's foot is abnormally and morbidly small. Therefore, what Carter tries to convey to the reader is that it is exceptional that Cinderella has such small feet. Thus it is exceptional that Cinderella marries the prince. To put it another way, it is extremely lucky for a girl of ordinary family background to marry a prince. In this way Carter discloses the illusion that the Grimm Brothers' tale promises, that is, if a girl behaves herself, she will be rewarded with what she expects. Although Cinderella finally gets what she has expected, she has paid a dear price for it. Her stump-like foot indicates the sacrifices she has made in order to get what she ultimately wants. Therefore,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Carter regards the prince's search for the foot as "ritual humiliation" (Carter, 1990:115). It really is humiliating for Cinderella and all the other girls to show their naked foot in front of strange men. By describ-

ing it as a ritual, Carter implies that shoe seeking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ways that girls encounter in the marriage market. This “ritual humiliation” also exposes the harsh conditions that girls face in the marriage market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where they are treated as inferior to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and are actually objectified. So the fact that Cinderella puts her tiny foot into the glass slipper in front of the prince is not a glamorous thing that is worth a detailed depiction and praise, but in fact a humiliation for her. So Carter compares the glass slipper to “open wound” (Carter, 1990:116).

As the narrator “I” of “The Mutilated Girls” shows a detailed revela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the Grimm’s version of the Cinderella tale, the rewrite reads like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ic tale. As Martine Hennard Dutheil de la Rochere remarks, “ ‘The Mutilated Girls’ reads like preparatory notes, or even course notes on the tale” (de la Rochere 290). In the course of analyzing the tale, Carte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logic of the tale and situates the tale in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when the Grimm Brothers wrote their version. She raises many questions about the Grimms’ version. One question concerns Cinderella’s mother’s reaction to Cinderella’s father’s remarriage: “And what can the real mother/wife do about it?” (Carter, 1990:112). Another question concerns Cinderella’s father’s absence in the tale: “Is he [Cinderella’s father] so besotted with his new wife that he cannot see how his daughter is soiled with kitchen refuse and filthy from her ashy bed and always hard at work?” (Carter, 1990:112). She also finds it illogical for Cinderella to ask her father to bring her the first branch that knocks against his hat on his way home and believes that it

must be her dead mother who “came into the girl’s [Cinderella’s] mouth and spoke the request for her” (Carter, 1990:114). By raising these questions Carter alerts the reader to the predominant role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plays in the whole story.

Significance of Cinderella’s Marriage

On the whole “The Mutilated Girls” demonstrates the working mechanics of the Grimms’ tale by foregrounding the absence of the father and the active role of the mother. Furthermore, it also makes two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classic tale. The first change concerns the beautiful dress that Cinderella needs for the ball. In the Grimms’ tale, it is the turtle dove up in the hazel tree on Cinderella’s mother’s grave that offers her the beautiful dress and jewelry. The turtle dove has long been understood as the incarnation of Cinderella’s mother. But Carter slightly revises this scene and lets the mother’s ghost steal the stepsisters’ beautiful dress and jewelry so that “the stepsisters had to stay home and sulk because they had nothing to wear” (Carter, 1990: 114–115). This seemingly small change of the classic tale actually is very telling: it is indeed a very challenging job for Cinderella to win the heart of the prince. Her stepsisters are not the only rivals that she has. Therefore, Carter makes another change to the classic tale by letting the turtle dove accompany Cinderella to the ball and “make her dance vivaciously, so that the prince would see her, so that the prince would love her, so that he would follow her and find the clue of the fallen slipper...” (Carter, 1990:115). By making such a change of the dance scene Carter emphasizes the fierceness of the competitio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Having a charming appearance is far from enough to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the

prince. Cinderella must also have a strong physical body and a clever mind. All these imply that Cinderella's successful marriage to the prince involves her mother's strenuous efforts. The Grimms' stress on the role of Cinderella's extreme beauty in winning the heart of the prince is simply an illusion.

Furthermore, Carter also raises the issue of the necessity of marriage for Cinderella and other girls: "You[the reader] might have thought her [Cinderella's mother] own experience of marriage might have taught her to be wary, but no, needs must, what else is a girl to do?" (Carter, 1990: 114). The classic tale does not tell us what exactly causes the death of Cinderella's mother. Here Carter indicates that the mother's death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marriage. In other words, the mother probably does not have a happy marriage. However, as a girl, Cinderella has no alternative but to get married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Only by marriage can she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sustaining her life, and if she is lucky enough, she might lead a wealthy life. Therefore, although the mother knows marriage cannot guarantee a girl's happiness, she has to try her utmost to secure a husband for Cinderella. And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the stepmother, who is also desperate to find a husband for her own daughters. If a gir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no choice but to try every means to marry herself off, what is the social condition for girls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rter's question "what else is a girl to do?" invites us readers to think about a girl's choices today. The fact that girls today have relatively many more choic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aracterizes Carter's tale as a cautionary tale for girls. Even though Cinderella marries the princ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he can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Abundant retellings of the Cinderella tal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ve made this point explicitly. Anne Sexton mocks the dull life that Cinderella and the prince lead after their marriage: "Cinderella and the prince/Live, they say, happily ever after,/Like two dolls in a museum case/Never bothered by diapers or dust,/Never arguing over the timing of an egg,/Never telling the same story twice/Never getting a middle-aged spread/Their darling smiles pasted on for eternity/Regular Bobbsey Twins/That story". It is obvious that such a kind of life is not a worthwhile one, let alone a happy one. Likewise, both Tanith Lee and Roald Dahl also question the illusory nature of the Grimms' tale and Perrault's tale. Therefore, by revealing the grim reality of marriage, Carter aims to tell her readers that marriage is not the only choice that a girl may have today.

While "The Mutilated Girls" is mainly a rewrite of the Grimm Brothers' version of the Cinderella tale, Carter's second rewrite "The Burned Child" shows its adaptation from several versions, such as an Indian version "The Story of the Black Cow," a Chinese version "Pock Face," all of which tell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nderella's dead mother into a cow that nourishes Cinderella. But unlike these other variants, "The Burned Child" tells of Cinderella's relations with her mother. Michelle Ryan-Sautour appropriately says it is a self-conscious reflection on the theme of "motherly identity and love" (Ryan-Sautour 35). In fact, this maternal love is stressed repeatedly in all the three variants. In "The Mutilated Girls" the dead mother is described to "Burn as she might with love..." (Carter, 1990: 112), while in "The Burned Child" the dead mother feels "perfect exquisite pain of love" (Carter, 1990:

117). Although Carter's third variant "Traveling Clothes" does not explicitly use the word "love" to describe the dead mother's affection for Cinderella, her act of kissing Cinderella clearly shows her maternal love.

The last line of each of Carter's rewrites apparently expresses Cinderella's mother's satisfaction with what she has done for Cinderella—" 'See how well I look after you, my darling!' " (Carter, 1990:116), " 'Now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 (Carter, 1990:119), and " 'Go and seek your fortune, darling' " (Carter, 1990:120). The same position of these three lines in each variant creates the effect that Cinderella's mother has done whatever she can for Cinderella. However, if we locate the mother's words in the ultimate state that Cinderella is in, we may find that these words have ironic connot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rewrite, Carter makes a twist of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the Grimms' version.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the Grimms' tale and then in the Carter's tale.

This is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the Grimms' tale:

"Look, look!

No blood in the shoe!

The shoe's not too small.

He's bringing the right bride home." (Carter, 1982:29)

Below is the turtle dove's words in Carter's "The Mutilated Girls":

'Her foot fits the shoe like a corpse fits the coffin!

'See how well I look after you, my darling!'" (Carter, 1990:116)

The Grimms' tale emphasizes the rightful identity of Cinderella as the bride of the prince. However, Carter's tale foregrounds horrible images. The comparison of Cinderella's

foot to corpse and the comparison of her shoe to coffin conveys disturbing messages. It directs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the dear prices that Cinderella has paid in exchange for her marriage to the prince. In such circumstances, we cannot help but rethink about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Is such marriage worth promoting?

Carter's second rewrite ends with the mother's words "Now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It is true that Cinderella owns a house and money by marrying the man she wants, and the tale says "She did all right" (Carter, 1990: 119). It seems as if marriage means possessing a house and money. Back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a married woman owning a house and money did mean a lot, as she belonged to the private sector only and could not make a living on her own. However, in the late twentieth and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ies, when marriage is equivalent with a woman owning a house and money, such a marriage does not mean much for her, as she may have other choices apart from marriage and marriage cannot guarantee a happy life. The last rewrite "Travelling Clothes" ends with the mother saying to Cinderella: "Go and seek your fortune". Can Cinderella find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It remains a big question, because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ale reveals the discouraging fact that Cinderella is simply repeating her mother's life, and her mother is repeating her mother's life: "I [Cinderella's mother] stepped into my mother's coffin when I was your age" (Carter, 1990:119; italics in original). For one thing, both the grave and the coffin are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death. Although the coffin, to the great surprise of Cinderella and the reader alike, turns into a coach and horses, its new association with hope delivers the message that hope

is not easily attained. For another, since Cinderella's mother dies young, there is a high possibility that Cinderella will repeat her mother's story. Furthermore, the open ending makes uncertain Cinderella's fate.

Conclusion

Carter wrote three versions of Cinderella tale. These rewrites reveal the socializing function of the classic tal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se rewrites demonstrate both the passivity and activity of Cinderella, thus indicat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Cinderella tale. By rewriting the classic Cinderella story, Carter draws the reader's attention to h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imm Brothers and Perrault's representation of Cinderella, her mother and father, and her stepfamily. A comparison of the representations yields several findings. The classic tale conceals its sexist stance and patriarchal norm by using Cinderella's mother as the spokesperson for the mainstream culture that promotes the superiority of males to females, and this partly accounts for the popularity of the tale, as back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 fairy tale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and served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especially girls. What's more, Carter's retellings direct our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In doing so Carter reveals the limited choices that girls had in the past So that their mothers had to resort to every means to help them to secure a wealthy husband. In the meanwhile, Carter draws ou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le and implies that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arriage for the sake of material comforts is not necessarily desirable for girls.

References

- [1] Heiner, H.A. 2012. Introduction. In H. A. Heiner (ed.). *Cinderella: Tal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xington: SurLaLune Press: 1-16.
- [2] Zipes, J. 2000. Introduction. In J. Zipes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airy Ta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Zunshine, L. 2006. *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4] Zipes, J. 1987. *Don't Bet on the Prince: Contemporary Feminist Fairy Tales in North America and England*. New York: Routledge.
- [5] Bacchilega, C. 1997. *Postmodern Fairy Tales: Gender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6] Zipes, J. 1998. Crossing Boundaries with Wise Girls: Angela Carter's Fairy Tales for Children. In D. M. Roemer and C. Bacchilega (eds.), *Angela Carter and the Fairy Tal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7] de la Rochere, M. H. D. 2013. *Reading,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gela Carter's Translational Poetic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8] Gruss, S. 2009. *The Pleasure of the Feminist Text: Reading Michele Roberts and Angela Carter*. Amsterdam and New York: Rodopi.
- [9] Jordan, E. 1992. The Dangers of Angela Carter. In I. Armstrong (ed.) *New Feminist Discourses: Critical Essays on Theories and Texts*. London: Routledge.
- [10] Tiffin, J. 2009. *Marvelous Geomet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 [11] Lau, Kimberly J. 2015. *Erotic Infidelities: Love and Enchantment in Angela Carter's The Bloody Chamber*. Detroit: Wayne State Uni-

versity Press.

[12] Warner, M. 1992. Introduction. In A. Carter (ed.). *The Second 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 C. Sargood, (Illus.).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3] Zipes, J. 1979. *Breaking the Magic Spell: Radical Theories of Folk & Fairy Tales*. New York: Routledge.

[14] Carter, A. 1990. Introduction. In A. Carter (ed.). *The 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 C. Sargood (Illus.). London: Virago Press Limited.

[15] Carter, A. 1993. *American Ghosts & Old World Wonder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6] Dundes, A. ed. 1982. *Cinderella: A Folklore Casebook*. New York: Garland.

[17] Tatar, M., ed. 1999.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Texts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18] Ryan-Sautour, Michelle. 2011. Authorial Ghosts and Maternal Identity in Angela Carter's "Ashputtle or The Mother's Ghost: Three Versions of One Story" (1987). *Marvels & Tales*, Vol. 25, No.1: 33-50.

[19] Zipes, J. 1994. *Fairy Tale as Myth/ Myth as Fairy Tal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continued from Page 045,接045 頁)

Reflective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in the Western Local University

ZHANG Fum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Abstract] *The intensive fusion of information an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ecological imbalanc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lso provides the basis for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regards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teaching ecology, advocates relying on various kinds of teaching resources to build the "1 + 1 + X" teaching mode, namely "teacher's classroom teaching + autonomous center self-learning + social practice environment" mo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ecological teaching principle, selecting a local university in the western region as sample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it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and explores and confirms the actuality, feasibility, and practice operation mode of the local universiti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Keywords] *college english; ecological teaching; the student main body; ability training*

學術英語比較修辭研究

——元文本在中國和英美經濟文本中的使用

呂中舌^① 李憶時^②

清華大學外文系 北京 100000

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 東京 日本

摘要:伴隨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中國經濟學家使用英語在英文期刊上發表經濟學論文。由於文化的差異,中國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在修辭策略和修辭方式的選擇上可能與英美經濟學家有所差異。本文利用語料庫研究方法比較元文本 metatext 發現中國經濟學家較多使用連接詞、較高頻率使用起因果作用的連接詞、較多使用復數,並建議中國經濟學家適當減少起轉折作用的連接詞,從而增強論文的可讀性。

關鍵詞:元文本;比較修辭;學術英語寫作;連接詞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比較修辭學關注二語或外語寫作中存在的問題,並試圖用作者母語及母語文化的影響來解釋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Connor 1996)。Kaplan(1966)發現學術論文寫作與作者母語的文化背景緊密相連。因此,研究某種文化所特有的修辭方式越來越吸引語言研究者。

近年來對比修辭研究十分關注作者的文化背景對其學術論文寫作的影響(Connor, 1996):例如, Mauranen (1993) 比較了芬蘭和英美經濟學家論文中元文本的使用,發現與英美經濟學家相比,芬蘭人使用較少元文本。在英美文化中,為方便讀者更好地解讀並認同作者的立場和觀點,作者需要借助一些修辭中的原本本來幫助和引導讀者(Hyland, 2005)。他們有義務借用修辭手段闡述句子之間、段落之間的銜接以及觀點之間的邏輯,以避免誤解。

應用語言學家如 Kaplan(1972)認為受八股文的影響,漢語文本具有非綫性特徵,即:委婉含蓄,點到為止,忌直奔主題。然而,西方學者的表達方式非常直接:語言簡潔、直白。無論演繹或推理都與論證有直接的關聯。

目前國內外已有相當數量的語言學家研究了中國文化對英文寫作的影響,但仍鮮有研究把關注點集中在某一學科。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西方社會已經認識到中國經濟不可小覷,他們急于了解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國家體制對經濟的影響;市場的運作和杠杆作用等。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前往英語國家攻讀經濟學學位並在國際期刊上用英語發表學術論文。雖然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具有英語國家留學經歷,但受母語影響,他們的論文仍有可能展現出一些中國式的修辭方式。鑒于此,對比研究中國和英美經濟學學術論文中的修辭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這一研究不僅有助於中國經濟學家更好地撰寫他們的學術論文,對其他領域的學者也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文獻綜述

首先我們介紹了以往研究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對元文本的界定;回顧了 Kaplan (1966) 關於文化和修辭策略關係的研究,在分析了中國文化對漢語修辭策略影響的基礎上,我們重點介紹了 Mauranen (1993) 對芬蘭和英美經濟學家發表論文中元文本的比較研究。她的研究具有啟發意義,因為她揭示了即

①呂中舌,女,教授、博士生導師、語言學博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和文體學

②李憶時,男,經濟學在讀碩士;文學學士、經濟學學士,研究方向:應用語言學、應用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和計量經濟學

使在規範的學術論文中,文化也有可能對修辭模式產生影響。當然,中國與英美經濟文本的不同之處,同芬蘭與英美文本的不同之間也存在差異。

2.1 元文本的定義

元文本意為關於文本的文本。Crismore 和 Farnsworth (1990)認為:元文本可以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的視角。Mauranen (1993)認為元文本可以使讀者認識到作者的存在。對於元文本,目前並沒有統一的定義。

學者們通常從狹義和廣義的視角定義元文本。狹義元文本指:起到組織文本功能的文本(Enkvist, 1975)。Vande Copple (1985) 和 Hyland (2014)則贊成廣義元文本,即:元文本不祇局限在組織文本的功能上;同時還可展示作者對其文章內容的態度、表達確定性/不確定性、起到和讀者交互的作用。從廣義視角 Vande Copple (1985)將元文本分成七類: text connectives, code glosses, illocution markers, narrators, validity markers, attitude markers 和 commentaries. Hyland (2005)對元文本的區分更加細化。他先把元文本分成兩個大類,兩個大類下又各有五個小類。第一大類的元文本起到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作用,具體包括: transitions, frame markers, endophoric markers, evidentials, 和 Code glosses。另一大類叫做“交互資源”,幫助讀者參與到論證的過程中,具體包括: hedges, boosters, attitude markers, self-mentions 和 engagement markers。

鑒于文本高度依賴語境,也就是說很多文本祇有在具體語境下才能判斷出是否為元文本。而且,在某個語境下可以被判斷為元文本的文本或許在其他語境下可能就不再是元文本。受篇幅限制,本研究擬使用 Antconc 軟件將統計限制在對語境依賴度較低的兩種元文本上,即:連接詞和“作者存在詞”這兩種元文本上。第四部分將比較這兩種元文本在中國學者組和英美學者組中的使用情況。

2.2 Kaplan 的文化獨有修辭策略研究和

其它比較修辭研究

通過比較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英語寫作, Kaplan (1966)發現在這些文章中存在着不同的修辭模式。比如:英語母語學習者的寫作在結構上或者是演繹或者是推理,這種模式被稱為綫性模式。相反,在東方文化中,寫作傾向于非綫性。作者通常在他們的文章中加入很多不直接相關的內容。

Cai (1993)認為,八股文依然影響着今天的中國學生。在八股文中的“起承轉合”結構中,“起”引出話題,“承”承接論點,“轉”添加一些看似不相關的內容,“合”總結整篇文章。這種結構極大地影響中國學者的表達習慣和修辭模式。

Ron Scollon (1991)認為中文文章的含蓄來自于東方文化中同西方文化不同的對“自我”這一概念的認知。他認為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影響着西方學者,因為對個人的強調自然引出對個人的觀點和情感的重視,這體現在修辭模式和策略上就是直接性。然而,在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代表的東方傳統文化中,個人是通過“孝悌忠信”來進行自我實現的。個人是在父母與子女、兄弟、君臣和朋友這四種核心關係中才得以存在。在這種文化下,如果一個人過于強調自己、會被認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因此,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中國人會傾向于避免直接而選擇含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影響中國學者修辭模式的選擇。Cai (1993)認為學術文章的修辭策略有可能受教育背景影響。在英美文化中,學術文章更加側重于邏輯和推理,而在中國文化中,好文章應該引經據典。在古代中國,孔子的話被視為真理,因此古代文章中經常可以看到“子曰”。我們可以假設:雖然中國的經濟學家可能已經完全掌握了英文,但他們的文章中依然會體現出某些中國獨有的修辭策略。

2.3 Mauranen 對芬蘭和英美經濟文本的研究

Mauranen (1993)對英美經濟學家和芬蘭經濟學家發表的經濟學論文的修辭方式做

過比較研究。在比較元文本在英美和芬蘭經濟學家論文中的比例時,她祇比較了四種元文本,分別是連接詞,回顧,展望和動作標識。這是因為,她採取的是狹義的元文本的概念,即:起到更好地組織文本作用的文本。

Mauranen(1993)研究中的連接詞在不同的語境下可以是 Hyland(2005)的廣義元文本中的 transitions, frame markers 和 code glosses。“回顧”和“展望”可以被看作“內部標記”;“動作標記”可以被看作“模式索引”。Mauranen 沒有把“外部證據”和“交互文本”算作元文本。她發現:芬蘭學者很少使用元文本。她認為,這是因為在芬蘭文化中,學者和知識分子傾向於尊重讀者並且把他們視為具有較高智力水平的人,因此文章作者沒有必要使用元文本來引導具有足夠相關背景知識和理解能力的讀者。

Mauranen(1993)祇選取了兩篇論文作為語料,分別來自芬蘭經濟學家和美國經濟學家。她在選取論文的過程中,把研究領域限定在稅收方面,把研究方法限定在理論建模。這一控制變量的思想對本研究啟發很大。本研究在構建語料庫的過程中,也限定了語料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然而,本研究不能和 Mauranen 一樣計算回顧,展望和動作標識的比重,因為這些元文本的判別高度依賴語境。本研究所建語料庫小有規模,祇能限制在兩種元文本:連接詞和“作者存在詞”。

三、數據收集

本研究比較兩組經濟學家的學術論文:中國經濟學家和英美經濟學家。我們先把這些論文轉換為可以分析的 txt 格式,又構建次級語

料庫加以驗證。

3.1 主語料庫的構建

為了確保語料選擇的科學性,兩組論文選自于同一本期刊:《制度和理論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選取的文章全部通過建立數學模型的方法來構建理論,而非經驗研究。這是為了確保元文本的差異不是由於論文研究方法的不同而造成的。經過仔細檢查,在 1985 年到 2010 年期間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中共有八篇中國經濟學家發表的論文符合本研究的取樣標準。本研究採取以下步驟來判斷論文作者是否系中國大陸學者:首先,通過作者名字的英文拼寫來猜測其是否來自中國大陸。其次,通過在 GOOGLE 中檢索他/她的簡歷來判斷其是否在攻讀博士之前在中國大陸或臺灣地區接受過教育。為對比研究,我們也選取了八篇英美經濟學家的論文。判斷他/她是否來自英美與判斷他/她是否來自中國大陸的步驟是一致的。

每篇文章都被編碼。在中國經濟學家組,使用數字 1-8 編碼。在英美組,使用字母 A 到 H 編碼。每篇文章都分為三個部分,即介紹部分,主體部分和結尾部分。為了方便,介紹部分被賦值數字 1,主體部分被賦值數字 2,結尾部分被賦值數字 3。中國經濟學家組的代碼是 L2,英美組的代碼是 L1。之後,我們採用 Antconc 軟件來統計兩個語料庫中元文本在使用上的差異並解釋這些差異形成的原因。下面兩張圖表描述了主語料庫的基本信息。

表 3.1 英美經濟學家語料庫的基本信息

		L1A	L1B	L1C	L1D	L1E	L1F	L1G	L1H	總計
介紹部分	句數	88	38	13	18	47	25	62	41	332
	詞數	2346	1108	309	580	1317	558	1564	946	8728
	句子長度	26.66	29.16	23.77	32.22	28.02	22.32	25.23	23.07	26.29
主體部分	句數	207	253	305	262	129	153	157	218	1684
	詞數	5004	5466	6922	8004	4083	3773	2750	4791	40793
	句子長度	24.17	21.60	22.70	30.55	31.65	24.66	17.52	21.98	24.22

		L1A	L1B	L1C	L1D	L1E	L1F	L1G	L1H	總計
結尾部分	句數	31	17	63	16	11	6	17	16	177
	詞數	925	365	1291	640	285	161	403	364	4434
	句子長度	29.84	21.47	20.49	40.00	25.91	26.83	23.71	22.75	25.05
總計	句數	326	308	381	296	187	184	236	275	2193
	詞數	8275	6939	8522	9224	5685	4492	4717	6101	53955
	句子長度	25.38	22.53	22.37	31.16	30.40	24.41	19.99	22.19	24.60

表 3.2 中國經濟學家語料庫的基本信息

		L21	L22	L23	L24	L25	L26	L27	L28	總計
介紹部分	句數	45	72	61	26	34	89	31	39	397
	詞數	998	1619	1762	518	960	2419	749	866	9891
	句子長度	22.18	22.49	28.89	19.92	28.24	27.18	24.16	22.21	24.91
主體部分	句數	193	260	138	296	143	213	269	267	1779
	詞數	4077	5546	3790	5895	3406	5330	5422	7010	40476
	句子長度	21.12	21.33	27.46	19.92	23.82	25.02	20.16	26.25	22.75
結尾部分	句數	58	25	13	17	9	66	25	4	217
	詞數	1268	748	402	406	317	1668	455	121	5385
	句子長度	21.86	29.92	30.92	23.88	35.22	25.27	18.20	30.25	24.82
總計	句數	296	357	212	339	186	368	325	310	2393
	詞數	6343	7913	5954	6819	4683	9417	6626	7997	55752
	句子長度	21.43	22.17	28.08	20.12	25.18	25.59	20.39	25.80	23.30

3.2 次級語料庫的構建

在中國經濟學家語料庫中,有 2393 個句子。在英美經濟學家語料庫中,有 2193 個句子。因為判別一個詞,一個詞組,一個分句甚至一個句子是否為元文本沒有一個單一明確的標準而且有時候元文本的判別高度依賴語境,所以如果逐個審閱每個句子將是一項非常耗時的工作。

Hyland (2014)在計算大語料庫中元文本的比例時面臨着同樣的問題。他選擇了隨機抽樣的方法,從每一學科的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語料庫中各抽取了五十個句子作為語料庫。

受到 Hyland 的啟發,本研究通過隨機抽

樣建立次級語料庫。在英美經濟學家語料庫中選取 100 個句子。為了使兩個庫中每個句子被選中的概率一致,中國經濟學家語料庫中選取了 109 個句子。

四、數據結果和分析

此部分第一節和第二節將分別呈現主語料庫中連接詞和“作者存在”的不同使用情況并試圖分析這種差異形成的原因;第三節將介紹次級語料庫中元文本的不同使用情況。

4.1 “連接詞”的比較研究

對於連接詞,並沒有一個單一明確的判斷標準。根據 Sales 和 Feak (2009: 27)的定義,連接詞和詞組可以歸劃為三類:分別是 sub-

ordinators, sentence connectors 和 phrase linkers。按照不同的作用劃分,可以歸劃為七種,分別是 addition, adversativity, cause and ef-

fect, clarification, contrast, illustr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下表展示了使用頻率高的連接詞和詞組。

表 4.1 連接詞 (Swales and Feak, 2009: 27)

	subordinators (introducing a dependent clause that must be joined to a complete sentence)	sentence connectors (introduce a complete sentence)	phrase linkers (introduce a noun phrase)
addition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moreover	
adversativity	Although	However	Despite
	Even though	nevertheless	In spite of
Cause & effect	Because	Therefore	Because of
	since	As a result	due to
		Consequently	As a result
		Hence	
		thus	
clarification		In other words	
		That is (i.e.)	
contrast	While	In contrast	unlike
	whereas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conversely	
illustration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intensification		On the contrary	
		As a matter of fact	
		In fact	

上表雖然并不包括所有的連接詞,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全面,因為上表中的連接詞的使用總計在所有連接詞中已經占據了一個相當大的比重。Lei (2012:272) 統計的英文學術論文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十個連接詞如下:

Also, However, Thus, For example, i.e.,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at is, Again and So。這十個連接詞的使用頻率占所有連接詞使用的大約百分之六十。在同一篇論文中,Lei(2012: 272)還指出中國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中使用

頻率最高的十個連接詞是：Also, However, Thus, Therefore, For example, i.e., So, Then, In addition (to), That is. 占了所有連接詞使用的 59%。我們可以看出, Lei 的兩組語料中高頻連接詞的使用情況祇有微小的差異。

我們使用 Antconc 計算了中國經濟學家組和英美經濟學家組中上面提到的所有連接詞的使用頻率。接着我們計算了每一萬字中這些連接詞的使用頻率。結果如下表所示。

Table 4. 2 英美經濟學家語料庫和中國經濟學家語料庫中連接詞的使用頻率

	Connectors	L1		L2	
		frequency	per 10000 words	frequency	per 10000 words
addition	also	104	19.28	116	20.81
	Furthermore	8	1.48	12	2.15
	moreover	11	2.04	14	2.51
	in addition	11	4.08	18	6.46
	then	151	27.99	129	23.14
	again	13	2.41	10	1.79
	總計	298	57.27	299	56.86
adversativity	Although	19	3.52	18	3.23
	however	85	15.75	79	14.17
	Despite	4	0.74	0	0.00
	Nevertheless	3	0.56	5	0.90
	Even though	1	0.37	1	0.36
	總計	112	20.94	103	18.65
Cause & effect	Because	23	4.26	17	3.05
	As a result	3	1.67	13	7.00
	Consequently	3	0.56	16	2.87
	thus	65	12.05	82	14.71
	Hence	12	2.22	10	1.79
	so	98	18.16	96	17.22
	therefore	55	10.19	50	8.97
	since	52	9.64	85	15.25
	總計	311	58.75	369	70.85
Clarification	That is	13	4.82	29	10.40
	i.e.	31	5.75	41	7.35
	In other words	3	1.67	8	4.30
	總計	47	12.23	78	22.06

		L1		L2	
	Connectors	frequency	per 10000 words	frequency	per 10000 words
contrast	While	7	1.30	12	2.15
	whereas	4	0.74	20	3.59
	In contrast	8	2.97	20	7.17
	On the other hand	5	3.71	15	10.76
	unlike	6	1.11	4	0.72
	conversely	0	0.00	1	0.18
	總計	30	9.82	72	24.57
illustration	for example	47	17.42	33	11.84
	For instance	9	3.34	11	3.95
	總計	56	20.76	44	15.78
intensification	On the contrary	4	2.22	3	1.61
	In fact	12	4.45	2	0.72
	總計	16	6.67	5	2.33
總計		870	161.25	970	173.98

以上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學家傾向于使用很多“因果、明確和轉折”關係的連接詞（因果：70.85 vs. 58.75；明確：22.06 vs. 12.23；轉折：24.57 vs. 9.82）；而英美經濟學家更傾向于使用“說明和強化”關係的連接詞（說明：20.76 vs. 15.08；強化：6.67 vs. 2.33）；在“附加和相反”關係的連接詞上，兩組的使用情況祇有微小的差異（附加：57.27 vs. 56.86；相反：20.94 vs. 18.65）。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學家比英美經濟學家使用更多的連接詞。我們的這一發現進一步證明了 Lei (2012) 的研究結果。她在論文中指出，中國的博士在其英文論文中比英語母語者使用更多的連接詞。她認為這其中包括連接詞的錯誤使用。

判斷語料庫中連接詞是否存在濫用或者誤用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非常耗時。而我們的語料庫小有規模，短時間內無法完成。但是我們還是發現了非常有意義的現象：中國組比英美組的經濟學家使用頻率高的連接詞的前四位分別是“Consequently, whereas, as a re-

sult and on the other hand”。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學家更頻繁使用的是起因果作用和轉折作用的連接詞。

我們還發現中國組經濟學家祇是比英美經濟學家更頻繁地使用某幾個起因果關係的連接詞。而有些起因果關係的連接詞，中國經濟學家幾乎不用，使用頻率極低，如：Hence, so, therefore 和 because。中國經濟學家傾向于更多地使用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和 since。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經濟學家在因果關係連接詞的選擇上由于非母語而缺少多樣性。

關於起轉折關係的連接詞的使用情況，我們的發現和 Kaplan (1966) 對於東方修辭策略的解讀是一致的。東方模式傾向于非線性和不直接。下面兩幅圖展現了 Kaplan (1966) 所描述的修辭模式。

在這種修辭模式下，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說，自然存在着更多轉折的文本，當然也需要更多起轉折作用的連接詞。

這一結果也同 Cai 的發現一致。Cai (1993) 認為八股文中的“轉”可能影響中國英

語學習者的寫作模式。“轉”是八股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受這種傳統的影響，中國學者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會“轉”。對於英語水平相對較低，未受過學術英語寫作訓練的學者來說，他們可能忘記在這些“轉”的文本前添加連接詞。但是中國的這些經濟學家或許因為他們的英語水平很高，或許因為他們的這些文章經過了英語為母語的學者或者機構的修改，這些論文中使用了比較多的起轉折作用的連接詞，以使文章前後主題連貫、富有邏輯性。

我們還發現：英美經濟學家傾向于在他們的論文中使用比較多的 for example，這和 Mauranen(1993)在研究中發現英美經濟學家對讀者更加友好的結論是一致的。中國經濟學家并非不尊重讀者，而是認為他們的讀者應該具有相當豐富的相關專業知識和相當高程度的智商，舉出衆多例子無意義。

“強化”連接詞，如：“in fact”，“as a matter of fact”，和“on the contrary”中國經濟學家用得寥寥。這或許是因為這些連接詞本身使用頻率就小，加之抽樣的偏差。這種差异有待進一步研究。

4.2 “作者存在”比較研究

Mauranen(1993)發現，與英美經濟學家相比，芬蘭經濟學家傾向于較少地展現他們的存在。廣義上來講，作者存在也是一種元文本。它使得讀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存在，並進一步加深和作者的交流(Mauranen, 1993)。如下圖顯示的那樣，與芬蘭經濟學家截然不同，中國經濟學家傾向于更多地顯示他們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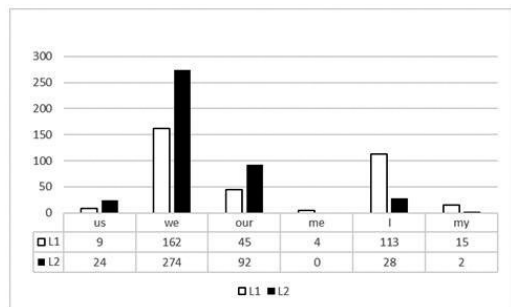


圖 4.2 中國和英美組顯示作者存在的頻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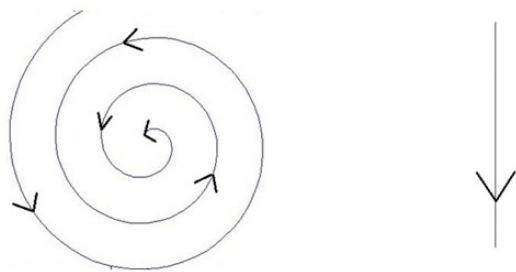


圖 4.1 東方和西方的修辭模式

我們使用 Antconc 來統計六種第一人稱代詞顯示作者存在的頻率，分別是“us”，“we”，“our”，“me”，“I”和“my”。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學家組比較多地使用顯示作者存在的代詞。中國經濟學家組顯示作者存在第一人稱代詞使用的頻率總計是 420 (75.33 每萬字)。英美組的頻率是 348 (64.50 每萬字)。然而有趣的是，中國經濟學家對“us”，“we”和“our”有着強烈的偏好，而鮮使用“me”，“I”和“my”。盡管在總量上，中國經濟學家組作者的存在感更強，但是他們似乎在避免展示個人的存在，而是選擇使用集體的存在來替換。這一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

我們推測，中國經濟學家有可能擔心如果他們的文章中有太多的“我”，他們的文章有可能被批評為過于主觀。因此，他們試圖通過使用“we”，“us”和“our”來緩衝這種影響。然而，這樣做忽略了一個事實：西方讀者看到“we”會感覺不舒服。他們會認為：既然文章的署名是一個人，就不應該用“我們”來代替“我”。這種虛假的客觀可能使得讀者反感或不悅，他們有可能覺得自己被強迫接受作者的理論和觀點。

4.3 次級語料庫中廣義元文本的比較研究

因為計算主語料庫中所有廣義元文本的數量是一項艱巨和短時間內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我們採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從英美經濟學家組裏抽取了 100 個句子，從中國經濟學家組中抽取了 109 個句子。之後，我們通過逐句判定認真計算了元文本的數量。之後計算了每萬字中元文本的數量。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4.3 次級語料庫中元文本的比較

		Chinese	Anglo-American
互動性元文本	transitions	269.81	214.75
	frame markers	21.08	89.14
	endophoric markers	236.09	109.40
	evidentials	210.79	259.32
	code glosses	134.91	121.56
	總計	872.68	794.17
交互性元文本	hedges	46.37	40.52
	boosters	59.02	44.57
	attitude markers	4.22	4.05
	engagement markers	92.75	20.26
	self-mentions	67.45	101.30
	總計	269.81	210.70
總計		1142.50	1004.86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總體上中國經濟學家使用比較多的元文本。無論是互動還是交互功能的元文本,中國經濟學家都用得比較多。但英美經濟學家却比較多地使用了 frame marker (89.14 vs. 21.08), evidential (259.32 vs. 210.79) 和 self-mention (101.30 vs. 67.45)。

Frame marker 用來表明順序或者展示文本的不同階段。代表性的 frame marker 有 “first, second, finally, as follows”。我們的這一發現進一步證實了呂中舌(2016)的研究結果,即:在中國仍然有學者沒有意識到利用 Frame marker 這樣的修辭手段來建立文章中的邏輯性和連貫性;同時,盡管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學者對此修辭手段有一定的認識,但因為自身英語水平有限,詞匯量匱乏,在使用英文修辭手段時常常會出現錯誤;加之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國學者為體現自己的文采和水平常常有意含蓄、點到為止,至于讀者是否理解完全是讀者自己的職責了。

英美經濟學家傾向于較多使用 evidential。這說明他們在文章中較多地引用其它作者來支持、證實自己的觀點。一方面這是他們母語帶來的優勢;對於英美經濟學家來說,閱讀大量的英文文獻和期刊比較容易。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說,盡管他們已經學習英語多年,但是在閱讀英文文獻時的速度常常不能與母語者相媲美。

在次級語料庫中,英美經濟學家語料庫中的“自我提及”更多。這看起來與主語料庫的結論是相悖的。這或許是隨機抽樣帶來的偏差。然而,次級語料庫顯示的“作者存在”的偏好與之前的發現是一致的,即:英美經濟學家組的自我提及中絕大部分都是“I”,而中國經濟學家組的自我提及絕大部分都是“we”。

Transitions 和模式索引都屬於連接詞。因此次級語料庫的結果與主語料庫的結果保持一致。這裏不再贅述。

對於 endophoric markers, hedges, boosters, attitude markers 的比較差異,現階段不能

判斷這種差異是否真實,是否存在偏差,以及如果真實存在,存在的原因是什麼。由於時間和篇章的限制,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中國經濟學家還傾向於使用更多的 engagement。這和對 we 的偏好有很大相關性。比如,如果語料庫中出現“we hypothesis”,“we”即被計入自我提及,而 hypothesis 則被計入“engagement”。“we”之後總是有“engagement”相伴。因此,中國經濟學家組中存在比較多的“engagement”就可以解釋了。

五、結論

通過回顧元文本,比較修辭學和專注於某一特定學術領域的元文本研究以及構建並分析我們的語料庫,我們發現,中國經濟學家比英美經濟學家更多地使用元文本。雖然對中國經濟學家和芬蘭經濟學家來說,英語都並非母語,但是他們對元文本的使用與英美經濟學家的差異是不同的。這也從另一方面進一步證明:這些修辭差異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不同文化造成的而並非完全取決於學者的英語水平。具體來看,由於詞匯量相對匱乏,中國經濟學家比較多地使用有限的幾個因果關係連接詞,缺乏變化和多樣性。由於受“起承轉合”的八股文傳統寫作模式的影響,中國經濟學家更多地使用起轉折作用的連接詞。我們還發現,當展現作者自身的存在時,中國經濟學家更傾向於使用“我們”,而非“我”。這同中國文化中對自我概念的認知有關;在次級語料庫中,中國經濟學家較少使用外部引用,這同英語並非中國人的母語有關聯,同時也同中國文化的影響不無關係。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儘管對於判別高度依賴語境的元文本,本研究 16 篇學術論文的語料庫可以說小有規模,但如果有更多的論文、隨機抽樣能選取更多的樣本,我們的結果將會更加準確、更加具有說服力。

此外,對於造成中國經濟學家和英美經濟學家對元文本使用頻率差異的解釋或許並不全面。比如:中國傳統的八股文對過多使用轉折連接詞影響的程度如何。中國經濟學家

語料庫中作者較少使用第一人稱單數多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主觀性,多大程度上是對自我的不同認知造成的。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說,他們應該注意到自己文章中過多使用連接詞,尤其是過多使用轉折關係連接詞的現象。如果他們的文章結構能夠更加簡潔明了,時刻圍繞主題,少些含蓄和兜圈子,可讀性將會更高。同時,他們也應該注意避免重複使用有限的某幾種起因果作用的連接詞,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多樣、豐富的連接詞。另外,使用第一人稱“我”可能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主觀。如果理論和觀點是準確客觀的,那麼就沒有必要故意減少第一人稱單數“我”的使用,完全可以大膽體現作者自我的存在。

以上研究發現的中國經濟學家學術論文中存在的修辭問題應該不僅僅局限於中國經濟學學術論文,其他領域的英文學術論文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這方面的問題,希望該研究能引起國內不同專業學者的重視,在英文發表論文時注意中西方文化在學術寫作中的差異,盡量使自己的文章結構、修辭手段以及論證更符合西方學術期刊的要求,畢竟目前“多數主要和影響因子高的期刊都由西方國家掌控着”(Hyland, 2009:67)。

References

- [1] Cai G. 1993. Texts in Contexts: Understanding Chinese Students' English Compositions. In Cooper C. R. & Odell L. (eds.), *Evaluating Writing* (2nd ed.). Urbana, I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 [2] Connor U. 1996. *Contrastive Rhetoric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Crismore A. & Farnsworth R. 1990. Metadiscourse in popular and professional science discourse. In Nash W. (ed.), *The writing scholar*. Newbury Park, CA: Sage.
- [4] Enkvist N. E. 1975. *Tekstilingvistiikan peruskäsitteitä* [Basic concepts of text linguistics].

Helsinki: Gaudeamus.

[5] Hyland K. 2005. *Metadiscourse: Exploring interaction in writing*. London: Continuum.

[6] Hyland K. 2009. *Academic Discourse*.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7] Hyland K. 2014. *Academic Written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8] Kaplan R. B. 1966.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6: 1–20.

[9] Kaplan R. B. 1972. *The Anatomy of Rhetoric: Prolegomena to a Functional Theory of Rhetoric*. Philadelphia: Center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0] Lei L. 2012. Linking adverbials in academic writing on applied linguistics by Chinese doctoral student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11: 267–275.

[11] Mauranen A. 1993. Contrastive ESP rhetoric: Metatext in Finnish–English economics text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2: 3–22.

[12] Scollon R. 1991. *Eight legs and One Elbow. Stance and Structure in Chinese English Composi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Seco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Adult and Adolescent Literacy, Banff.

[13] Swales J.M. & Feak C. B. 2009. *Academic Writ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Essential Tasks and Skills*. (2nd 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4] Vande Kopple W. J. 1985. Some exploratory discourse on metadiscourse.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36: 63–94.

[15] Lv Z. 2016. A Study on Teaching of PhD Candidates'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3: 118–124.

Contrastive ESP Rhetoric

——Metatex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Economics Texts

LV Zhongshe LI Yishi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00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conomics in China, more and more Chinese economists publish papers in English in economics journals. Becaus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existed in rhetoric strategies and patterns used by Chinese and Anglo-American economists. Through comparing metatexts used in economics pap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economists tend to use more connectors, more cause and effect connectors of limited kinds, more plural forms of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s, etc..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hinese economists use various sources in metatex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adability of their papers.

[Keywords] metatext; contrastive rhetoric; academic English writing; connector

網絡語言暴力中隱喻的批評認知分析

朱淳熙^① 劉文字^②

大連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遼寧大連 116024

摘要:本文借助批評話語分析方法,以具體事件的微博評論為研究對象,探討了網絡語言暴力中隱喻評價功能的主要實現方式及影響,研究了網絡語言暴力中語言、權勢(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價值信念等的衝突)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網民通常疊加使用隱喻表達更為強烈的負面情緒;在分析時,應對照語境背景挖掘隱喻的內涵意義;涉及一些歷史、政治、文化的隱喻內容,對研究者文化素養有着一定的要求。借助批評隱喻分析方法,研究發現:當前我國網民主要由未完全形成價值觀的青少年構成,容易以發表網絡暴力語言的方式宣泄情緒;草根群體的話語權力在現實生活中受社會所支配,因此選擇在網絡上實現自己的話語權力;我國網民的整體素質水平并不是很高,偏向于使用一些暴力的語言,經常通過隱喻來發表言論。

關鍵詞:網絡語言暴力;批評話語分析;隱喻評價功能;話語權力;微博

一、引言

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社交媒體、網絡遊戲平臺和視頻網站不斷發展成熟並且擁有基數龐大的用戶,在此基礎上,網絡語言暴力現象日趨嚴重。網絡語言暴力是指使用謾罵、歧視、詆毀、藐視、嘲笑、騷擾、攻擊、侮辱、欺壓、色情、性歧視等語言,以網絡為媒介對他人或群體進行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傷害。網絡語言暴力產生于信息時代,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問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并日漸成為研究熱點。

隱喻是一種隱含的比喻,它不僅僅是日常語言中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更是一種人類的認知現象。隱喻被認為是一種感知和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通過映射機制構建相似性,隱喻有助於人們利用已知事物理解抽象、復雜的未知事物。同樣,隱喻也存在于網絡語言暴力中。

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分析作為新興的語篇分析方法,主要的內容包括與語篇和語篇生成有關的社會政治問題及其與社會和意識形態的

關係,涉及年齡、種族、性別、階級和態度等社會因素,旨在通過分析語言特徵及其生成的社會文化背景挖掘隱含于語言中的意識形態,進而揭露語言、權勢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復雜關係。為了更為有效深入揭示網絡語言暴力產生作用過程及影響,本研究擬採用批評性話語分析方法探究網絡語言暴力中隱喻的使用,具體方法為批評隱喻分析(Charteris-Black,2004:22)。

二、研究概述

網絡語言具有低語境、口語化、侵害性、隱匿性的特徵,在互聯網上的發生率很高。(丁磊,黃哲程,2016:65)隨着網絡技術的發展以及網絡普及率的提高,網絡語言暴力現象愈發普遍。近年來,對網絡暴力語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倫理、社會文化、社會心理、法律等方面,鮮有從語言學角度對網絡暴力問題的進行解讀和研究的例子。

隱喻是一種修飾話語的語言現象,以隱含比喻為表達形式,普遍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隱喻更是一種認知現象,參與人類的認知過程,通過映射機制構建本體和喻體之

①朱淳熙,女,2015級本科在讀

②劉文字,男,教授,碩士生導師,工學博士,研究方向:社會語言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大連理工大學2017年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國家級)“網絡語言暴力中隱喻的批評話語分析”(2017101411000010511)的階段性成果

間的相似性。隱喻有助於人們利用已知事物理解抽象、複雜的未知事物。Lakoff 和 Turner (Lakoff, Turner, 1989: 65) 強調了隱喻中最重要力量來源之一是其“評價的力量”。認知語言學的興起給隱喻的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隱喻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Charteris-Black 認為, 隱喻是批判性話語分析的核心 (Charteris-Black, 2004: 28)。概念隱喻理論以及概念合成理論為從認知角度理解隱喻提供了理論框架。目前, 對隱喻的研究涉及到各個領域, 林書武 (林書武, 2002: 38) 將其總結為理論探討、空間隱喻研究、對具體問題的研究、涉及其他修辭格的研究、結合腦科學進行的研究、隱喻和文化模型的關係研究、隱喻研究與語言教學等七個主題。此外, 不少學者已經開始關注隱喻傳遞的消極意義。但是他們大多數都討論了借用源喻評價事物的方法來評價目標域的事物。有的從“疾病隱喻”的角度出發, 探討網絡暴力語言中隱喻映射的消極意義。(馬夢琳, 吳建偉, 2017: 81) 鮮有深入研究隱喻評價功能對網絡暴力語言實現方式的影響。本文嘗試對網絡暴力語言中存在的隱喻, 使用批評話語分析方法, 對隱喻評價功能在網絡語言暴力中的實現方式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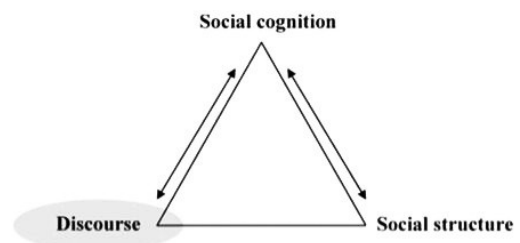
網絡暴力多以暴力語言為載體實現, 因此從語言角度分析網絡暴力行為是一種可行的研究方式, 而批評性話語分析恰好能為其提供有力支撐。批評性話語分析旨在分析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關係, 揭示語篇如何源于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 又如何為之服務。在現代社會中更加有效的權力經常來自對人們認知的影響與控制, 具體表現為通過說服、掩飾或操縱等策略來改變他人的思想以符合自己的利益 (辛斌, 2012: 1)。

三、研究方法

批評性話語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簡稱 CDA) 分析作為新興的語篇分析研究方

法, 主要的內容包括與語篇和語篇生成有關的社會政治問題及其與社會和意識形態的關係, 涉及年齡、種族、性別、階級和態度等社會因素, 旨在通過分析語言特徵及其生成的社會文化背景挖掘隱含于語言中的意識形態, 進而揭露語言、權勢和意識形態之間的複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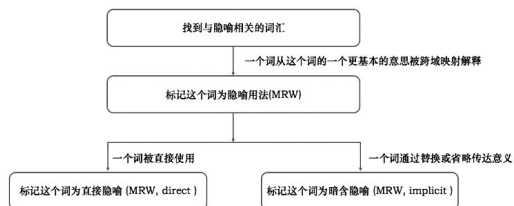
van Dijk (van Dijk, 1993: 280) 認為, 解釋話語的作用需要將話語結構與社會認知聯繫起來, 將社會認知與社會結構聯繫起來。Christopher Hart (Christopher Hart, 2008: 92) 將這種模型用圖 1 來表示。在圖 1 中, 雙向箭頭表示話語與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 陰影部分表示批評話語分析的微觀焦點。本文將使用批評話語分析方法, 通過對網絡暴力語言的研究, 呈現語言、權勢 (話語權力) 和意識形態 (價值信念等的衝突) 之間的關係。



針對網絡語言暴力話語, 本文自建小型網絡暴力語料庫, 主要以微博評論作為研究對象。借助 Pragglejaz Group 的隱喻識別程序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簡稱 MIP) 確定了 456 條含有隱喻的網絡語言暴力語料。

隱喻識別程序由 Pragglejaz Group 開發, 在話語中側重于隱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着重于元語用詞或詞匯單元的語言分析。它旨在提供一種工具, 用于捕捉隱喻的大部分語言表達。首先找到與隱喻相關的詞匯, 當一個詞從這個詞的一個更基本的意義被跨域映射解釋, 標記這個詞為隱喻用法 (MRW)。當一個詞被直接使用時, 將這個詞標記為直接隱喻 (MRW, direct)。當一個詞通過替換或省

略傳達意義，將它標記為一個暗含隱喻 (MRW, implicit)。



四、分析與討論

1. 隱喻評價功能在網絡語言暴力中的實現方式

在概念隱喻理論文獻中，人們普遍認為隱喻是可評價的、具有說服力的，具有潛在的意識形態。在對事件進行網絡評論時，網民經常借助隱喻來表達暴力語言，其產生的侮辱和冒犯效果展現了隱喻的評價功能。Deignan 提出了以下四種評價方式，包括挑選合適源喻、創造評價蘊含、挖掘隱喻腳本，以及映射字面意義後的深層內涵，並且認為這四種評價方式能夠間接、隱性地實現評價功能並塑造出網民的意識形態 (Deignan, 2010)。

(1) 挑選源喻

一些研究人員認為，一些作家或演講者選擇特定的源喻作為一種策略，以便與認同這種源喻重要性的人們保持一致。每個隱喻都有它的源隱喻，通過它我們可以通過源隱喻來評價目標隱喻。當使用隱喻時，讀者將抽象的內容轉移到具體的對象上。然後結合源隱喻的分析和我們對歷史背景和常識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綜合評價目標隱喻。本文根據自建小型網絡暴力語料庫，大致整理出在網絡暴力語料中經常出現的六種源喻類型，經整合歸結為：人體、動物、社會刻板印象、親屬、無用的事物和建築，並依據上述六種類型對語料進行分類和分析。

分析顯示，使用頻率最高的源喻為“動物”，常見的有“狗”“豬”“牛（犢子）”“驢”“雞”“鳥”“草泥馬”“（禽）獸”等地位低下的家禽家畜以及不友善的動物。這些動物本身具有的

低等、惡劣的特徵，通過映射投影到被評論的人或事物上，以實現侮辱的消極意義，產生網絡暴力效果。大量的網絡語言暴力現象顯示，這一類源喻通常指向本身具有低下、消極的社會地位的群體。

使用頻率較為高的還有“人體”類隱喻，以“逼”“屌”“蛋”等性器官為代表，以及“操”“日”等與人體性器官相關聯的動作和代表個人面子的“臉”“腦”等。此外，“親屬”類源喻，通常和“動物”以及“人體”搭配使用，以實現更為強烈的暴力效果。

另一個數量較多的源喻類型為“社會刻板印象”。“賤”“婊”“渣”等負面印象已經被大眾廣泛接受，表達了厭惡、鄙視的情感態度，因此常用於攻擊，實施網絡暴力。還有諸如“河南人”“北京人”等，揭示了人們對不同地域人的刻板印象，在使用它們實施網絡暴力時產生了譏諷效果。

源喻類型“無用的事物”主要涉及排泄物“屁”“屎”，以及廢物“垃圾”“渣”等，源喻類型“建築”的例子較為少見以“磚”“水泥”等建築常用材料為代表。網民把這些事物無用的性質投射到評價的人或事物上，產生其無用的判斷，侮辱攻擊對象。

適當的來源隱喻在有效的話語表達中起着關鍵作用。話語生產者用特殊的源隱喻隱喻作為傳播策略和手段，展示讀者與相關讀者之間的共享價值，以獲得讀者的認同感。適當的來源隱喻可以更好地表達作者的觀點。

(2) 創造蘊含

Schön (1979) 認為，隱喻可以利用故事，連同他們的悖論，提出特定的情況和事件的解釋。他研究了語言隱喻的使用和概念隱喻的實現，例如，他認為“疾病”是所有發言者都熟知的一個故事或模式。即使人們在日常閱讀中沒有注意到隱喻的存在，他們也會潛意識地感覺到隱喻的意義，如果同樣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出現，那麼隱喻的評價和誘導

效果就會增強。

與“疾病”相關的隱喻在網絡語言暴力中也十分常見,“精神病”“神經病”等隱喻用來表達對攻擊對象的不認同。除此之外,一些人名蘊含的故事如“潘金蓮”也經常被網民套用,表達自己認為兩者之間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內涵,對兩者有相同的評價。

(3) 挖掘脚本

Musolff(2006)論證了脚本是“整個概念域及其元素的中間分析範疇”。也就是說,整個“故事”可以由無數不同的劇本組成。此外,每個脚本都有不同的評估偏差。隱喻的使用使得整個比喻“故事”的評價更為普遍和廣泛。仔細研究每一個脚本可以幫助讀者理解、評價隱喻的內容以及作者的意圖。

在網絡語言暴力語料中,較為常見的是直接以“演”“戲”“劇情”“影帝(影後)”等為代表的與故事脚本相關的隱喻,對此類隱喻的分析及對“故事”的理解,傳達了網民對攻擊對象行為的不信任以及負面評價。此外,網民還用“變質”“爛”等隱喻映射攻擊對象消極的發展趨勢。

(4) 映射內涵

隱喻揭示了源與目標隱喻之間的映射關係。隱喻的內涵是實現隱喻評價功能的主要途徑。Deignan(2010)運用隱喻性詞語的研究來觀察字面意思是否與隱喻的內涵相一致。隱喻的深層含義難以從字面意義上被判斷。

該類隱喻經常根據情景衍生不同的內涵意義。色彩具有的豐富內涵意義使得它們經常在網絡暴力語言隱喻中的被運用。從收集的語料來看,“黑”“白”的出現頻率較高。黑色原指莊重、神秘、高貴、正直,然而在網絡暴力語言中,常常用來表達“邪惡”“隱蔽”“反對”等強烈的攻擊含義。與之對應的白色原指公正、純潔、端莊、正直,但網民經常將其與“洗”搭配使用,指開脫罪名,洗清污點。內涵意義的發展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會出現和字面

意義的感情態度相反的情況,如“聖母”原指女神,現在在網絡語言的攻擊中常指犧牲與自己不相幹的人的利益來拯救別人的人。

2. 隱喻評價功能所產生的暴力效果

通過上述四種隱喻評價方式對隱喻進行分析之後,研究發現源喻方式表達攻擊更為直接和強烈。“狗”“豬”等“動物”類源喻,“逼”“屌”等性器官和“操”“日”等與人體性器官相關聯的動作的隱喻,“屁”“屎”“垃圾”等有關廢物的隱喻,把低等的地位映射投影到被評論的人或事物上,有着強烈的直接的侮辱意義,產生暴力效果。社會刻板印象賤”“婊”“渣”等以及地域歧視如“河南人”“北京人”已經被大眾所接受,因此在表達暴力情緒的時候也有直接的效果。

隱喻評價方式	網絡暴力語料
源喻	1.你屌的跟狗一樣。 2.我河南人偷你家井蓋了? 3.放你娘的狗臭屁! 4.渣男也會開交流會互相取經驗嗎?

其次,套用“故事”創造蘊含的隱喻具有較強的評價和誘導效果。與“疾病”相關的隱喻如“精神病”“神經病”等用來表達對攻擊對象的較強不認同,并且有致使更多網民產生這種評價的趨向。套用人們熟知人名蘊含的故事如“潘金蓮”等能夠獲得更多的認同,表達較強的暴力情緒。

隱喻評價方式	網絡暴力語料
創造蘊含	1.官宣了嗎? 一個個就這麼急着跳脚,神經病! 2.西門慶進去了,什麼時候輪到潘金蓮?

“故事”的每個腳本的不同的評價意義，揭示了隱喻使用者的意圖。以“演”“戲”“影帝(影後)”等為代表的直接與故事腳本相關的隱喻，表達了網民對攻擊對象行為的否定以及不信任，而“變質”“爛”等內涵程度的隱喻則映射攻擊對象消極和墮落的發展趨勢。

隱喻評價方式	網絡暴力語料
挖掘腳本	1.乖乖，滿大街都是奧斯卡影後影帝。 2.這個城市爛透了！ 3.生活靠演技，神一般的臺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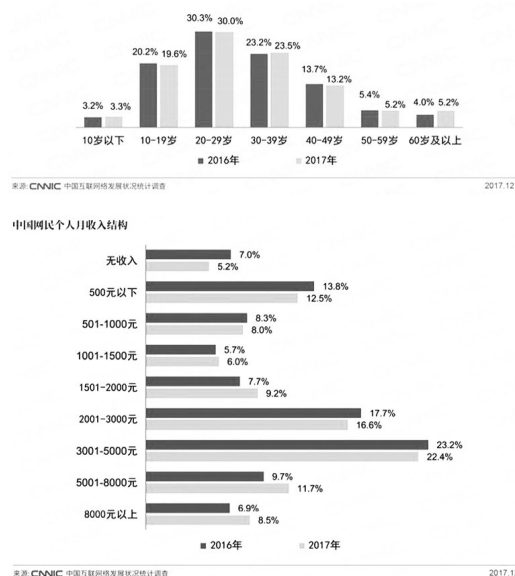
而映射內涵的隱喻實現暴力效果的方式則較為委婉和隱晦，字面意義和深層內涵之間的映射關係聯系通常要根據社會背景來識別。典型的例子是一些色彩如“黑”“白”，在網絡暴力語言的使用中常常隱身出本來並不具有的意義。除此之外，一些詞語在社會發展中會被賦予新的內涵意義，這些新的內涵意義甚至可能和字面意義完全相反。讀者在解讀這些隱喻的時候，要注意聯系社會背景，找出真正的內涵意義。

隱喻評價方式	網絡暴力語料
映射內涵	1.層主挺住，聖母要來了。 2.惡心！能不能別再洗白營銷了！ 3.熱評水軍職業黑真是嚇死人了。

Charteris-Black 提出的批評隱喻分析方法，將認知語言學中有關隱喻的研究運用於對有權勢人物語言運用的批評性分析，來解釋影響他們選用表達感情詞語的因素。同樣，批評隱喻分析方法也適用於對網絡暴力語言的分析，有助於呈現語言、權勢(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價值信念等的衝突)之間的關係。

網絡暴力語言的運用，顯示了說話人對攻擊對象的詆毀、侮辱，在負面、消極的情緒

背後，體現了權勢(話語權力)在網絡中的影響。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8年1月公布的《第41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10]，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7.72億，以10-39歲群體為主，整體占比為73.0%，其中20-29歲年齡段的網民占比最高，達30.0%。研究發現，當前我國網民主要由青少年構成。網絡的匿名性和自由性為網絡暴力的實施提供了條件，青少年處於仍未完全形成價值觀的混亂階段，容易以發表網絡暴力語言的方式宣泄情緒。其次，網民中學生群體規模最大，占比為25.4%，其次為個體戶/自由職業者，比例為21.3%，企業/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占比合計達到14.6%。上述群體由於自身社會地位的特殊性，其話語權力在現實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由社會所支配，難以充分實現。而網絡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評論平臺，當社會熱點事件發生時，他們通過對社會事件進行評價，實現自己的話語權力。為了表達負面、消極的情緒，他們利用隱喻委婉的特性和較強的勸誘效果實施網絡暴力。



此外，我國網民中具備中等教育水平的群體規模最大。截至2017年12月，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占比分別為37.9%、

25.4%。可以看到,網民的整體受教育水平并不是很高。在網絡發表評論的門檻相對較低,網民的文化素質不高使其容易情緒化,偏向于使用一些暴力的語言攻擊社會事件或社會事件的主人公而不是理性分析事件。在這個過程中,隱喻作為有力的話語表達手段被頻繁使用。



五、結語

隱喻因其較為委婉的特性和較強的勸誘效果而廣泛被網民所接受,網絡語言暴力中的使用頻率相當高。通過對收集到的網絡語言暴力語料的批評話語分析,研究發現,隱喻評價功能的實現方式有以下特點:

(1)在發表網絡語言暴力言論時,網民通常連續使用兩個或多個隱喻。隱喻的疊加使用,有助於網民表達自己的情緒,對攻擊對象產生更為強烈的侮辱效果。

(2)對隱喻的分析要結合社會背景。隨着社會的發展,隱喻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深層內涵。在分析網民使用隱喻的意圖時,應對照語境背景,挖掘真正的內涵意義而不是僅憑字面意義來判斷。

(3)與外國語言比如英語相比,中國網民使用了大量的諧音作為隱喻,如“狗帶”“TM”“麻痹”等,其原型為外語、漢語或是方言。要理解這些隱喻,需要對中國和外國的語音意義的對應方式有一定的了解。

(4)網絡暴力語言隱喻中源喻中社會刻板印象類,蘊含的“故事”,映射的內涵等類型涉及漢語中的一些歷史、政治、文化內容,對研究者文化素養有着一定的要求。

借助批評隱喻分析方法,研究對網絡暴力語言中的隱喻進行分析,呈現語言、權勢

(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價值信念等的衝突)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發生在我國的網絡暴力語言中的隱喻和權勢(話語權力)、意識形態(價值信念等的衝突)之間有以下關係:

(1)當前我國網民主要由青少年構成,由于處於仍未完全形成價值觀的混亂階段,他們容易以發表網絡暴力語言的方式宣泄情緒。

(2)網民中學生群體、個體戶/自由職業者、企業/公司的管理人員和一般職員占比較大,上述群體的話語權力在現實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受社會所支配,難以充分實現。因此,他們在網絡上對社會事件進行評價,實現自己的話語權力。

(3)此外,我國網民的整體素質水平并不是很高。在網絡發表評論的門檻相對較低,網民的文化素質不高使其容易情緒化,偏向于使用一些暴力的語言攻擊社會事件或社會事件的主人公,在這個過程中,隱喻作為有力的話語表達手段被頻繁使用。

References(參考文獻)

- [1]Charteris, B.J. 2004.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2]Christopher, H. 2008.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metaphor: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Hatfield, UK.
- [3]Deignan, A. 2010. The evaluative properties of metaphors. In Z. Todd, A. Deignan & L. Cameron (Eds.),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in u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4]Lakoff, G. and Mark, T.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T.A. van Dijk. 1993.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6]Ding, L. and Huang, Z.C. 2016. Analysis of Cyber Language Violence.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 No.12:65

(丁磊,黄哲程,2016.浅析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新闻研究导刊》,第12期,第65页)

[7]Lin,S.W. Studies on Metaphor: State of Arts, Focuses, and Trend.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1:38-45

(林書武,2002.隱喻研究的基本現狀、焦點及趨勢.《外國語》,第1期,第38-45頁)

[8]Ma, M.L. and Wu, J.W. Study on Metaphoric Meaning of Violent Network Buzwords. *Journal of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81-83

(馬夢琳,吳建偉,2017.網絡流行語中暴

力語言的隱喻研究,《中北大學學報》,第1期,第81-83頁)

[9]Xin, B. 2012. The 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4:1-2

(辛斌,2012.批評話語分析中的認知話語分析,《外語與外語教學》第4期,第1-2頁)

[10]The 41st China Statistical Report on Internet Development.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2018

(《第41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8)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Metaphor in Cyber Language Violence

ZHU Chunxi LIU Wen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Abstract] *The paper adopt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o study microblog review of specific events, discussing how evaluative function of metaphor realiz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mpolite Weibo comm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power (discourse power) and ideology in cyber language violen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Weibo netizens prefer to superimpose metaphors to express strongly negative emotions; (2) When analyzing, connotative meanings of metaphors should be mined with the background; (3) Som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is involved in metaphors, which has certain requirements for researchers' cultural literacy. Using the method of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Currently, Chinese netizens are mainly composed by young people with incomplete values who tend to resort to violent language to vent their emotions; (2) The discourse power of grassroots groups is dominated by society in ordinary life, so they choose to realize it on the Internet; (3) Having inferior overall quality level, Chinese netizens prefer to use violent language, often metaphors, to publish their opinions.*

[Keywords] *cyber language violenc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valuative function of metaphor; discourse power; Weibo*

二語聽力附帶詞匯習得中詞匯頻率研究回顧

常樂^① 馬軍財^②

沈陽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遼寧沈陽 110159

渤海大學外國語學院 遼寧錦州 121013

摘要:本文在介紹附帶詞匯習得(IVA)的基礎上,首先介紹了Ellis提出的影響二語聽力中IVA的因素框架,並回顧了該框架中輸入因素裏的詞匯頻率對聽力IVA影響作用的有關實證研究,探索了詞匯頻率對聽力中詞匯形式和意義(尤其是詞形方面)習得的積極促進作用,最後為二語聽力教學提出了窄聽與泛聽相結合、針對目標詞設計聽力任務等啟示。

關鍵詞:附帶詞匯習得;二語聽力;詞匯頻率

一、二語附帶詞匯習得簡述

詞匯是語言學習和運用的基礎,二語學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詞匯習得。二語詞匯知識的獲得方式可分有意詞匯學習和附帶詞匯習得(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以下簡稱為IVA)。對於IVA的定義,二語研究者們眾說紛紜,如:Huckin和Coady(1999)認為IVA是一種在表達意識時的交際行為,而Hulstijn和Laufer(2001)則認為附帶習得是“在無意學習時習得某種知識”。雖然廣大二語研究者的說辭不同,但是一致認可的是:IVA是在學習者進行其他任務時,在無意識中習得新詞,即附帶習得詞匯知識。在英語作為二語或外語(即ESL或EFL)的學習中,最常見的輸入形式是閱讀和聽力。迄今國內外對於ESL/ESL中的IVA研究絕大部分都是基於閱讀條件下(如:Paribakht和Wesche,1999;Pulido,2003等),且已廣泛證實閱讀是IVA的重要來源;相對而言,關於聽力過程中的IVA研究卻為數不多(如:Vidal,2003,2011;Ellis和Chang,2016等),其原因可能在於聽力中的IVA所涉及的影响因素更多、更複雜,且至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框架系統可供研究參考。

二、Ellis的二語聽力詞匯附帶習得影響因素框架

Ellis在1994年首次提出了影響二語聽力中IVA的因素框架,並指出由於聽力輸入下的IVA研究太少,祇能不可避免的參考閱讀下的IVA研究(1994,p.7)。他將影響二語聽力詞匯附帶習得的因素劃分為:詞匯內在屬性、輸入、交際以及學習者等四類因素,其中關於輸入因素的具體描述如表1。

從表1中不難看出,影響聽力中IVA的輸入因素涉及了很多變量,且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這些變量比影響閱讀中IVA的變量更為複雜,幾乎每一個變量都可以作為一個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將重點回顧輸入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詞匯出現頻率對二語聽力中IVA影響的國內有關研究。

三、詞匯頻率對二語聽力中詞匯附帶習得的影響研究回顧

頻率,即語言項目在聽、說、讀、寫中的出現次數,是二語詞匯習得的一個重要因素。文本中出現的單詞越頻繁,它就越有可能被學會。Schmitt(2008)認為在聽力IVA過程中,首先是對形式的習得,目標詞復現多次後,學習者在習得形式的基礎上會開始逐

①常樂,男,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二語詞匯習得、二語聽力教學和專門用途英語語料庫

②馬軍財,男,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二語詞匯附帶習得

基金項目:遼寧省高等教育學會“十二五”高校外語教學改革專項2015年度重點課題(WYZD150040)

表 1. Ellis 的影響二語聽力中附帶詞匯習得的因素框架(節選)

輸入因素	描述
1. 出現頻率/次數 2. 突顯度 3. 語境因素(可用的上下文線索) 4. 輸入複雜度	1. 常見詞比不常見詞更容易被學會;頻繁的接觸會促進“深度”學習。然而,出現頻率和詞匯學習之間的關係並沒得到一致認可。 2. 通過某種焦點(例如,指令)來突出的單詞更容易被記住。 3. 同沒有上下文線索或祇是較遠線索的單詞相比,在當前語境中有線索的單詞更容易被學會。 4. 在簡化輸入中出現的單詞(例如:低詞匯密度和低生詞密度的輸入)可能比在複雜輸入中出現的單詞更容易被學會。

選自:Ellis(1994,p.22)

步建立形式-意義鏈接(form-meaning link)。

實證研究已逐步證實頻率在二語聽力 IVA 中的作用。Vidal(2003)開辟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先河,她探討了 36 個目標詞(被歸類為專業詞匯,學術詞匯和低頻詞匯,出現頻率分別為 1,2,3,4,5 和 6 次)在 EFL 學術講座中的 IVA 情況,發現頻率對聽力中的 IVA 有一定的積極影響,IVA 的效果隨著詞語重複次數的增加而增加。Brown 等(2008)將 28 個目標詞分為四個頻率組(2-3,7-9,10-13,15-20 次),運用兩個意義識別測試(多項選擇識別測試和逐個翻譯測試)對閱讀和聽力中 IVA 的效果進行了比較,其研究結果顯示,兩種輸入模式中都發現頻率對 IVA 的影響;相比于閱讀,為了達到聽力中更好的 IVA 效果,需要更多的詞匯重複次數。Van Zeeland 和 Schmitt(2013)研究了聽力中不同頻率(3, 7, 11 和 15 次)對形式、語法和意義三個維度詞匯知識的影響,通過即測和後測(兩周後)檢驗習得效果;雖然該研究結果並未顯示出頻率對詞匯意義的顯著作用,但還是發現了頻率在聽力過程中對詞匯形式和語法兩個知識方面習得的顯著影響。

在國內,常樂等(2013)選擇了 30 名大

學英語專業新生,對聽力和閱讀兩種輸入模式下的 IVA 進行了對比研究;研究將 20 個目標詞分別編入四篇聽力材料,每個目標詞復現兩次,每篇材料放音三遍;在對目標詞的詞形、詞義、應用等三方面知識進行了前後測試後,研究結果表明:閱讀比聽力更有益于 IVA,同時也證明了重複次數對聽力過程中 IVA 在詞形和詞義方面習得的積極影響。Ellis 和 Chang(2016)研究了文本重複對中國大學新生聽力任務中 IVA 的作用,研究中的 10 個目標生詞被嵌入兩篇聽力文本中(每個詞復現兩次);受試中第一組祇聽一遍文本,第二組聽三遍;在比較了詞形、詞義和應用三個維度的 IVA 效果後,研究發現,收聽三遍的學生在詞形和詞義方面所獲得的詞匯知識明顯優于祇聽一遍的學生。Chen 和 Teng(2017)研究了詞匯出現頻率對 60 名不同專業的大學生在閱讀與聽力過程中 IVA 的影響;研究將 15 個目標詞分為三個頻率組(1, 5 和 10 次);測試材料選擇了 160 個單獨的句子(目標句與幹擾句各 80 個),對受試在閱讀和聽力過程中對目標詞形式回憶,形式識別,意義回憶和意義識別四個知識維度進行了測試;結果表明兩種模式下都存在

IVA,而且詞匯復現頻率對IVA的效果顯著;需要聽到10次以上才能習得新詞,如能增加頻率,則習得效果會更好。

不難看出,此領域的研究方法正日趨成熟。如:最初在Vidal(2003)的研究中,由于目標詞重複頻率過於密集,學生在一定時間內習得詞匯的聲音形式,而其研究數據還不足以證實學習者爲了建立形式-意義鏈接而需要重複遇到一個詞的確切次數。此後,隨着研究方法的日漸完善,一些關於頻率在閱讀和聽力IVA中的對比研究(如:Brown等,2008;常樂等,2013)表明,頻率因素在閱讀中更能促進IVA,但是在聽力中則需要更多次數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其原因可能在于,聽力比閱讀過程更複雜,且影響聽力中IVA的因素之間還存在相互聯系。繼Nation(2001)提出了建立詞匯形式-意義鏈接的複雜性之後,二語研究者(如:van Zeeland和Schmitt,2013;Ellis和Chang,2016;Chen和Teng,2017等)開始逐漸嘗試維度法,從不同詞匯知識維度(如:形式識別,形式回憶,意義識別和意義回憶等)更全面地檢測頻率因素對學習者聽力中IVA的影響。

綜上所述,國內外已有的研究表明,頻率是聽力IVA中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它對詞匯形式和意義(尤其是詞形方面)習得的促進作用。然而,爲了達到最優化的IVA效果所需要一個詞在文本中的重複次數迄今尚未取得研究一致。其原因在于,影響聽力過程中IVA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而有可能是多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例如,在一篇有豐富語境提示的聽力材料中,盡管目標詞復現頻率不高,但學習者仍舊可能較好地習得目標詞;在主題相同或相近的聽力任務中,由于學習者在不同語境聽到同一個詞,也能發生更深層次的IVA。

四、結論及啓示

在Ellis提出了影響二語聽力中IVA的因素框架二十餘年之後,其中的詞匯復現頻

率因素的促進作用已基本得到證實,其在教學方面帶來的啓示可歸納爲:

1. 窄聽與泛聽相結合。當學生掌握了基本聽力詞匯量時,即6000-7000基礎詞匯或者98%的已知詞匯覆蓋率(Nation,2006),教師應鼓勵學生窄聽(narrow listening)與泛聽(extensive listening)相結合。Krashen(1981)早就指出:如果學生從範圍比較集中(窄)的主題材料中獲得大量的語言輸入并逐步擴大主題範圍,語言習得會進展得更快。窄式聽力給學生在理解所輸入的材料時提供了便利,其優勢在于:在主題相對固定的聽力學習中,一個詞的多次復現會刺激大腦對該詞發音和意義的習得。Dupuy(1999)證實了窄式聽力對提高學生的聽力理解、聽力流暢性以及聽力詞匯習得都大有裨益。因此,教師在選取聽力材料時應首先考慮選取背景知識相似度高、主題近似的文本,其中頻繁出現的與主題相關的詞匯能增加可理解性語言的輸入,有利于學生習得相關主題詞匯。然後,再讓學生從窄聽慢慢過渡到泛聽,使他們通過聽力訓練學到更多的詞匯。

2. 針對目標詞設計聽力任務,將附帶詞匯習得與刻意詞匯練習相結合。考慮到聽力中的IVA祇意味着學生在詞匯形式和意義維度上習得了片面的、淺層的知識,連形式-意義鏈接都尚未達到,就更不必說應用這一詞匯習得的最終目標,在學生完成聽力學習後,爲了鞏固附帶習得到的詞匯知識,教師應“趁熱打鐵”,通過設計不同題型的練習任務,有針對性地對目標詞進行反復練習,繼續發揮詞匯復現頻率對詞匯知識習得的促進作用,以此來強化學生在聽後的詞匯習得。

References

- [1]Brown, R., Waring, R. & Donkaewbua, S. 2008.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reading, reading-while-listening and listening to stories.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20(2): 136-163.

- [2]Chang, L., Wang W. & Liu, J. 20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listening and read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6(2): 11–22.
- [3]Chen, X. & Teng, F. 2017.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Word Exposure Frequency 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Reading and Listening.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0(1): 56–73.
- [4]Dupuy, B. C. 1999. Narrow listening: an alternative way to develop and enhanc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students of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ystem*, 27(3): 351–361.
- [5]Ellis, R. 1994. Factors in the incidental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from oral input: A review essay.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5 (1): 1–32.
- [6]Ellis, R. & Chang, L. 2016. The Effects of Inference–Training and Text Repetition on Chinese Learners’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While Listening.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9 (2): 137–152.
- [7]Huckin, T. & Coady, J. 1999.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A review.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181–193.
- [8]Hulstijn, J. H. & Laufer, B. 2001.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Construct of Task–induced Involvement. *Applied Linguistics*, 22(1): 1–26.
- [9]Krashen, S.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10]Nation, I. S. P. 2001. *Learning vocabulary in another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Nation, I. S. P. 2006. How large a vocabulary is needed for reading and listening?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3(1): 59–82.
- [12]Paribakht, T. & M, Wesche. 1999. Reading and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f lexical inferenc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195–224.
- [13]Pulido, D. 2003. Modelling the role of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opic familiarity in second language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rough reading. *Language Learning*, 53: 33–284.
- [14]Schmitt, N. 2008. Review article: instructed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2: 329–363.
- [15]van Zeeland, H. & Schmitt, N. 2013.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through L2 listening: A dimensions approach. *System*, 41: 609–624.
- [16]Vidal, K. 2003. Academic listening: A source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24: 56–86.
- [17]Vidal, K. 2011. 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Reading and Listening o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61(1): 219–258.

Word Frequency in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A Review Article

CHANG Le MA Junc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59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

[Abstract]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VA), this article first presents Ellis’ framework of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L2) IVA from listening, then reviews empirical studies concerning word frequency in IVA from listening to explore its facilitating effects on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word form and word meaning, and finally draws on such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n L2 listening teaching as narrow listening plus extensive listening and word-based listening task design.

[Keywords]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word frequency

西部地方本科院校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 反思性研究

張富民^①

河西學院外國語學院 甘肅張掖 734000

摘要:信息、網絡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既凸顯了大學英語教學生態失衡問題,也為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的實踐轉化提供了基礎。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視學生為教學生態主體,倡導依托多種形式的教學資源,構建“1+1+X”的教學模式,即“教師課堂面授+自主中心自主學習+社會實踐環境”模式。本文按照生態化教學相關原理,以西部地區某地方本科院校為樣本,反思該院校近年來的大學英語教學實踐,探索和印證了地方本科院校施行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的現實性、可行性和實踐操作模式。

關鍵詞: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學生主體;能力培養

一、背景與起因

(一)大學英語教學目標與要求

大學英語教學是大學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大學英語課程是一門大學生必修的公共基礎課程。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特別是聽說能力,同時增強其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2007年7月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對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有明確要求:

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以及各高校情況差異較大,大學英語教學應貫徹分類指導、因材施教的原則,以適應個性化教學的實際需要。(教育部高教司,2007:1)

(二)大學英語教學困境

我國西部地區地方本科院校較多,在高等教育中競爭力相對薄弱。而西部地方本科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水平和現狀往往不能與東中部院校同日而語。而樣本院校是較為典型的西部地方本科院校。自2007年8月以來,樣本院校開始實行大學英語分級教學模式,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局面大為改觀,教學質量不斷攀升。然而,分級教學實施過程中,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也出現了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問題。譬如,不同級別的學生“能上不能下”的問題;又如,A級、B級教學對象使用不同教材和教學大綱開展教學但使用

同一試卷進行考核的問題;再如,B級班學生掛課率明顯居高的問題;還有,A級、B級、C級教學班教學績效考核辦法不盡合理問題。總之,不同教學對象和群體的大學英語教學發展呈現明顯不平衡狀態。

(三)大學英語教學新形勢

隨着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大學英語教學面臨着新形勢和更高的要求。首先,大學英語教育教學要面向全體學生並促進其個性化整體發展,全面提高教學質量。其次,大學英語教學要積極適應網絡環境下的教育變革,合理利用教學資源,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進一步提高語言應用能力。第三,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不斷與教學融合,催生了新的教育變革,多樣化、數字化、網絡化教學資源迅速發展,為基於資源的學習和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張富民指出:

基於資源的學習,是一種學習者通過對各種各樣的不同的學習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來完成課程目標和信息文化目標的學習,也就是一種自我更新知識和拓展知識的學習。(張富民,2009:173)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教學資源,教學生態主體就會失去賴以生存與發展的教學生態基礎,就不能有效自主建構其教學生態環境和良性發展;教學生態系統就

①張富民,男,副教授,翻譯碩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英美文學和英漢對比與翻譯

會失衡。而大學英語學習是一種典型的基于資源的學習。

基于此,西部地方本科院校需要立足現實基礎,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構建地方院校個性化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應運而生。

二、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綜述

(一) 主要内容

生態化教學模式即是在特定時間和空間內,師生、生生以及師生與教學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的特殊系統,一方的發展以另一方的發展為前提。在生態哲學的視角下,把課堂視為一個由多種因素、多種機制相互影響和制約而構成的複雜多維網絡。(孫志楠,2001:109-110)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是繼“基于計算機和網絡的大學英語教學”、“分級教學”之後,外語教師和研究人員倡導的一種新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既是一種教學模式,又是一種教學理念。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是運用教育生態學和生態語言學基本原理構建的一種穩定的教學活動結構和活動程序。該教學模式將大學英語作為教學生態系統,“視學生為生態主體,教師、(課程)教學目標、課程體系、教學設置、教學資源和監控體系等為環境因子。強調作為生態主體的學生與周邊環境因子之間的互動關係,突出學生語言能力、文化能力和專業能力的培養。聯系、動態、平衡是生態化教學模式的主要特點。”(徐銀坤,2014:109-111)關於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哈爾濱學院李厚業等人指出:

它是以教育生態學、人本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為理論依據,在多媒體教學環境下,依托多種形式的教學資源,遵循多元互動式教學原則、主導式自主學習原則、多元式教學評價原則,構建一個多元、動態、系統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全面整合、協調多媒體網絡與大學英語教學各個要素的生態平衡,全面推進大學英語教學,實現大學英語教學效能的最大化。(李厚業、李浩宇,2014:109-111)

實踐操作層面上,生態化教學模式是一

種“1+1+X”的教學模式,即採用一種“教師課堂面授+自主中心自主學習+社會實踐環境”模式;該模式主張教師實時關注學生的互動,課堂面授要注意保持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和教材之間的平衡,組織和指導學生依托網絡和互聯網開展學習,及時為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個性化自主學習方案,並且為學生創造各種延伸性場景促成課堂所學知識的實踐轉化與靈活運用。(王妍,2015:20-23)

(二) 意義與價值

顯而易見,生態化教學模式的理念與人本主義教學觀、教學設計系統觀和社會建構主義有共通之處。人本主義教學觀倡導以人為本,從學生實際出發設計和開展教學。教學設計系統觀認為,“教學過程本身是一個系統,其各個環節、要素彼此緊密聯系,針對一個特定的共同目標發揮各自的作用,組成了一個有機的統一體;而教學過程的設計既要服從自身的需要,又要符合自己所隸屬的那個更大系統的要求”。(伍新春,2002:370)建構主義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認為學生是認知的主體,是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而教學和教師應當為學習者構建有利認知環境。社會建構主義是建構主義的延續和發展。馮忠良等人指出:

社會建構主義認為,雖然知識是個體主動建構的,而且祇是個人經驗的合理化,但這種建構也不是隨意的任意建構,而是需要與他人磋商並達成一致來不斷地加以調整和修正,並且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當時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馮忠良、伍新春、姚新梅、王健敏,2010:208-209)

生態化教學模式對於大學英語教學有較強的實踐參考意義。首先,大學英語教學本身是一種集多種要素、多種教學模式和教學手段為一體的教學體系。其次,現實當中大學英語教學存在教學目標、教學方式、手段、內容、場合、教學評價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問題。而從生態哲學的視角考察,良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教學模式應當統籌、協調教學生態系統中師生、生生、生態主體與生態載體(教學資源)之間的關係。而就大學英語教學

實踐而言,生態化教學的顯著特點就是學校按照社會需求及學校辦學定位為學習者提供資源、建構教學環境,教師指導學生個體學會并能自覺學習,構建和諧教學關係,促進學生個性化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出發點

本研究立足樣本院校實際,旨在科學、合理統籌安排樣本院校大學英語教學,面向全體學生的協同成長與發展,進一步提高樣本院校大學英語教學質量。

本研究主要解決大學英語教學生態失衡問題,具體包括這樣幾個問題:(1)如何貫徹“因材施教,分類指導”原則;(2)如何認知和利用教學資源;(3)如何組織和開展大學英語教學;(4)如何衡量與評價大學英語教學績效;(5)如何構建和諧大學英語教學課堂。

(二)技術路綫

本研究採用的技術路綫是:①認知生態化教學理論,②回顧、反思樣本院校大學英語教學,③發現并提出問題,④探究解決問題的方法,⑤實施新的教學方案,⑥總結、凝煉教學實踐成果。

(三)研究思路

本研究解決問題的措施是:(1)遵循教育部《教學要求》等文件,從院校和學生實際,“以人為本”制定和執行個性化教學大綱;(2)開展基於學生主體的差異性教學,促進全體學生的個性化發展;(3)動態、開放、平衡而全面的建設與利用教學資源;(4)促成學生英語語言能力的自主生成與轉化,促使大學英語教學的可持續良性發展;(5)將大學英語教學作為教學生態系統,按照國家和學校要求,結合社會需求,為學生提供教學資源和指導,引導學生認知和利用教學資源,自主建構有利教學環境,實現自我個性化發展目標。

四、教學實踐個案

(一)校情分析

樣本院校地處我國西部地區,是地方本科院校之一。多年來,樣本院校多種大學英語學習群體并存,譬如藝體三校生、民族預科生、高考英語高分學生、高考英語低分學生,

這四個群體的大學英語教學並不是整齊劃一的。近年來,樣本院校的辦學定位日益明晰,即“地方性、教學型、應用性”高校。2012年以來,樣本院校在實施“轉型、提升、發展”戰略;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也面臨着進一步發展的挑戰和新形勢。因而,樣本院校需要立足現實、適應時代和社會的發展,構建大學英語教學新模式。

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是先進、科學的教育理念,也是切實有效的大學英語教學組織與管理形式。2012年9月以來,樣本院校將該教學模式應用於大學英語教學實踐當中,並不斷探索、完善。樣本院校為學生提供了比較豐富的大學英語教學資源,包括語言實驗室、網絡自主學習中心、多媒體教室、校園調頻臺、網絡教學系統等。此外,2014年9月,引進使用了互聯網教學平臺——批改網。引進批改網不但減輕了教師批閱作文的負擔,而且拓寬了學生自主學習和寫作能力培養途徑,也為學生提供了豐富多樣的互聯網教學資源。

下面以樣本院校2014-2015學年第二學期2013級B4班大學英語教學為例,具體闡釋該教學模式的實踐操控及效果。

(二)學情分析

2013級B4班共計69名學生,男生39人,女生30人;該班級是樣本院校2013級22個大學英語分級教學B級班之一,由教師教育學院、經管學院、信息與技術學院和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的8個教學班組成,其中經管學院2個專業的4個班級共63名學生,其他學院6名學生。

本學期2013級B級班的教學任務是學習《大學英語IV》並通過課程考核,同時參加CET-4考試,以便檢驗教學效果和進一步提高英語綜合應用能力。

(三)教學方案

《大學英語IV》共計教學16周,每周4學時,包括讀寫、聽說和自主學習三種課型。其中,讀寫課每周1次,每次2學時,安排在普通教室九教111;聽說課逢雙周1次,每次2學時,安排在語言實驗室;自主學習課逢單周1

次,每次2學時,安排在圖書館自主學習中心,由教師指導和監控學生開展基于網絡教學平臺的大學英語自主學習。

《大學英語 IV》主要使用外教社《第三版大學英語精讀 第四冊》和《第三版 大學英語聽說 第四冊》兩本教材,同時利用該教材網絡教學系統中的資源;此外,教師視教學情況需要,隨機補充其他材料。除此之外,學校繼續引進批改網供大學英語教學使用。

能力培養是本學期大學英語課程教學的重點。能力培養包括英語語言運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合作學習能力三個方面。能力培養的主要範式是基于教學資源的任務驅動模式。即,教師根據教學目標和教學資源實際情況設置任務,要求學生自覺主動完成,教師跟進并反饋學生完成任務情況。任務的設置與完成主要依賴三類教學資源——教學大綱和教材、自主中心局域網網絡教學系統、互聯網批改網教學平臺。

依據本學期教學目標、教學重點、教學任務、考核重點和CET-4考試情況,翻譯、寫作、閱讀和聽力技能培養是重點。為此,讀寫課教學注重學生主體型教學和運用語篇分析教學法,目的是為了以讀促寫、以寫促學;聽說課教學則以精聽為主,同時貫穿聽力基本功和聽力技巧訓練;網絡自主中心主要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學習內容包括四級模擬測試題、

課程階段性測試題、音視頻資料、教材課後練習電子文本等,但教師始終不離不棄、宏觀掌控、及時指導并反饋。從平時的觀察來看,絕大部分學生均能自覺、主動學習,視自身情況及需要并結合教師的指導與要求認真開展并完成學習任務。本學期,教師在自主中心網絡教學系統中共計設置教學任務8次,并補充、下發教學材料5份。批改網主要以學生自主使用為主,主要是培養寫作能力和語言基本功。

本學期課程考核采用綜合評價辦法。其中,平時成績20%,考核要素包括考勤、課堂表現、平時作業、網絡自測和批改網寫作成績。期中成績20%,期中考核采用隨堂考查的方式,利用網絡教學平臺安排在圖書館自主學習中心進行;考試題型包括詞匯與結構選擇題、完形填空題、段落翻譯、寫作,共五道大題;除第一大題的20分以精讀教材課後練習為主外,其他四道大題均來自課本之外。期末考試為全校統一考試,使用B級班考試試卷;試卷題型包括聽力(短、長對話和聽寫)10分、詞匯與結構選擇題20分、完型填空題10分、閱讀理解20分、段落翻譯20分、寫作20分,其中教材之外的內容占60分。

(四)總結與反思

2014年12月,2013級B4班57名學生參加了CET-4考試。考試主要統計數據如下:

表1 2014年下半年2013及B4班CET-4成績統計

	總分	聽力	閱讀	寫作
平均分	346	111	122	144
最高分	444	159	170	149
最低分	282	87	83	73
注:參加考試57人,有效成績53人				

本學期教師在批改網上布置了7篇作文,大部分學習都能按時完成。完成情況如下:

表2 2014-2015學年第二學期2013級B4班批改網寫作統計

作文號	433341	433326	433318	419358	419354	419346	419336
未交作文數	35	19	22	4	17	14	1
提交作文最高分	92	91	89	84	86	87.5	84.5

作文號	433341	433326	433318	419358	419354	419346	419336
提交作文最低分	51	5	68.5	54.5	58.5	58.5	45
提交作文平均分	80.34	80.15	78.97	74.76	76.6	79.78	70.39
<p>參與學生 57 人,總計應交 399 篇,未交 117 篇,未交率 29.32%;7 篇全交者 19 人。 注:提交作文平均分計算以 7 篇全交者 19 名同學的分數為參照數據。</p>							

批改網 7 篇作文中 419358 號作文是“百萬同題”Shopping on the Net,批改網反饋信息如下:

尊敬的 老师,您好:

您的账户(2409@163.com)于 2015-03-29 发布的 419358 号作文任务已于 2015-04-28 23:59 结束。本次作文答题情况如下所示,更多详情请您登录 www.pigai.org 查看。

作文号	提交作文次数	修改作文总次数	平均修改次数	最高修改次数
419358	33	129	3.91	22

本學期 69 名學生均參加課程考核,但期末考試有效成績 67 人。考核主要統計數據如下:

1. 平時成績共 3 次,其中一次為 7 篇批改網作文成績中的最高成績;全班平時成績平均分 85.65 分,最低分 55 分,最高分 93 分。

2. 期中考試五大題平均成績依次是:詞匯與結構選擇題 16.9 分、完形填空題 13.753 分、段落翻譯(英譯漢) 13.1096 分、段落翻譯(漢譯英) 12.7945 分、寫作 21.52 分。

3. 期末考試平均成績 65.20 分,寫作平均成績 16.35 分,翻譯平均成績 13.1446 分,閱讀、聽力級其他題平均成績 38.2 分。

綜合分析上述數據,不難看出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有如下特點:

1. 無論是從平時,還是從期中和期末成績來看,寫作和閱讀成績均較高,聽力和翻譯成績比以往考試有所提高。

2. 樣本院校非常注重教學資源建設,為大學英語教學建構了優質教學生態環境,使得英語教學和學習朝個性化方向和主動式學習方向發展,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而批改網和自主學習中心等網絡教學資源將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的理念落到了實處,使得教師和學生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共享資源,節約各種能源。

3. 樣本院校教學績效評價較為客觀、科學,並不圍繞四級考試,而是看學子是否開卷有益、學有所獲,看學生能否積極參與課內外大學英語教學活動。全面、客觀、科學、準確的評估體系對於實現課程目標至關重要。它既是教師獲取教學反饋信息、改進教學管理、保證教學質量的重要依據,又是學生調整學習策略、改進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的重要手段。

4. 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以學生為中心,基於網絡資源和信息技術,並整合和混合了各種教學要素,具備生態化教學模式的主要特徵,是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

五、結語

本研究立足一線教學實踐,着眼于解決教學當中的實際問題。通過教學實踐實現了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從理論到實踐的轉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對生態化教學理論的新的認識。自該教學模式施行以來,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師與學生一同成長與發展,不但推進了樣本院校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而且進一步提升了教學質量。樣本院校大學英語教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教”與“學”相互協調的師生互動、生氣勃勃、教學相長的局面。此外,學生的語言應

用能力、自主學習能力和合作能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綜上所述,本研究給予大學英語教學以下幾點啓示: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換言之,大學英語教師要想圓滿完成教學任務,實現其教學目標,就必須提升其教學技能。教學技能不止是教師自身的語言運用能力,還包括教學設計能力和教學資源認知、調控和應用能力。

(2)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就大學英語而言,如果沒有教學資源,那麼水平再高的教師也祇能唱“獨角戲”。因而,教學資源建設不祇是學校和部門的事情,大學英語教師也要重視教學資源建設。

(3) 功到自然成。平時不努力,考試徒傷悲! 平時扎實學習,才能順利通過考試、考核;而教師在平時勤督促、多引導,潛心治學,才能圓滿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標。

(4) 從大處着眼但從小處着手,既高屋建瓴又腳踏實地,大學英語教學方能成就大的事業。

References(參考文獻)

[1]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2007.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eijing: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教育部高教司, 2007.《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Zhang, F.M. 2009. *Introduction to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Beijing: Atomic Energy Press.

(張富民, 2009.《大學英語學習入門》,北京:原子能出版社.)

[3]Sun, Z.N. 2011. Research on the Opera-

tion Mechanism of the English Classroom Ecosystem of Postgraduates. *Continuing Education Research*07:109-110.

(孫志楠,2011. 研究生英語課堂生態系統運行機制研究,《繼續教育研究》,第7期,第109-110頁.)

[4]Xu, Y.K. 2014.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English. *Exam-weekly*82: 95-96.

(徐銀坤,2014. 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探討,《考試周刊》,第82期,第95-96頁.)

[5]Li, H.Y. and Li, H.Y. 2014. Principles of Eco-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 in Multimedia Network Environment.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05:109-111.

(李厚業、李浩宇, 2014. 多媒體網絡環境下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原則探究,《哈爾濱學院學報》,第5期,第109-111頁.)

[6]Wang, Y. 2015. A Review on the “Ecological” Teaching Model of College English in Innovation Class. *Reading and Writing Periodical*07:20-23.

(王妍,2015. 創新班大學英語“生態化”教學模式研究述評,《讀與寫雜誌》,第7期,第20-23頁.)

[7]Wu, X.C. 2002. *Higher Educational Psychology*.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ress.

(伍新春,2002.《高等教育心理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8]Feng, Z.L., Wu, X.C., Yao, X.C. and Wang, J.M. 2010. *Educational Psychology(2nd Edition)*. Beijing: Th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馮忠良、伍新春、姚新梅、王健敏, 2010.《教育心理學(第2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To be continued on Page 017, 轉017頁)

混合式教學模式下 Jigsaw 在大學英語閱讀中的教學設計

班煒^①

四川工商學院外國語學院 四川成都 611745

摘要:傳統講授型教學模式已經不適應新時代的需求,學生的學習效果也不盡理想。通過 Jigsaw 教學模式在大學英語閱讀教學中的運用實踐,發現該模式能促進學生的英語學習態度、方式及結果的良性轉變,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教學模式。

關鍵詞: Jigsaw 教學模式;大學英語;閱讀

一、大學英語教學的目標、教學方法及現狀

大學外語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促進大學生知識、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大學英語作為大學外語教育的最主要內容,是大多數非英語專業學生在本科教育階段必修的公共基礎課程,在人才培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學英語教學指南》(2017)中明確指出,大學英語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增強跨文化交際意識和交際能力,同時發展自主學習能力,提高綜合文化素養,使他們在學習、生活、社會交往和未來工作中能夠有效地使用英語,滿足國家、社會、學校和個人發展的需要。(2017)

大學英語課堂教學可以採用任務式、合作式、項目式、探究式等教學方法,體現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使教學活動實現由“教”向“學”的轉變。同時,教學方法的運用應關注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引導和幫助他們掌握學習策略,學會學習。教師要充分利用網絡教學平臺,為學生提供課堂教學與現代信息技術結合的自主學習路徑和豐富的自主學習資源,促使學生從“被動學習”向“主動學習”轉變。

雖然大學英語教學的目標得以明確,但在大學英語課堂上,老師滿堂講、學生被動聽的現象仍然很普遍。這種教學模式下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很難實現。學生連最基本的日常會話都不能進行,更談不上用英語撰寫常見的應用文和閱讀自己所學專業相關資料。(彭珊珊,2008:145-146)外語教學的重要任務是學生外語語言能力的訓練與培養,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是否得當,直接影響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

二、Jigsaw 教學模式的理念

Jigsaw 教學模式,又稱拼圖式教學法(Jigsaw approach),是由阿倫遜(Elliot Aronson)及其同事在1978年設計的一種合作學習模式。具體的做法是將一項學習任務分割成幾個部分或片段。“基本組”(home group)的每個成員閱讀各自所分到的材料。接下來各基本組負責同一部分材料的成員組成“專家組”(experts group),共同研究該學習材料直至掌握。然後各專家返回到其所在的基本組,輪流將自己所負責的那部分內容教給他們的組員。

Slavin 教授于1986年將拼圖法改進並加以完善形成 jigsaw II,即拼圖法第二代。與第一代的不同之處在於,全體組員首先了解

^①班煒,女,講師,教育學碩士,研究方向:外語教學和跨文化研究

總任務,這樣有利于 Jigsaw I 中的成員對總任務的理解,既觀整體,又精局部,其後形成的專家組分別對學習材料中的各個話題進行深入地探討研究,各專家在回到基本組進行知識的輪流傳授後,教師對全班進行測驗,考查每位同學對全部學習材料的掌握程度,并用小組成績分工法的記分方法來計算小組得分。(尹剛、陳靜波, 2013)

三、教學案例設計

本文以《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第三版)第四冊 Units 3 Section A Fred Smith and FedEx: The vis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為例,將線上課程和面授課程兩者相結合,進一步說明 Jigsaw 的教學方法。

使用 Jigsaw 理念,對課文內容設計了以下任務和練習開展教學。

1. 課前預習(Pre-class Activities):教師將生詞(New words)和語言要點(Language Focus)的講解錄制成音頻和視頻,上傳至藍墨雲班課,要求學生預習並做好筆記,並根據線上學習內容在課前進行測試。

2. 課堂活動(In-class Activities):

Text

Task A: 老師先把課文剪成四個部分,要求學生根據各自的閱讀內容將四部分文章按正確的順序排序。

Task B: 要求學生根據文章內容確定段落主題。

Part 1(C) A. Smith's friendly and agreeable personality and his P-S-P philosophy.

Part 2 (D) B. Smith's business experience.

Part 3 (B) C. Basic introduction to Smith and his FedEx company.

Part 4 (A) D. Smith's early life Experiences.

Task C: 選擇文章標題並給出簡要理由。

A. Fred Smith and FedEx: The successful flying club

B. Fred Smith and FedEx: Affluent second generation

C. Fred Smith and FedEx: The vis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

Task D: 各小組所有閱讀任務完成之後,在藍墨雲班課上獨立完成閱讀理解。

(1) What is NOT the typical scene at Memphis Airport every night? (C)

A. The packages and letters are quickly rearranged and sorted

B. Crews unload the plane's cargo

C. The packages are dispersed by hand

D. The parcels go to their destination address by air transport

(2) What did Smith do in his term paper for his economics class? (A)

A. He designed a plan for a transportation company that would guarantee express delivery service

B. He sent small and time-sensitive goods to major US regions overnight The packages are dispersed by hand

C. He drafted a prototype for a transportation company that would send small delivery service

D. None of the above

(3) How was the paper evaluated by his professor? (B)

A. It was feasible

B. It wasn't workable

C. It wasn't impressed

D. It was difficult

(4) What does Smith consider as the key elements for a successful business? (D)

- A. An appealing product or service
- B. An efficient management system
- C. Good leadership
- D. Above all

(5) What does Smith's great concern for his employees illustrate? (B)

- A. Employees' physical health
- B. People put at an equally important place as service and profit of the company
- C. Workers' psychological health
- D. The benefits of the company

Vocabulary Work

Task A: Find words or phrases in the passage which mean 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1)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do, invent or use sth. (para.10) pioneer

(2) improve a business by making it more simple (para.8) streamline

(3) become or make sth. successful or popular again (para.4) revive

(4) join together or make things join together to become a single thing (para.7) fuse

(5) admire or respect sb. / sth. very much (para.2) hold sb. in high regard

(6) move parts of a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etc. from a central place to several different smaller ones (para.8) decentralize

(7) try to do sth. that you have never done before (para.8) take a stab at sth.

(8) manage an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unning of a business, organization, etc. (para.4) administrate

(9) have discovered or produced sth. new (para.6) be onto sth.

Task B: Fill in the following blanks with the corresponding letters.

(1) The new cancer treatment was _____ in the early eighties by Dr. Sylvia Bannerjee. (F)

(2) The economy is beginning to _____. (A)

(3) It's no use to _____ the government workforce only by cutting its number of employees. (D)

(4) We intend to _____ the companies into a single organization. (C)

(5) The big company _____ their operations last year and opened several regional offices in the countr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market. (B)

(6) He is suitable for the position as he is young enough to understand what the teenagers think but old enough to _____ their programs. (E)

- | | |
|-----------------|-----------------|
| A. revive | B. decentralize |
| C. fuse | D. streamline |
| E. administrate | F. pioneered |

3. 課後活動 (After-class Activities):

Task A: 根據本文內容, 結合所學詞匯、結構, 畫出文章的思維導圖, 并根據思維導圖, 復述課文。

Task B: 在批改網上寫一篇 120-150 字左右的短文。Write a biographical narrative on the following topic: One entrepreneur that you admire most

四、小結

Jigsaw 應用于閱讀教學, 雖然充滿挑戰性, 但其教學形式不拘一格, 引人入勝, 對於激發學生學習願望, 提高學習效果有着獨特的作用, 具有以下優點:

1. 培養合作意識, 優化教學時間, 提高教學效率。
2. 合作與競爭相結合, 激發學生的學習

欲望。

3. 在閱讀和講解中進一步訓練學生的理解能力和邏輯思維。

4. 活學活用,在交流中訓練培養學生的口語表達能力。

各高校應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積極創建多元的教學與學習環境。教師應積極建設和使用微課、慕課,利用網上優質教育資源改造和拓展教學內容,實施基于課堂和在綫網上課程的翻轉課堂等混合式教學模式,使學生朝着主動學習、自主學習和個性化學習方向發展。

References(參考文獻)

[1]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Steering Committee. 2017.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Guide*.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 2017.《大學英語教學指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 Peng, S.S. 2008.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Jigsaw Teaching Mode of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5: 145-146

(彭珊珊, 2008. Jigsaw 教學模式在高職公共英語教學中的創新運用,《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第五期,第 145-146 頁.)

[3] Yin, G. and Chen, J.B. 2013. *101 Tips for English Teachers*. (2nd ed.). Nanjing: Nan 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尹剛、陳靜波, 2013.《給英語教師的 101 條建議》(修訂版). 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Teaching Design of Jigsaw Model in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under Blended Teaching Pattern

BAN 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45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era;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study are not very well. Applying Jigsaw model in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aching, it is found that jigsaw model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a positive change in study attitudes, methods and results for language learners.*

[Keywords] *jigsaw teaching model;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comprehension;*

新媒體平臺下的大學英語教學

——以微信公眾號“擷英園地”為例

顏海峰^① 覃璐^②

山東政法學院外國語學院 山東濟南 250014

摘要: 隨着web3.0時代的到來,微信公眾號作為國內首創的新興新媒體平臺,被廣泛應用於市場甚至高校的英語教學過程中,因此,微信公眾號教學模式也成為學界的熱點議題之一。本文以山東政法學院外國語學院英語學習開源公眾號“擷英園地”為研究範本,從實際應用和價值前景兩個層面分析微信公眾號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獨特作用,並且結合筆者自身編輯經驗和英語學習體會,指出微信公眾號平臺在大學英語教學實際應用中面臨的挑戰及應對策略。

關鍵詞: 大學英語教學;新媒體;微信公眾號;“擷英園地”

一、引言

技術的發展往往伴隨着教學模式的興起和更迭。在國外,E-learning 教學模式隨Web1.0時代的落幕而無人問津,其後混合式學習、移動學習與近年大熱的“翻轉課堂”輪番登場,在此過程中可汗學院(Coursera),推特(tweet)等平臺陸續上場。與此同時,國內通過借鑒海外經驗,借力互聯網經濟發展東風,英語教學模式和平臺的更新也亦步亦趨。然而由於互聯網承載的信息量過於龐大,加之多數大學生缺少信息篩選的能力和相應訓練,導致其面對海量信息往往也祇是“望洋興嘆”。而在市場上涌現沉浮的各種英語學習線上課程或公眾號主要是針對考級考證的報班營銷,而非注重學生語言習得和運用能力的提高。“並且這些公眾號無法做到有效針對某一個地區、某一個學校、某一個班級的學生開展課內、課外教學活動,無法有效針對大學生的差異化學習訴求。”(Xu,2017)再者,大部分高校英語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方式——線上和面對面交談,呈碎片化,花費了教師大量的時間用於重複性問題的解答討論,不能幫助師生有效地分享和整合學習資源。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高校師生共建英語學習公眾號,便具有了一定革故鼎新的效用和意義。

作為一款時興社交軟件的附加功能,微信公眾號不僅繼承了新媒體原有的“數字化、互動性、超文本、網絡化”(Martin,2009)的特點,其簡單易學的界面操作和花樣百出的編輯效果更是深受教師和學生的喜愛,加上微信平臺自帶的編輯功能,以及秀米等眾多免費公眾號編輯軟件強大的技術支持,建立、運營和宣傳公眾號的成本都非常低廉。通過運營英語學習公眾號,師生得以在線上線下針對特定問題進行有效討論和互相糾錯監督,這樣的學習模式符合建構主義學派皮亞杰(J. Piaget)的理念:“學習是基於個人過去的學習經驗從而構建起自己對外部環境的理解,學習是學習者自己對知識的建構,而非通過教學活動得到的。”

高校師生共建英語學習類公眾號可行性不言自明,但如何做得更好、做出特色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接下來筆者將對我校外國語學院公眾號“擷英園地”獨特的運營模式和建號一年多以來的成效進行分析,以期對此問題做出有益解答。

二、微信公眾號的教學應用實例分析

公眾號“擷英園地”原名“譯術論壇”,是2015年4月26日由筆者創建的英語資源發布公眾號。該公眾號依托“譯術論壇”(國內第一

^①顏海峰,男,講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詩歌翻譯和典籍英譯

^②覃璐,女,2015級本科在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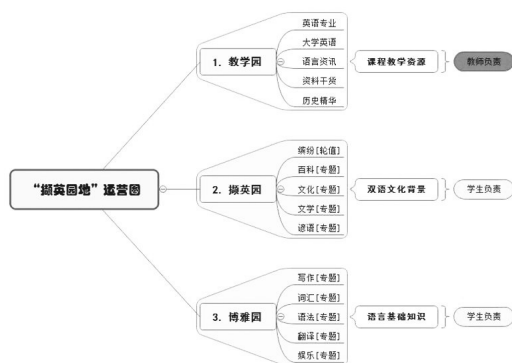
翻譯資源網站)的各類英語學術資料,經過運營者加工整合,按服務類公眾號推送官方設定,每天推送群發一條消息,內容涵蓋英語學習的方方面面。運營初期祇有筆者一人運營,時間有限,且資源發布有害版權,筆者轉變思路,於2017年2月18日更改公號名稱爲“擷英園地”,並添加了筆者執教的2015級英語本科班級的13名學生參運營,嘗試師生共建,并向全國開放運營資格,旨在建立一個“開源”公眾號。這裏的“開源”其實質是對任何想加入運營參與建設的英語學習者不設準入機制,隨進隨出,沒有責任義務,公號祇是作爲一個鍛煉其編輯能力的新媒體平臺。初期綁定運營的13位同學以宿舍爲單位,負責登陸,輻射2015級英語本科1、2班51位同學,以輪流值日的形式按改版後的二級菜單方向發布相關英語學習內容。因爲發帖規律且原創度高,公號在密集運營16天即2017年3月7日即接到公號平臺發送的開通原創保護功能邀請,3月24日收到贊賞功能邀請。這個速度使“擷英園地”成爲同時期公號運營制度下各類公號中實現全功能開通的最快公眾號。至成文日該公號已經運營正好一年,先後綁定了非本校的、來自其他5個高校的8位學生參與運營,並保有穩定訂閱戶3000人,吸引了國內更多高校師生諮詢學習並改良自己的公號團隊,比如河南城建學院李攀登老師負責的“攀登英語”、山東大學林殿芳博士的“小芳老師”等。在沒有任何商業化推廣運作(包括轉發微信群)的情況下,在絕大多數運營操作活躍時間掌握在一個高校的51位同學手中的情況下“擷英園地”總發文量625條,日均2條,這樣的飛躍式成長,是任何同類公眾號平臺都沒有實現過的先例。

(一)“擷英園地”教學互動模式及學科結構分析

通過閱讀文獻,筆者發現當下國內衆多高校師生共建的英語學習類公眾號大多遵循着“課本帶動平臺”的教學模式。比如鄭紅紅“淺談教師公眾微信號在大學英語教學中的應用”(Zheng, 2017)文章中提到的公眾號教

學模式是:根據課本內容——教師制作“微課”——上傳公眾號平臺——師生互動。筆者認爲這樣的模式其實祇是讓學生換了一個平臺上“微課”和進行“學習打卡”監督,並沒有發揮出公眾號平臺的特色。而“擷英園地”的模式是:學生自主選題——小組/個人編輯——老師校對——每節課留出10分鐘討論——期末評比獎勵。這樣的模式是現今國內外多種先進教學理念的“合成物”,讓學生成爲學習的主人,調動其積極性,老師成爲指導者,提升效率。

再者,通過筆者對微信平臺上英語類學習公眾號的長期關注,發現國內市場類英語學習公眾號在教學內容上有兩個極端:一是過於龐雜、沒有綱目,二是過於單一、廣度不足。這就迫使英語學習者同時關注多個公眾號,每天都在海量的碎片信息中疲于瀏覽和記憶,事倍而功半。而“擷英園地”不同,在運營初期我院師生便共同設計了以“教學園”、“擷英園”、“博雅園”組成的三大內容板塊,完美涵蓋了教材、熱點、學考、人文四項英語學習內容,使英語學習不再祇走“前蘇聯”時期的“聽說讀寫”模式,而是更多地去關注學生英語人文素養和綜合技能的提升。“擷英園地”板塊內容的構建也與微信的設計理念不謀而合,有效地避免學習者進行分散、低效率的瀏覽和機械性學習。下圖是“擷英園地”公眾號運營結構與主題分類:



“教學園”由教師負責,依托大學英語各門課程,以教爲主。下設5個二級菜單,其中“英語專業”對應的頁面模板包含《現代大學英語》、《高級英語》、《商務英語》及“教輔資

源”四大類5個三級條目;“大學英語”頁面模板對應《全新版大學英語》、《新視野大學英語》和“教輔資源”三大類5個三級條目;“語言資訊”包含“考試”、“考研”和“資訊”三大類信息欄目;“資料幹貨”提供“雜誌”和“圖書”兩大類電子圖書資源;“歷史精華”則顯示公號歷史群發信息。“擷英園”和“博雅園”分別側重英漢雙語文化背景知識的學習和英語語言基礎知識的學習,各下設5個二級欄目,9個專題欄目由9位對相應欄目感興趣的同學負責,一周至少發帖一次,不設上限,另外一個“繽紛”欄目為51位同學的值日欄目。

這種運營結構搭建了一個合理的學科結構和教學相長模型。按照結構主義教育家布魯納的觀點,“無論教什麼課,務必要使學生理解這些科目的基本結構,這是使用知識、運用知識處理課外問題和事件或者處理日後課堂訓練中遇到的問題的最起碼要求”(Bruner, 1977:11),擷英園地公號的這種運營結構暗合了布魯納的這種教育理念,以教養學、以趣引學、以值督學,並可以將這種“技能遷移到以後無論在校內或校外遇到的問題上”(Bruner, 1977:17),實現了良好的教學效益,受到了廣大同學的一致好評。這種模式在目前已知的同類公號中,尚屬首創。

(二)項目教學視角下的“擷英園地”以編促學效益分析

項目教學法就是在老師的指導下,將一個相對獨立的項目交由學生自己處理,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設計、項目實施及最終評價,都由學生自己負責。學生通過自主掌控該項目的進行,了解並把握項目過程每一個環節需要達到的基本要求。“項目教學法”最顯著的特點是“以項目為主綫、教師為引導、學生為主體”,這是一種師生共同完成項目、共同取得進步的教學方法。“擷英園地”公眾號的菜單設置暗合了英語學科的結構,其每個結構組成都是一個相對獨立又互相關聯的子項目,通過上圖可以看出,該公號上共設置了10個二級菜單,除了“繽紛”屬於輪值項目,由一個同學負責驗收其他同學每天值日發布的帖

子,其他9個二級菜單對應的方向其實質是構建英語學科綜合能力的軟能力(文學文化百科等背景信息)和硬能力(聽說讀寫譯直觀表現語言能力),每個二級菜單都是可以單獨部署的子項目,交托給9個自願負責、學習欲望較強烈的同學,由他們全權統籌、采編,教師祇進行總體的審核,確定不存在錯誤的政治輿論導向或錯誤的價值觀輸送。

經過一學期的運營,項目教學法得到了最大化的收益。在輪值項目中,每天值日發帖的同學都先進行選材,進行信息篩選,以自己興趣為切入點,兼顧內容普適性。然後,由值日生所在宿舍的運營人授權該生登陸公號後臺,進行編輯。這個過程涉及到新媒體平臺的編輯技能,將在下面小節具體論述。整個編輯過程,從錄入(復制粘貼)到排版(對比核實)再到保存,學生獲得的知識和技能要比單純的PPT設計還要豐富多彩且更具有實用價值。通過課上和課下反饋,學生對這種值日形式響應度和熱情度較高,知識掌握度高,同時對英文寫作格式規範有了進一步的了解。課堂上隨機調查,參與值日的所有51位同學贊成第二學期繼續值日的有49位,自願負責子項目運營的同學有17位,表示通過5次(兩個班級各不到30人,同時值日,每月平均一次,一學期5次值日)公號編輯熟悉了英文書寫規範的從學期初調查的0人提高到29人。負責輪值項目驗收的同學除了在編輯過程中的直觀認識較少,同樣也需要對已經編輯好的帖子內容和格式規範進行審核,與其他9位負責其他9個子項目的同學的反饋並無二致,都表示收穫良多,既在微觀上增加了所負責項目展示的內容知識,又在宏觀上獲得了對該項目的整體認識,尤其是對已發內容的搜索去重,防止重發,再進行整合提煉、細分主題。

(三)“擷英園地”英語類公眾號編輯技能的市場需求分析

在互聯網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微信公眾號編輯和職業前景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互動關係。作為一種新形式的自媒體平臺,其運作仍然和勞動力密不可分,其盈利也自然與

編輯操作產生了某種程度上的依存。在這種背景下,筆者以為“編而優則業”是順應時代潮流,從而增加畢業後就業擇業砝碼的正確職業觀,應該加以引導。

“自媒體”是近年和公眾號平臺同步時興的概念,指的是微信公眾號平臺的編輯通過優質內容和強大影響力成為互聯網上的“個人IP”,自帶流量和用戶粘性,這是將個人微信編輯能力發揮到理想狀態所取得成績,是“特殊性”範例。然而,從自媒體戶的成功突圍可以看出微信平臺的一個優勢——針對性,每一個公眾號都有特定的用戶範圍,這一點對於依賴專業技能實現個人發展的大學生而言,有極大利好。例如高校英語學習類公眾號的訂閱用戶大多是高校師生和同類市場觀察員,通過平臺瀏覽編輯者的作品和後臺互相交流,大學生編輯能獲得許多職場徵聘信息以及行業風向動態,而編輯技能突出者很有可能一出校門便可直接通過“內推”獲得工作或者實習崗位,是學生走出“象牙塔”後成為職場達人前的一段時期內,一項剛需性和表現力都比較強的技能,有利于其在職場中脫穎而出。再者,筆者有了解到許多大學生畢業後會找一份副業來補貼生活,而微信公眾號編輯崗位是很多人的選擇,一是因為其不受辦公地點的限制,而是因為編輯容易上手,熟練度提升後工作時長可極大縮短。

僅以“百度百聘”招聘平臺發布的以“濟南”為工作地點的查詢數據為參照,檢索“公眾號”後返回的結果達到4171個,以月薪為指標,制作如下表格:

2000 ↓	2001-3000	3001-5000	5001-8000	8001-10000	10000 ↑	月薪
44	333	1938	1943	671	513	職位數

筆者撰寫這一小節前後進行了兩次檢索,時隔一個小時,檢索結果就從4123變為4171,讀者點擊參考鏈接再次查閱,結果可能與檢索日期所得的結果有所差異,但不會有巨大懸殊。這也說明了市場對於公眾號編輯的需求量之大之迫切。而從上表的數據可直觀得出結論:公眾號編輯的市場潛力巨大,崗位收益不比傳統產業職業低。通過再次設定條件為不同學歷,這4171個公號編輯崗位中

有1836個職位要求最低學歷為大專,782個職位要求最低學歷為本科。其他學歷對應的崗位都呈直線下滑態勢,可見具備全日制高等教育水平是公眾號對編輯人員的最理想和最基本要求。而直接檢索“英語公眾號”,居然也返回了8條結果,月薪跨幅3000-12000。因此,本科生學習公眾號編輯對於其畢業就業有定向儲備作用和重要的加分作用。“擷英園地”通過讓學生值日運營英語語言媒體平臺,學習編輯,首先可以直接習得公眾號運營的基本操作技能,其次,對於其直接從事英語公眾號的編輯全兼職工作,也有直接的影響。

三、“數字鴻溝”與微信公眾號教學面臨的挑戰

“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原指“不同社會經濟層面的個人、家庭、企業和地理區域在獲取信息和通信技術機會方面的差異,以及使用互聯網從事各種活動過程中產生的差異。”(OECD, 2001:5)互聯網未普及時,人與人之間因信息設備擁有量的不對等而形成了一定的認知差距,就是這裏所謂的“數字鴻溝”。現在的“數字鴻溝”已經升級,過多的碎片化信息分散了人的注意力,娛樂化信息的植入消磨了大量時間而形成學習和認知能力上的差距。對於高校師生共建英語學習類平臺而言,這種新時代下的“數字鴻溝”不僅會影響公眾號受眾,還會反過來影響運營者。

首先,從運營角度來看,因為學生編輯的選題五花八門、老師審核精力有限,在沒有進行嚴格的文獻來源記錄和溯源核實情況下,極易在瀏覽和查找海量信息後,仍會出現編輯內容侵權的情況,而後期修改又會花費大量時間,如此便存在海量信息與大學生編輯之間的“數據鴻溝”。

其次,從公眾號平臺受眾角度來看,同一個公眾號的編輯內容和風格往往會出現同質化。為了保持平臺的新鮮感,多數市場英語營銷號會通過插入大量娛樂性內容、贈送福利和舉辦線上線下的活動來維持用戶粘性。因為考慮到高校平臺的規範性、成本和線下組織的問題,高校英語類學習公眾號平臺基本

不會採取這樣的運營策略。這就勢必形成由大量同質化信息導致的運營者和學習者之間的“數字鴻溝”。

再次,從高校教學的本質來看,英語公號仍然是為教學而存在,不應急于開通“廣告主”、“流量主”等利益化功能,以防遠離英語學習和教學的初衷。此外,為避免商業引流帶給師生運營者的壓力,高校英語學習類公眾號也基本不做商業推廣,這就形成了高校英語教學資源和市場海量信息資源之間的“數字鴻溝”。

最後,傳統課堂教學現今仍在高校的大學英語中占主導地位,加上各類英語考證考學的應試壓力的影響,如何保持運營者的積極性也是個需要面對的挑戰。

四、結語

新時代背景下微信公眾號成長為一種親民的新媒體平臺,極大地促進了信息的流動,于此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挑戰。利用這種新媒體平臺,實現英語課堂的翻轉教學成為一種新式的教學模式,能否利用這個翻轉形式促進傳統課堂的效率提升,取決於英語公號創建運營者的宏觀視野和教育教學知識,在這方面,“擷英園地”探索出一條成功的路徑,值得向全國推廣。同時,面對上述挑戰,筆者認為保持高校英語學習類公眾號平臺內容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是其脫穎而出的策略,唯有精專,才能始終獨特,最終由同質化轉變為經典特例。而對於維持用戶粘性問題,可以嘗試從綫上突破,鏈接優質活動或者社群。“擷英園地”平臺就一直進行着假期名著共讀建語料庫項目,第一期項目於2017年暑假結束,成功收回61本中英雙語名著句對文件,並為鼓勵積極性而面向語料市場進行了短期出售,收益充作參與者所在的班級的班費,受到我系師生的一致歡迎。盡管如此,面對高校英語教學大環境的壓力,無論是公眾號運營者還是各院校教學和學習者,我們都有很長的路要走。在web3.0時代初始階段,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趨勢和微信公眾號平臺的獨特優勢互相作用,給大學英語教學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性

機遇,高校英語教學人員應該具備高瞻遠矚的能力,聯系國情,響應一帶一路的倡議,探索多種教學方式以培養具備高水平外事技能的外語類人才和複合型人才,積極利用有發展潛力的新媒體平臺微信公號,將本土互聯網新興技術應用於教學,符合時代發展的趨勢和當代大學生的學習興趣,是對傳統大學英語教學模式的創新和傳統英語教材資源的補充,能夠優化教師課程設置,因此應當鼓勵發展和深入研究。

注釋

① 譯術論壇, <http://www.all-terms.com/bbs/forum.php>。

② http://zhaopin.baidu.com/quanzhi?tid=4139&ie=utf8&oe=utf8&query=%E5%85%AC%E4%BC%97%E5%8F%B7&city_sug=%E6%B5%8E%E5%8D%97, retrieved on May, 14th, 2018.

References

- [1] Bruner, J. 1977.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 Martin, L. 2009. *New Media-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3] OECD. 2001. *Understanding Digital Divide*.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 [4] Xu, H.M. 2017. A Study on WeChat and Its Innovation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4: 263-264.
- [5] Zheng, H.H. 2016. Application of We-Chat Admin Platform in English Teaching for Non-English Majors. *Journal of Hubei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1: 155-156.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Support of New Media Platform

——A Case Study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XYEngarden”

YAN Haifeng QIN Lu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era of web 3.0 witnesses not only the emergence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WOA), a newly-initiated media platform in China, but its wide appl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in the market. Correspondingly, WOA-assisted teaching mo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academic field.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XYEngarden, an open-source English learning WOA operated by members of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of SDUPS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stinctive functions of WOA with regard to its practical appliance and promising prospect in the light of the operating and studying experience, pointing out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WOA oper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WOA; new media; “XYEngarden”

(continued from Page 060, 接060页)

ously recognize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Cultural identity between different ones can be promoted. This will also foster healthy multicultural cognition.

References

[1] Cui, J.X. J. 2004. Cultural Identity and its Origin.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4):102-105.

[2] Deng, X.P. 1993. *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Volume 3). Beijing: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 Fei, X.T. 2007. *Study on Cultures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Beijing: Qunyan Publishing House.

[4] He, Q. 2004. *An Study on Progressivism: To Justify Chinese Culture*.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5] Lier L, 2004. *The Ecology and Semiotics of Language Learning: A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6] Wu, H.C. and Qian, L. 2004. Analysis on the Japanese Education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al during Japanese Invasion against China.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of Ethnic Minorities*, (1): 55-59.

[7] Zhao, L. 2004. The Conflict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The Oriental Forum*, (2):39-43.

Chinese into English Education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ZHANG Yunlong REN Quanq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Lvliang College, Shanxi, Lvliang, 033000

【Abstrac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symbiotic. Language can carry or transmit information and construct the texture of culture, thu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Tracking in the Anglo-American trend of the global culture,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figure out it will undermin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 world outlook and values owing to the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ore objectively, rationally and profoundly. Therefore, it can make an improvement o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between two cultures.

【Keywords】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function of language; cultural identity

1. Introduc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has an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human life. The 'Anglo-Americanization' culture has been caused by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English has become an undoubted world language. However, the Anglo-Americanization trend on global culture does not mea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y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ever. The differences and antagonism between civilizations will continue to exist, even with the hidden possibility of violence (Zhao, 2004:39-43).

However, in China's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Chinese culture is generally miss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mainly composed of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hich is according to 'the English Syllabus of English Majors in higher schools' issued in March 2000. Although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et up the courses related to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great Chinese language",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se courses. In addition, even when talking to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ourses in the professional English education, we have to face the outdated content, the stereotyped formation and the single angle of view. Th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a kind of irrational and emotional resistance, which totally affect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Considering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e choose the work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writers for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aspects of the Anglo American coun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at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no strict division of professional direction

①張雲龍,男,本科在讀

②任泉清,男,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翻譯和跨文化交際

at the stage of bachelor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courses offered by English majors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the history, culture, religion, economy, politics, and other aspects in the Anglo American countries. After class, students' self-learning is still dominated by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s, while Chinese culture is more difficult to take up enough space. In order to enlarge vocabulary, learn native English and increase the common sens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es, teachers ask students to read enough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bility and practice oral English, the students need to study much more BBC, VOA, and great speech by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resident or other politicians.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Language carries, disseminates and constructs culture. English learning is the learning and edification of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culture.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What is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view angles, language has different definitions. The structuralist linguists, represented by Saussure,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a symbolic structure system consisting of a stable, abstract language knowledge system known as 'langue' and a specific, individualized one named 'parole'. It is not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itself. The people who study instrumental linguists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the immedi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Their interest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texture of language when language acts as a strong tool. The functional linguists believe tha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symbiotic and language has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s. It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Thus it has the function of carrying, inheriting and constructing culture. Language is the link to main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people or the country.

Identity includes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fication, self-identific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so on. But the cultural identity is of great essence. On the one hand, it is because of the cont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prevailing in the nation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 identity. On the other hand, culture identity contains self-identity or role legitimacy, which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culture. Self-identity and role legitimacy can only be meaningful in a certain culture (Cui, 2004, 102-105). To own same culture, that is, using the same cultural symbols, following common cultural ideas, adhering to common thinking patterns and behavior norms, is often the ba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Throughout history, the weapons used to eliminate or exterminate a race include language. The choice of the language actively or passively is because the cultural bearing,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anguage.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identification mark of people belonging to a group. It plays a role of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Lier, 2004).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the strategy of "dying its country and dying its soul first" was adopted to enslaving education in the occupied area of Hebei. By strengthening Japanese education through various way,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Japanese curriculum in daily teaching, assigning Japanese teachers,

compiling textbooks, strengthening the atmosphere of Japanese teaching and so on. By this way to weak the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boycotted. The teachers used automatic filtering and no teaching methods to teach language (Wu & Qian, 2004, 55-59) in the contents of enslavement in textbooks. These events are enough to show that language learn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can be achieved to some extent through linguistic coherence. English Majors' student actively learn language. However, the initiative and passive language learning will not affect the cultural function of the language. English learning is still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In the peace age, the language learners' cultural awareness may be much weaker.

3. The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to English Majors

(1) The need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majors will help students accept the excellent componen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critically and take the essence to their dross. It helps students to look at Chinese culture objectively, cultivate national emotions, establish national self-esteem, and cultivate their national self-este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oster and recognize the national culture. Deng Xiaoping once stressed that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us, in the third world, if we have no national pride and do not cheris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own nation, China cannot stand up' (Deng, 1993). Students of English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culture of Eng-

lish speak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Anglo Ame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customs, religious beliefs and values.

The western values permeate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major courses, which imperceptibly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deology. The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will affect the identity of the educated people. Here, we take Chinese and Western moral values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refer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erms of moral values, Chinese culture holds that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courtesy, wisdom and fait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while western ethical values trust "wisdom, courage, restraint and justice". Chinese culture holds that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enevolence reacts on people and aims for love. Love also enriches humanity as a universal value from the family to everyone in society. We know that China has been a farming socie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ich has led to such situation that the neighborhoods are similar to our family members thus we need to treat them as family. Wisdom is a very important value. But wisdom is worthy to pursue only when being under good will. Brave is a most precious quality in the western culture. Because the ba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akes a nation have to go far away to find habitat to survive, fight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allenge the environment. Thus the features of the western people are forbearance and cruelty. Bravery is not the most praising for the Chinese. In the Daoism doctrine, the quality of bravery is even rejected. Laozi thought to be brave is easy to kill, which may led to bad result. Of course, China

traditional values doesn't exclude courage. The Confucian advocates fidelity, piety, honest, shame and courage. But courage is affirmed only for justice while meaningless brute courage is condemned.

Through the above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can see that the foundation of a civilization system cannot be easily abandoned and replaced. The materials and regulation can easily imitate and set as models, but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e is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he core ethical valu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their own growing soil and all exist for centuries. The blind accepta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al value system and the denial of our own culture will lead to the terrible "cultural hemolysis". Therefor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ll enhance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deology.

(2)The need for mutual recogni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a relationship, identity inevitably includes the identifier and things be identified. This process is a two-sides and interactive, equal procedure. Those unidirectional and one-side identity cannot be truly established between people or even in society. Fei Xiaotong called the "self-knowledge" as "self-awareness" of the main body of his own cultur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 difficult process to aware. First, we must understand our own culture and various cultures. In the culture world, we should gain our own position and adapt ourselves to other cultures. Without enough communication on both sides, it i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culture identity (Fei, 2007).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English majors are focused on the systematic and original introduction o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economy, politics, religion, culture, values,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so on. If Chinese culture is not the base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is even not critically accepted in contrast, students who study English majors are likely to have a failur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become a preacher of western culture rather than propagandist of Chinese culture anymore. Meanwhile, with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we can look at Chinese culture more objectively and take its essence to its dross. Retrospecting the history of China, we once thought that our culture was a universal culture and an excellent one. However, 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the door of China, we had to examine our own culture. We changed the altitude from technology leaning to overwhelming western ideology learning which is overcorrected. Then we varied view from whole Soviet Union style learning to anti-imperialist and reversion. It is clear that we make mistakes not only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y', but also of 'we'. In fact,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s also the needs of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of learning. They profoundly are to ask, "who am I?", "Who is the Chinese?" and "Where will China go?". In November 2013, a survey of 523 English Majors in a university in Shanxi showed that 89% of the students believ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Thus, students have an internal needs of learning Chinese culture. They want to find the position of 'us' in a grand cultural coordinate and find position of 'they'. It also reflects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identity.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other, can we more rational absorb the essence of both our and their cultures.

(3)The need for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is a necessary to take an objective view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s and thus identify each culture. However, in fact, Chinese culture of English content is almost blank. Many young Chinese scholars with fluent English capability still cannot show the profound cultural quality and independent cultural personality which they did master when communicate with the western people. The phenomenon of lack of culture accumulation is popular among Chinese scholars [7]. This may cause one side obedience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make students have a profound national culture and ensure the equal statu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additi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ans absorption and broadcasting. Because communication itself is bilateral rather than unidirectional. "Every culture is self-dependent against others. It should be resisted in communication. If it does not, there is no longer anything that belongs to it." Strauss said. Your own things can communicate" (He, 2004).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r. Chen Yinque once said "on the one hand, to absorb the input of foreign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do not forget the status of the original culture".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akes the College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

tion shoulder bo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ternal identifi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space expans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this way, English majors' students can have a sense and ability to bridg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inally, we want to emphasize that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majors and taking Chinese culture as the essential component of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not to weaken the status of English culture in English majors. On the contrary, with Chinese culture as a reference, students will be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in understanding the Western Culture, stimulating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nglish majors. Ther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rough intern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external cultural tolerance, is also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English teaching.

4. Conclusion

Language has the functions of cultural bearing,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Language learning is also the learning of its cultur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lack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ll greatly mislead students'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world and values.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is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versus Western culture contrast are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nation. It will enhance students' national pride and cultivate their ambitious national spirit. Students will spontane-

(To be continued on Page 055, 轉 055 頁)

情境教學法提高現職幹部外語交流能力的實踐與研究

——以赴孟加拉培訓教學為例

趙寶榮^①

海軍大連艦艇學院基礎部外語教研室 遼寧大連 116021

摘要: 隨着海軍官兵承擔的外事任務越來越多,對其外語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然而筆者在孟加拉執行任務期間卻發現,有些官兵不但缺乏相關的英語知識,而且缺少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為改變這一現狀,本文將以赴孟加拉培訓時使用的情境教學為例,探討在為部隊官兵進行英語培訓的過程中使用情境教學法提高其外語交流能力的可行性,從而證實情境教學法是提高現職幹部外語交流能力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

關鍵詞: 任職幹部;情境教學法;外語交流能力;實戰化教學

一、引言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要全面推進國防、軍隊和軍事人員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必定要求官兵出色的外語交際能力。然而在孟加拉執行軍貿任務期間卻發現,有些官兵不但缺乏相關的職業英語知識,而且缺少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一直以來,部隊在不斷的摸索為官兵提供高效的英語培訓模式。但結果證明,培訓的效果並不盡人意。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急需改革。本文以赴孟培訓教學為例,探討在為部隊官兵進行英語培訓的過程中使用情境教學法提高官兵的外語交流能力的可行性,同時也是進一步落實實戰化教學改革需求、深入開展實戰化教學改革活動的有益探索。

二、情境教學法介紹

(一)情境教學的定義

情境教學法(Situation Approach)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有目的地引入或創設生動具體的場景,以引起學生一定的態度體驗,從而幫助學生理解教材,并使學生的心理機制能得到發展的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的核心在於激發學生的情感(百科)。這正好驗證

了蘇聯著名教育家贊可夫的一句話:要讓學生把“學習當作自己切身的事情,而不是強加給他們的任務”(贊科夫,1980:46)。因此,情境教學法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實戰化教學模式。

(二)國外情境教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1989年,布朗(J.S.Brown)等提出了“情境性學習”的概念。該概念認為“情境通過活動來合成知識”,即知識是情境化的,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它應用于其中的活動、背景和文化的產物(陳琦,1998:49)。1996年,《情境學習的觀點》一書的問世,標志着情境認知與學習理論研究的突破,主要表現在情境學習與計算機教育、以及一些案例研究與開發等等(王文靜,2002:52)。國外對情境教學法研究的比較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研究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

(三)國內情境教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現當代,情境教學的研究起源于中國著名的兒童教育家李吉林,她從1978年,開始情境教學的實踐探索與研究,並將情境教學運用到小學語文課堂上(田慧生,彭小明,2006:45)。迄今,情境教學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主要研究如余玉春的《新課改

^①趙寶榮,男,講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英語語言與文學

背景下的情境教學》(《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7期)中分為啓動思維式情境教學、主題式情境教學、“助興”式情境教學等等(黃艷, 2016)。但不可否認, 情景教學研究也出現了“高原現象”, 暫時處於停頓狀態。為推動情境教學進一步深入發展, 情境教學的發展有待於改進研究現狀, 拓寬研究的範圍, 深化研究的內容。

三、潛艇部隊官兵英語現狀、培養方式及存在的問題

為了更好地調整和改進基層部隊官兵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培訓模式, 筆者通過觀察、反思和訪談的形式調查潛艇部隊官兵的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和目前所使用的英語培訓模式, 發現存在如下問題。

(一) 潛艇部隊官兵缺乏學習英語的興趣和積極性

部隊官兵走上工作崗位以後, 長時間不接觸英語, 學習英語的興趣也逐漸降低。在孟加拉培訓過程當中發現, 一些官兵上培訓課時缺乏自信心, 課上出現了跟不上聽不懂的現象, 久而久之學習英語的興趣就越來越少, 於是便放棄了英語學習。通過了解得知, 一些官兵因為自己的英語發音不標準, 所以不願發言, 長此以往, 也漸漸的失去了學習外語的興趣。以上種種原因導致了學生英語學不好, 學習興趣不高。衆所周知, 外語交流能力提高的快與慢和學習興趣有很大的關聯。所以, 提高官兵學習外語的興趣和積極性對提高官兵的外語交流能力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 潛艇部隊培養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創新性不夠

潛艇部隊官兵的培訓基本上採取不分層次的合班式教學, 而且培訓時間相對較短, 由於合班上課班級人數較多, 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 因此通常在為部隊官兵培訓時運用講授法取代任務驅動法、產出導向法和情境教學等能更加引起學生興趣和積極性的更加高效的教學方法。因此, 基層部隊培養英語綜合應用能力的創新性不夠也是

阻礙官兵外語交流能力提升的又一大障礙。由此可見, 海軍基層官兵需要教員運用新的教學方法和手段來提高他們的外語交流水平。

(三) 潛艇部隊的英語應用能力培訓缺乏有效性

基層部隊的英語培訓缺乏系統的長期規劃, 而且在教材選擇和內容設置上不夠合理。官兵的學習和工作時間衝突, 並且沒有完善的英語培訓管理和監督機制。作為一名普通的軍校教員我們沒有辦法改變既定的事實, 我們祇有從自身出發去考慮如何提高部隊官兵培訓的有效性。培訓教員是部隊官兵培訓的主導, 教員的素質和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培訓的質量。為部隊培訓的教員除了要有較高的熱情、感染、激發官兵學員的積極性, 還要有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和方法來提高官兵學習的興趣。

四、英語培訓中情境教學法的優勢及其培養策略

(一) 海軍部隊在英語培訓中採用情境教學法具有的優勢

部隊官兵英語運用能力的培訓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問題, 但在海軍部隊英語培訓中運用情境教學法進行教學仍具有一定的優勢。一是海軍部隊各級領導重視官兵學習英語的積極性; 二是官兵個人充分認識到提高外語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三是海軍部隊官兵運用外語交流的機會增多。

(二) 海軍部隊在英語培訓中採用情境教學法的培養策略

針對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筆者將在這裏探討提高海軍基層部隊官兵學員英語素養的情境式教學模式及策略。

1. 運用角色表演走進情境

教員應當選擇貼近官兵生活和工作的口語交際內容, 採取為他們所熟悉的、喜愛的方式, 讓官兵邊表演邊進行口語交際。如, 在孟加拉培訓教學時, 設計的引水情境。因為實用性較強, 官兵們學習興趣十足。

2. 模擬真實情境

創設恰當的口語交際情境,能激發官兵的興趣,引發交際的欲望。因此,教員要借助場景、錄像等手段在課堂上營造一種氛圍,把官兵帶入真實的情境,幫助官兵進入角色。下面以一個口語交際內容為例,談談怎樣模擬真實情境。題目為《看醫生》,教學時創設一個在孟加拉醫院就診的情境。由官兵分別扮演一名生病的中國艇員和孟加拉軍醫。官兵通過表演,演繹一個在國外醫院看病的情景。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以看病為主體的情境,由于這是一個在孟加拉執行任務過程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因此具有實踐意義。由于教學情境来源于官兵的真實生活,着眼于幫助官兵解決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因此不僅提高了官兵的聽說能力,而且培養了官兵良好的交際素養。

3. 提供典型案例

案例本身就是一個交際的情境,提供典型案例讓官兵去交流、討論、發現,不僅可以對案例形成個人獨特的見解,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培養官兵的口語交際能力,形成敢于大膽發表自己觀點的習慣。以損管操練中的某倉失火為例,讓大家用英語談一談滅火的步驟。這個案例十分典型,官兵通過這個典型案例的學習,會把用到的英語記憶的相當深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用實物創設情境

直觀形象的實物,能吸引官兵的注意力。如一位教員在講解常用工具時,帶上了一個真實的工具箱,裏邊裝滿了各式各樣的工具。由于課堂上體現了具體的實物,學生覺得很感興趣,參與課堂活動的積極性不斷高漲。因此,消解了官兵口語交際的為難情緒。

五、結語

目前,軍校的廣大教育工作者正在努力探索適合部隊官兵和任職幹部并能提高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的教學方法。情境教學法正是這種可以增強學員學習興趣和提高學習效率的教學模式,它對海軍部隊官兵的培訓和促進現在和未來的海軍任職幹部英語

交際能力的提高都具有現實意義。實踐證明,這種教學方式符合當前教學實際情況,值得推廣應用。

References(參考文獻)

-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8543#sub1268543>
- [2] Chen, Q. 1998. Constructivism and Educational Reform.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3:49.
(陳琦, 1998. 建構主義與教學改革,《教育研究與實驗》,第3期,第49頁.)
- [3] Huang, Y. 2016. *Study on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Secretary Writ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 Master's Thesis. Hu Nan: Normal University.
(黃艷, 2016.《高職文秘專業秘書寫作情境教學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4] Tian, H.S. and Peng, X.M. 2006.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ystem of Situated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9:45.
(田慧生, 彭小明, 2006. 情境教育的理論框架與操作體系—讀李吉林文集有感,《教育研究》,第9期,第45頁.)
- [5] Wang, W.J. 2002. Situated Cognition and lear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Global Education* 1:52.
(王文靜, 2002. 情境認知與學習理論研究述評,《全球教育展望》,第1期,第52頁.)
- [6] Chan, K. 1980. *I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Beijing: Cultural Education Press.
(贊科夫, 1980.《教學發展》,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Improving Naval Officer'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with Situational Approach—A Case Study

ZHAO Baor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Office, Dept. of Academics, Dalian Naval
Academy, Dalian, Liao Ning, 116021*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foreign affair tasks carried by the navy, the requirement of the English communicative ability is higher and higher. The author in Bangladesh during the mission, however, found that some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are not only lack of releva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glish, but also lack of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learning English. To change this condition, the article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training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with situational approach in the context of the case study. Thus, it is proved that the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servicing officers.*

[Keywords] *naval officers; situational approach;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English; practical teaching*

(continued from Page 067, 接 067 页)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the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Stray Birds*

YAN Yunxia ZHENG Ding LI Zhengshuan

Hebe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Different social and ethnic groups have different social culture,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of Tagore's *Stray Birds* in China for nearly one century have brought certain influence to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takes Zheng zhenduo's and Fengtang's translated versions as examples, through a contrastive analysis, it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different translated versions l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orientation, therefore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iterature and the spread of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Tagore.*

[Keywords] *cultural orient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literary translation*

文化取向與翻譯策略

——以《飛鳥集》兩漢譯本為例

嚴雲霞^① 鄭丁^② 李正栓^③

河北外國語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24

摘要：不同的社會與民族擁有不同的社會文化，泰戈爾的《飛鳥集》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翻譯與傳播給中國現代文學帶來了一定的影響，本文主要以鄭振鐸與馮唐兩漢譯本為例進行分析對比，探討《飛鳥集》不同的文化取向帶來的不同的翻譯策略以及不同的翻譯版本，從而更好地推進國內新文學的發展和泰戈爾文學思想的傳播。

關鍵詞：文化取向；翻譯策略；文學翻譯

一、引言

《飛鳥集》是印度詩人泰戈爾享譽世界之經典，詩詞簡潔優美，飽含哲理。詩集于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首次譯介到中國，深受中國讀者的喜愛。盡管鄭振鐸于1922年翻譯出版的首個中譯本對中國的語言、文化及文學發展影響深遠，甚至被視為經典，不斷被刊印。但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積澱却吸引着衆多譯者對其進行復譯，并在國內引起關注與討論。在對國內泰戈爾《飛鳥集》研究的統計基礎上，發現學界已不乏對泰戈爾及《飛鳥集》的研究，但是對關於其文化取向及所帶來的翻譯策略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系統。

譯本的不同根源在于兩種文化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在某一文化中屬於不言而喻的詞語到了另一種文化中却常常令人難以理解（張波，2010:25）。正是因為翻譯涉及到兩種不同語言中的兩種不同文化的轉換，我們結合中外一些頗具影響的翻譯理論，通過對比分析鄭振鐸與馮唐兩種譯本，結合王獨清、陸晉德、白開元、吳岩等譯本進行量化統計和比較分析考察譯者在語言、意象、韻律、文體及風格等方面不同的處理方式，考量譯文在形式、內容和文

化方面的再現和移植的程度，旨在闡明文學翻譯中翻譯策略的應用通常體現譯者的文化取向和譯本的文化地位。

二、《飛鳥集》不同翻譯版本比較

評析《飛鳥集》的思想意旨和藝術魅力。泰戈爾的《飛鳥集》共收錄325首短詩，文辭清麗，感情真摯細膩，修辭多樣且思想內容豐富，是泰戈爾思想的精華。其深邃的思想意旨和非凡的藝術魅力不容小覷。王獨清的詩，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浪漫中帶有頹廢朦朧的思想和情調；陸晉德譯本選擇的詞匯更具詩歌的特點，遣詞華麗、富有詩意；白開元譯本淡化了個性，強化了共性；淡化了民族性，強化了世界性；由于鄭振鐸處于新文化運動的早期，翻譯處於“忠實于原文內容”的文字翻譯階段，所以他譯詩時採取的是“異化”翻譯策略；在詩集中大多采用直譯的方法，保留了原作的表達方式，忠實于原作的內容，盡量做到不增譯，不漏譯。而馮唐處于現代化的當今社會，他選擇的是“歸化”的翻譯策略。

《飛鳥集》翻譯的時代特徵。受時代因素的影響，譯者對翻譯的理解不同，採取的翻譯原則也不同。五四時期，鄭振鐸先生提出新文學

①嚴雲霞，女，副教授，文學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與翻譯

②鄭丁，女，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青年與青年組織研究

③李正栓，男，教授，碩士生導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英美詩歌教學與研究、英漢詩互譯及評論

基金項目：本文為河北省教育廳2017年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重點項目“鄭振鐸與馮唐漢譯泰戈爾《飛鳥集》翻譯策略研究”的最終研究成果，課題編號：[SD172022]

應肩負改造舊文學和改造舊人生的雙重任務，他積極譯介外國文學，總結翻譯經驗，首先系統地翻譯了該詩集。

鄭振鐸的譯詩整體上語言準確性把握得很好，唯一的遺憾就是大多是不押韻、略顯寡淡的散文體，而馮唐認為：“詩不押韻，就像姑娘沒頭髮一樣別扭（馮唐 2015:335）”。但是在翻譯《飛鳥集》第二百一十九首的時候，鄭振鐸採用直譯的方法，原文：Men are cruel, but Man is kind. 鄭譯：獨夫們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鄭振鐸，2014: 116）。馮譯：庸衆是殘酷的，每個人是善良的（馮唐，2015: 219）。此處筆者認為men 譯為人類，man 譯為人性較妥，即 humanity。

《飛鳥集》翻譯的漢譯特色和原則。鄭振鐸的譯詩或由於時代原因，譯詩稍有木訥，吳岩譯詩整體上用詞較好，用漢語表達出了一種無與倫比的美，但個別用詞較平白。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 which have
no song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鄭振鐸譯文：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飛去了。

秋天的黃葉，它們沒有什麼可唱，祇嘆息一聲，飛落在那裏。

吳岩譯文：夏天離群漂泊的飛鳥，飛到我的窗前鳴嚶歌唱，一會兒飛走了。

而秋天的黃葉無歌可唱，飄飄零零，嘆息一聲，落在窗前了（段金燕，2008: 21）。

其中，鄭譯中沒有完全譯出 stray 一詞所表達的飛鳥的狀態，兩者都沒有譯出 flutter 飛鳥鼓動羽翼的動作；吳譯中“飄飄零零”略有破壞秋的靜謐之感，“一會兒”又將突破時空的妙想變得乏味，原句中 sign 一詞傳達了一種落葉落下時沉寂的韻律。整個詩句中展現的秋與冬、飛鳥與落葉所傳達的在靜默中開啓自然景象的鑰匙的意象，由靜而動。春夏秋冬、風風雨雨，萬物在心靈之窗前輕盈地掠過的景象盡收于窗前。

O troupe of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leave your footprints in my words.

鄭振鐸譯文：世界上的一隊小小的漂泊者呀，請留下你們的足印在我的文字裏。

馮唐譯文：現世裏孤孤單單的小混蛋啊，混到我的文字裏留下你們的痕迹吧（湯婷，2014: 36）。

鄭振鐸譯文中 little vagrants of the world 譯為“一隊小小的漂泊者”，佶屈聱牙。由於鄭振鐸當時所處時代因素的影響以及當時國內對泰戈爾研究的局限，使得譯文在文化呈遞上和語言表達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他傾向於直譯，他認為最好是“一面極力不失原意，一面要譯文流暢”，然而他又反對“死的，絕對的直譯”。忠實於原文思想內涵，哲理意味，寫作風格，及語句的流利，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靳哲，2011: 12）。譯作將詩人的思想情感，詩的藝術美，都再現於譯文之中，充分體現了鄭振鐸的翻譯理念。而馮唐則譯為“孤孤單單的小混蛋”，則帶有現代社會中小痞子的口吻；至於 little vagrants 譯為小小的漂泊者還是地位卑微的流浪者，不同時代的譯者有不同的認識。他嘗試用凸顯詩意境界的翻譯方式，借助其富有節奏、韻律感和凝練的文字技巧，詮釋着他對泰戈爾詩歌新的理解。

在選詞上，不同的譯者對詞匯的選擇各具特色。但不管怎樣，譯者選的詞應符合原詩散文的文體特點，達到原文本所產生的美學效果。正如許淵衝對詩歌翻譯提出的“三美論”理論一樣，選詞要符合原文風格。通過鄭振鐸與陸晉德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出兩位譯者對修辭的處理方法很一致，基本上都保留了原文本的修辭格。不過鄭譯本在用詞和句子運用上更加樸素，力求達到最大程度的忠實。而陸譯本，更加注重詩歌的文體風格，遣詞更華麗，富有詩意，句式運用上更加靈活，但其對原文本的忠實度不如鄭譯本，甚至出入比較大（封芬，2014: 80）。

《飛鳥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自五四時期《飛鳥集》被譯介到國內，其語言、形式、內容

及思想理念便影響了國內的許多作家。從20世紀二十年代中期起,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不少體裁像《園丁集》《新月集》《飛鳥集》一類的作品,這其中有沈尹默、劉半農、冰心、魯迅、郭沫若、瞿秋白、徐志摩等人的作品(王珂,2003: 32)。如冰心的詩集《繁星》與《春水》便是受到《飛鳥集》影響,而且在當時我國的文學界掀起一場小詩創作高潮,有力推動了我國新詩的發展,新文學的建設。冰心寫了頗有影響的《寄小讀者》,便是最好的例證。郭沫若是中國新詩第一人,稱自己文學生涯的“第一階段是泰戈爾式的”。

三、討論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譯者使用的翻譯策略方面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譯者處在不同的場域,擁有不同的資本和帶有不同的慣習而造成的。具體來說,譯者在原語文化語境或譯語文化語境中處於不同的位置,譯者所擁有的資本不同以及長久的語言文化形塑作用使其具有各异的持續的慣習,使翻譯動機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翻譯文本的選擇有了不一樣的標準與傾向以及翻譯策略的不同取舍(劉立勝,2012:11)。

四、結語

了解《飛鳥集》的思想意旨和藝術魅力是把握漢譯《飛鳥集》的重點所在,是評析漢譯本的前提。鄭振鐸與馮唐兩人不同的翻譯方式與兩人的翻譯理念有着密切的聯系,通過鄭振鐸與馮唐漢譯本的比較,來看翻譯策略對原作思想表達的影響,以及不同時期不同譯者對語言的使用的情況,從中我們窺探出了時代以及個人背景對作品再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

References(參考文獻)

- [1] Fan, Y.Y. 2009. The Effect of Translation Method for Translator by Cultural Tro-
pism, Hubei, *Guide Journal of Science and Edu-
cation*.
(樊元元, 2009. 文化取向對譯者翻譯策略
的影響, 湖北:《科教導刊》.)
[2] Liu, M.Q. 1999. *Outlin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Wuhan, Hubei Educational

(劉宓慶, 1999.《文化翻譯論綱》, 武漢: 湖
北教育出版社.)

- [3] Liang, Q.Q. Wang, G.F. 2016. The
Comparison Between Zheng Zhenduo's Stray
Bird and Feng Tang's Stray Bird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Translator's Purpose, Anhui, *Anhui
Literature*.

(梁晴晴, 汪桂芬, 2016. 從譯者目的比較
鄭振鐸譯《飛鳥集》和馮唐譯《飛鳥集》, 安徽:
《安徽文學》.)

- [4] Liu, H.T. Fang, Y. 2017. On Loyalty
Principle and Stylistic Deviation of Poetry
Translation: Take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 of
Stray Bird as Examlle, Zhejiang, *Zhejiang Uni-
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
es Edition)*.

(劉海濤, 方昱, 2017.《忠實原則與詩歌翻
譯的風格變異: 以〈飛鳥集〉三個譯本為例》, 浙
江: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 [5] Li, J.Y. 2007. Thoughts on Tagore's
Works in China and Status Quo of Translation,
Jiangsu,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李金雲, 2007.《泰戈爾作品在中國的研究
及翻譯現狀的思考》, 江蘇: 蘇州科技學院學
報(社會科學版).)

- [6] Yang, F. 2017. On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Perspective of Skop-
o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tray Birds and the
Crescent Moon, Shenyang,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楊帆, 2017.《從目的論視角看鄭振鐸的
翻譯實踐——以〈新月集〉和〈飛鳥集〉為例》,
沈陽: 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7] Zhou, X.Y. 2016. Analysis of the Dif-
ference Among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Stray Birds, Fujian, *Journal of Minjiang Col-
lege*.

(周心怡, 2016.《〈飛鳥集〉譯本對比賞
析》, 福建: 閩江學院學報.)

(To be continued on Page 064, 轉 064 頁)

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視角、模式和方法

——以《句法文體視角下的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為例

焦鵬帥^①

西南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針對意識流小說的漢譯，本文以《句法文體視角下的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2015)為例，從主要內容、研究特色、學科意義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指出該著運用跨學科理論進行“文本細讀”式翻譯問題現象分析、描寫和闡釋，避免了“論理分家”的問題；該書採用問題描寫+闡釋+解決方案探討“三位一體”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對譯學研究、文學批評和文學翻譯實踐等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意義與實際應用價值。

關鍵詞：意識流小說；伍爾夫；“描寫+闡釋+解決方案”模式；句法文體

前言

作為20世紀初一種獨特的文學流派，意識流小說的語言風格和敘事技巧具有極大的反常規性或者說創造性，其詩性語言所表現的人物意識流和現代經驗歷來是文學界和翻譯界學者關注的對象。享譽世界文壇的四大意識流小說家之一——英國著名現代派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意識流小說具有很高的詩學價值，在法國、中國、西班牙、朝鮮、日本、芬蘭、葡萄牙等許多國家或民族的譯介均得到研究(王林, 2013: 131)，這說明對其翻譯的探討具有較大的理論與實際應用價值，值得引起譯界、文學批評和文化界的重視。

然而，現有伍爾夫小說翻譯研究多限于對部分翻譯問題或現象的描述，且不少討論存在直覺印象似評論的弊端，缺乏基於現代語言學、翻譯學、實證研究及其它學科理論的相對客觀而系統的描寫和分析。伍爾夫的很多作品在中國都有翻譯，甚至重譯，但其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却明顯不足，這與喬伊斯、福克納的意識流小說漢譯在學界所受到的重視形成強烈反差。現有關於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的研究多為單篇論文，案例研究相對比

較零散，亦缺乏文學批評所需要的文本細讀式譯本研究。在這種背景下，王林博士的專著《句法文體視角下的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2015，簡稱《研究》)的出版可說是國內比較系統的伍爾夫小說漢譯研究專論，值得引起文學翻譯和文學批評界的關注。本文以《研究》為例，從其主要內容、研究特色、學科意義等方面探討意識流小說漢譯的視角、模式和方法，希望為英美文學作品的漢譯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1. 主要內容

《研究》為英文著作，全書共六章。

第一章緒論部分交代了該研究的背景、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所運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理論框架及全書構架。作者首先指出從句子結構的視角對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的必要性，繼而說明該研究將運用功能文體學和敘事學中的相關概念如小句及物系統、“前景化”、“陌生化”、“敘述聲音”和“敘述視角”等對伍爾夫小說中的詩性句子結構和語言特徵進行分析，闡釋其所創造的文體敘事效果。同時，緒論交代了以描述翻譯學中的規範論為理論框架對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中的問題或現象進行闡釋的必要性。第二章在對伍

^①焦鵬帥，男，副教授，翻譯學博士，研究方向：翻譯與跨文化研究

爾夫小說翻譯研究進行綜述後重點介紹了該研究所要運用的理論分析工具——功能文體學和描述翻譯學中的“規範論”的主要內容、相關概念和主要觀點。

該書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是研究的主體部分,描述並呈現了該研究的主要發現和觀點。在對《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主要詩性句子結構及其文體敘事效果進行分類分析和闡釋的基礎上,第三章重點考察描述了詩性句子及相關文體效果在漢譯本中存在的翻譯問題。在對翻譯問題進行系統描寫之後,第四章則主要考察制約和影響翻譯、導致一些翻譯問題或現象的背後力量和因素。研究發現,伍爾夫多樣化的詩性句子結構及其所創造的文體敘事效果在漢譯中常常發生失落或變形,而目的語語言規範、翻譯規範、文學規約、文化或意識形態規範等對譯者的制約以及譯者文體意識和文體能力的不足是導致上述翻譯問題的主要原因。

切斯特曼(Chesterman)指出,“基于因果模式的翻譯研究的一個比較有用的實際結果是其研究發現或成果可應用于譯者培訓和翻譯質量保證……如果我們能夠證實成因條件、翻譯輪廓特徵及所觀察的效果之間存在明確具體的聯系,這將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了解如何生產出可以達到預想效果的翻譯產品”(Chesterman, 2006: 26)。故而,該書第五章主要探討前兩章的研究發現對譯者培訓的啓示,試圖為小說翻譯中存在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案,旨在探索翻譯中再現原文詩學語言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本章第一部分探討翻譯規範論之于譯者的重要性,作者認為,可通過對譯者進行規範論的培訓使之了解規範的性質,從而有意識地在翻譯中避免因盲目遵從規範而導致一些翻譯問題。在第二部分,作

者討論了文體學之于文學翻譯的重要意義。作者認為,伍爾夫小說詩性句子在翻譯中出現的很多問題源自譯者對原文語言結構形式的文體效果缺乏足夠的認知能力,因而提出可對譯者進行文體學和敘事學培訓,從而提高其文體意識和文體認知能力,這無疑會對文學翻譯質量具有促進作用。

2. 研究特色

該論著在研究視角、研究模式和寫作手法上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色:

2.1 聚焦句法文體結構

英國小說家及評論家洛奇說,“意義與句子的語言形式極其相關,語序通常是沿着敘述者的思維發展的,句子形式及其意義在翻譯中得到多大程度上的再現是一個有趣的問題(Lodge, 1966: 23)。的確,對於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而言,原文句子的切當翻譯是不可回避的課題。伍爾夫大膽進行語言詩學創新,而句子是其作品文體敘事風格的重要載體,對其句子的切當翻譯至關重要(王林, 2014: 294)。作者認為,句子結構是伍爾夫小說最具詩學創新的語言敘事層面之一,有助于小說多重敘述聲音、微妙的敘述視角轉換、人物形象刻畫及人物意識流表現等多方面敘事效果的創造,以句子結構及其創造的相關敘事效果的漢譯為主要考察對象對伍爾夫小說翻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王林, 2015: 7)。

2.2 理論介紹與文本分析相結合

理論可直接或間接用于指導實踐,亦可作為工具用于對現象進行分析和闡釋。在翻譯研究中,缺乏理論的探討難免給人以直覺印象式的批評的單薄感,所述觀點無法令讀者信服。翻譯研究需要語言學、文學、哲學等其它學科理論的滋養。

20世紀以來,文學翻譯研究越來越需要借鑒文學批評、文體學和敘事學、文化學等學

科領域最新研究成果,以獲取新的研究生長點。如申丹(1995)即是中國大陸率先將文學文體學應用于小說翻譯研究的學者。《研究》善于吸收并運用語言學、文體學、敘事學、翻譯學等相關學科理論的有益成果,將理論運用與文本分析和闡釋密切結合,避免了“有論無理”或“論理分家”的問題。如該書運用韓禮德系統功能語法中的小句及物性理論對伍爾夫小說中的各類詩性句子結構的文體效果進行分析,在理論介紹部分為讀者明確了“句子”的概念內涵,說明該研究在探討詩性句子的文體效果時既考察一個小句的詞序,也考察一個複雜句中多個小句之間的關係,讓讀者了解了“概念功能”、“經驗功能”、“人際功能”等小句及物模式的功能,從而為下文的句子文體效果的分析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

在具體詩性句子的文體敘事效果及其翻譯的分析過程中,作者又恰當地將理論與案例考察相結合,做到了文本分析闡釋有理有據。再如,對小說中重要的人物話語表達方式——自由間接話語(Free Indirect Discourse)在漢譯中的問題進行探討時,作者也較好地運用了敘事學中的“敘述視角”和“敘述聲音”概念對原文和譯文進行文體效果分析和闡釋,使論述更具邏輯性、研究結論更為可信。又如,第四章運用第二章中重點闡述的描述翻譯學中的規範論對小說中的翻譯問題或現象進行闡釋,論證有理有據,避免了現象闡釋理據不足的問題。

2.3 問題描寫+問題闡釋+解決方案的“三位一體”

對翻譯問題和現象的系統分析和描述以及對其成因的探索和闡釋不僅可以深化人們對翻譯的認識,而且對翻譯實踐以及譯者培訓也具有一定的啓示意義。圖裏(Toury)認為:“以翻譯產品為導向的研究如果不考慮與

該產品預計功能的決定力量有關的一些問題,也不考慮由決定什麼是‘適當’的產品的規範所支配的策略問題,是沒有真正意義的研究 (Toury,2001: 13)。切斯特曼 (Chesterman)也推崇“因果模式”的翻譯研究,他認為,“因果模式”包含了“比較模式”和“過程模式”,指出“因果模式”可激勵我們在翻譯研究中做出具體的解釋和預測性假設 (Chesterman,2006: 21)。《研究》採用了翻譯問題現象描寫與成因闡釋相結合的“因果模式”研究,既對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本中的主要問題或現象進行了系統分析和描寫,又探討了翻譯問題或現象產生的根源,如此有理據的“因果模式”翻譯研究自然既有助於翻譯理論的豐富又對翻譯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明確了問題及其成因,解決方案的探討自然具有意義。值得肯定的是該著採用了問題描寫+闡釋+解決方案探討“三位一體”的研究模式,在現象描述、主要成因考察的基礎上,探討解決翻譯問題、提高文學翻譯質量的方案,明確提出對譯者進行翻譯學或文體學相關理論的培訓這一具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建設性意見,從而對翻譯實踐和譯者培訓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這是該書不同于其它譯本研究的獨到之處。

2.4 “文本細讀”式研究

除其它敘事策略的貢獻外,小說文體敘事風格的形成離不開語言的精心選擇和運用 (王林,2017:76),因此,語言研究是文學和翻譯研究繞不開的焦點話題。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是20世紀30至60年代英美新批評文學流派提出的一種重要的文學批評方法,對西方文學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研究方法指細致地研讀文本詞法、句法、修辭和意象等語言形式以解釋原文及意義,“在文學研究和批評中,精深細密的文本細讀是一切形

式的文學研究和批評的起點和立足點”(徐克瑜, 2009: 125)。在經過二十世紀70年代解構主義理論對結構主義的批評、80年代的文化批評及後殖民主義文學批評之後, 文本細讀重新回歸敘事理論研究領域(申丹, 2000: 145), 受到學界的再度重視。文學翻譯研究與文學批評研究密切相關, 適用於文學批評的“文本細讀”研究同樣特別適用於譯本研究。《研究》的突出研究特色之一即是採用文學批評研究中的“文本細讀”法對伍爾夫的詩性句子進行文體分析和翻譯問題或現象的描寫。如該書以“文本細讀”方法分析了小說中的主要詩性句子結構——省略結構(Omission)、隔離結構(Isolation)、倒裝結構(Inversion)、平衡結構(Balance)、重復結構(Repetition)、下指人稱照應(Cataphoric Reference)、偏離副詞串(Deviating Adverb Cluster)等的敘事效果, 通過大量典型案例論證說明了句子結構之于小說文體敘事風格的重要性。在後續論述中, 該書分析並描述了原文詩性句子在漢譯本中發生的失落或扭曲問題: 譯者常將原文破碎的句子結構譯得更為通順和流暢, 將原文的倒裝句子結構“正常化”; 改變或省略原文有意大量運用的標點符號從而導致原文句子結構發生變化; 補充原文有意省略的句子成分, 使之更為“常規化”(normalized); 省略或刪除原文句子中特意重復的成分; 將原文副詞串譯為其它成分或改變其在句子中的位置, 改變原文的“下指照應”(Cataphoric Reference); 省略原文段落與段落間作者有意運用的“*For*”銜接詞等等。細致的文本分析詮釋了句子層面的文體失落或變形可能給小說其它詩學層面的敘事效果帶來損害, 其對於伍爾夫小說中的詩性句子在漢譯中的問題或現象的闡述便較為客觀和科學, 擺脫了直覺印象式的譯學批評方式, 所述觀點讀來令人信服, 顯

示出深厚的譯本研究功底。

尤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除了一般讀者熟知的句子結構如“倒裝”結構、“省略”結構、“重復”結構等, 作者還對伍爾夫鮮為一般讀者熟悉的、本身即屬於結構修辭法的句子結構——“反軛結構”、“隔離結構”、“平衡結構”等及其敘事效果的漢譯給予了重視, 這是現有伍爾夫小說漢譯研究中鮮有得到探討的話題, 可以說是該作採用“文本細讀”法的獨到發現。該作對伍爾夫獨具特色的人物意識流話語表達方式——自由間接話語的語言特徵及其文體效果的詳細分析也很精彩, 對於“以文繪畫”(ekphrasis)修辭策略與句子結構的關係以及這種古老而陌生于不少翻譯研究者的修辭手法在翻譯中發生變形的現象也有深入探討, 這都是該書“文本細讀”方法值得稱道的發現。簡言之, 該書對於文本語言形式的文體敘事效果的分析比較細膩, 從其對句子結構及其敘事效果的詳細分類和分析, 可以看出作者通過“文本細讀”對於伍爾夫作品的深刻理解及對小說詩性語言創新的獨到認知, 該書案例選取經典, 討論精細而富有理據, 所得出的研究發現和主要觀點具有一定說服力, 對於文學翻譯理論研究和文學翻譯實踐具有一定參考借鑒價值和意義。

2.5 實證研究的多樣性

盡管影響翻譯的語境因素非常復雜多樣, 但該研究主要考察可以予以實證的、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控制的主要因素, 以便為更好地傳譯原作風格提供參照。除通過“文本細讀”進行系統的案例分析論證, 並以譯作前言或後記等副文本材料及文學批評現有研究成果為輔助論證材料, 為論證因譯者文體意識或文體能力不足或因其對目的語語言規範、文學規約、標點符號規範、翻譯規範等的盲目遵循而導致原文詩性句子結構未能得到恰當

傳譯,作者還通過一項翻譯實驗進行量化統計分析,探討影響譯者翻譯選擇的文本外因素,多樣性的實證研究使得其研究結果相互映照,確保結論客觀中肯。

3. 學科意義

3.1 豐富和發展相關翻譯理論內涵

圖裏指出,“描寫-闡釋性研究不僅有助於拉近翻譯研究中的應用拓展性分支研究與真實生活行為的距離,減少應用翻譯研究易于表現的‘裝腔作勢’,還有助於在翻譯理論自身完善過程中形成至關重要的鏈條”(Toury, 2001: 264)。因而,描寫-闡釋性研究是于翻譯理論發展與翻譯實踐應用都具有重要價值的譯學研究模式。《研究》對伍爾夫小說漢譯的考察既“入乎其裏”——深入文本進行細致的文本語言及其文體敘事分析,又“出于其外”——超越文本對文本外影響和制約翻譯選擇的譯者、社會文化語境等因素進行探討,將對翻譯問題或現象的描寫和分析與其背後的成因結合起來進行“因果模式”的研究,避免了傳統翻譯研究中割裂文本與歷史文化語境的片面性,因此其研究發現對於“規範論”等翻譯理論內涵的豐富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值得稱道的是,作者在 Hermans (1999) 和 Toury (2001) 對“規範”的定義和分類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規範分類——將制約和影響翻譯活動和翻譯行為的規範區分為三大類: a) 文化交流規範, b) 翻譯規範和 c) 產品規範,而產品規範實際上又與目的語文化中的語言規範、詩學規範、文化規範、意識形態規範、文類規約(convention)等密切相關(王林, 2015: 42-43)。該分類的確更便于對翻譯問題或現象進行闡釋,也可說是對規範論的創新性發展。

該書第四章通過典型譯例分析探討了目

的語文化中文學傳統、語言規範、意識形態規範等對譯者翻譯選擇的制約和影響,對譯者因盲目遵從“通順”等翻譯規範而無意識中損害原文詩學語言創造及其文體效果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同時,對因譯者文體意識或文體能力的不足造成原文詩性句子結構在翻譯中的變形或失落也作了相關闡述。研究認為:譯者對句子的不切當翻譯會造成原作與句子有關的文體風格或文學效果的失落或變形,進而影響作品主題意義的傳遞;目的語文化中的文學傳統、文類規約、語言規範、翻譯規範、詩學規範和文化、意識形態規範等對譯者的影響,以及譯者文體意識和文體知識的不足是造成譯者對句子處理不當,從而導致由句子創造的文體效果在翻譯中發生變形的主要因素(王林, 2015: 287-288)。以上研究發現進一步論證了“翻譯規範論”對翻譯現象的闡釋力,有助於翻譯理論的進一步完善。

3.2 拓展文學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

如前所述,《研究》運用系統功能文體學、敘事學和翻譯學相關理論概念進行文本分析和闡釋,對翻譯問題或翻譯現象進行分析和闡釋,是一項較為系統的跨學科翻譯研究成果。該書在研究視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上都具一定的創新性,其學術貢獻也因而具有一定的跨學科性,可為伍爾夫研究、翻譯研究、文學批評研究、文體學和敘事學研究的發展提供參考與借鑒,進一步從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範式上拓展文學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

4. 不足與前瞻

當然,金無足赤,《研究》也不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影響翻譯選擇的社會語境因素複雜多變,而該書對翻譯問題或現象成因的探討僅局限于各種規約、規範的影響和制約以及譯者文體意識或文體能力的不足這兩大

類,對翻譯現象的闡釋顯然尚待深入。其次,該書對譯者翻譯主體性的探討尚顯不足。切斯特曼指出,情境因素如目的語社會文化因素如翻譯規範“實際上不過是通過譯者的心智對翻譯產生影響”,是譯者對“規範、目的、原文本、翻譯理論等的態度、而不是這些外部因素本身在對翻譯起作用”(Chesterman, 2006:26)。因此,譯者是決定翻譯產品的最主要的力量,譯者研究尤為重要。然而,該書對譯者的有關翻譯實驗雖具有一定的論證力,但有待進行更多譯者或讀者主體樣本的調查。

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還有更大的開拓空間,值得學界進一步從研究範圍、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進一步探討。首先,正如作者本人所指出的那樣,伍爾夫意識流小說的詩性層面更為多樣,該研究僅探討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些結論可能有待更多的研究材料進行論證。因而,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拓展伍爾夫意識流小說譯本研究的範圍,甚至可以對伍爾夫的其它意識流小說漢譯進行研究。其次,對於譯者文體認知能力不足導致原作詩性語言及其敘事效果在譯文的失落或扭曲或可採用譯者訪談的方式進一步論證等。此外,關於對譯者進行規範論等翻譯理論以及文體學、敘事學相關學科知識培訓以提高文學翻譯質量的假設,可進行更多相關實證研究,這應是譯者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5. 結語

《研究》以語言分析為基,借句法文體學為視角,運用“文本細讀”方法,對漢譯問題進行現象分析、描寫和闡釋,查小觀大,獨辟蹊徑地建構起問題描寫+闡釋+解決方案探討“三位一體”的研究模式,其研究視角、模式和方法對伍爾夫小說批評研究、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譯學研究和文學翻譯實踐等都具有

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是一部具有探索意義的文學翻譯研究專著,值得從事翻譯學和文學研究的學者、師生或譯者閱讀學習或借鑒。

Reference(參考文獻)

- [1]Chesterman, A. 2006. A Causal Model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Ed., M. Oloh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5-27.
- [2]Hermans, T.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 Descriptive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3]Toury, G. 2001.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4]Lodge, D. 1966. *Language of Fi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5]Shen, D. 1995. *Literary Stylistics and Fictional Transl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申丹. 1995. 文學文體學與小說翻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6]Shen, D. 2000. The Small Renaissance of American Narrative Theorie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144-148.
- (申丹. 2000. 美國敘事理論研究的小規模復興. 外國文學評論(4), 144-148.)
- [7]Wang, L. 2013. Being in Foreign Lands: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Novel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128-131.
- (王林. 2013. 身在異鄉: 伍爾夫小說翻譯研究綜述. 外國語文, 29(2), 128-131.)

[8]Wang L. 2014. Narrative effect and the Translation of English Free Indirect Discours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2: 294-302.

(王林. 2014. 句子上的叙事: 談自由間接話語的翻譯處理. 外語教學與研究, 46(2), 294-302.)

[9]Wang, L. 2015.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Virginia Woolf'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A Syntactic Stylistic Approach*.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Press.

(王林. 2015. 句法文體視角下伍爾夫意識流小說漢譯研究.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10]Wang, L. 2017. Paled Impersonal Narrative Tint: A study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Generic Pronoun 'One' in Fiction.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4: 76-82.]

(王林. 2017. 失色的非個人化叙事: 小說中的不定代詞one之漢譯研究. 外語研究(4), 76-82.)

[11]Xu, KY. 2009. On the Issue of Close Reading in Current Literary Studies.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tention* 3: 123-127.

(徐克瑜. 2009. 當前文學研究中的文本細讀問題. 文藝爭鳴(3), 123-127.)

On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Novels: Perspective, Paradigm and Method

JIAO Pengshu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aking the book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a Syntactic Stylistic Approach* (2015)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in terms of its major research cont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etc.. It points out that the book is free from the problem of "separating theories from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for its analysis,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or phenomena in a "close reading" way based on some inter-disciplinary theories. Adopting the model and methodology of the trinity of "description + interpretation + solution explor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be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stream-of-consciousness novels; Virginia Woolf; the model of "description + interpretation + solution exploring"; syntactic style

2018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2018 NALLTS)

NO.2 NOTICE

Dear Mr. /Ms. _____,

2018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Teaching (2018 NALLTS) will be held in Hailar City, Inner Mongolia, China. There will be keynote speeches by well-known experts and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share with us your new idea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THEME: "Linguistic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a: Prosperity and diversity"

TOPICS: 1. Frontier Studies o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2. Literary Studie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Research

3. Researche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 Teaching

4.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Northeast Asian Region

ORGANIZER: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HOST: Inner Mongolia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

CO-ORGANIZERS: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CDS International Culture Developing Co. Ltd

New Vision Press

WORKING LANGUAGES: English & Chinese

MEETING FORMAT: 1. Keynote speeches by 5-6 invited scholars;

2. Presentations by participants who submitted papers.

MEETING DATES: Meeting: 23rd-24th June, 2018; Registration: after 2 o'clock p.m. 22nd

(The meeting begins at 9 o'clock on 23rd).

ACCOMMODATION: Hulunbuir Shanshui Hotel (Xuefu Road No. 1, Hailar District, Hulunbuir City).

TRANSPORTATION: From Hulunbuir Dongshan Airport to Hulunbuir Shanshui Hotel

1. After your arrival at the Hulunbuir Dongshan Airport, you can go to the hotel by taxi, which is about RMB 10; 2. After your arrival at Hulunbuir Train Station you can go to the hotel by taxi, which is about RMB 15.

The coming NALLTS will publish 2018 NALLTS proceedings which will be recorded and retrieved by CPCI-SSH and CPCD. Moreover, all of academic papers recorded by CPCI-SSH will have 2017 NALLTS certificates as honor.

Expens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REGISTRATION FEES, please send email to info@nallts.com or 1034501032@qq.com.

Contact: NALLTS Office: 024-31994562 Hao Bo: 15640288993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 0470-3103317 Hu Buqin

Hailar Office of CDS International Culture Developing Co. Ltd : 0470-8133456

Wang Zhiwen: 13947022600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NALLT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lunbuir University

2018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2018 NALLTS) 第二號通知和邀請函

尊敬的_____先生/女士:

2018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簡稱 2018 NALLTS),將在海拉爾舉辦,現誠邀您及各位高校同仁參會,提出新觀點、貢獻新思路、報告新成果。會上將有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作主旨發言。

【會議主題】“中國的語言學、文學、翻譯研究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繁榮和多樣性”

核心議題:1. 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前沿問題研究;

2. 文學研究;

3. 跨文化交際與翻譯和教學研究;

4. 東北亞地區高等院校外語教學協同創新研究等。

【主辦單位】NALLTS 組委會

【承辦單位】內蒙古高校外語教學研究會 呼倫貝爾學院外國語學院

【協辦單位】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華宸衆星(北京)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美國新視野出版社

【會議語言】英語和漢語

【會議形式】1. 主旨發言:國內外知名學者 5-6 人做主旨發言;

2. 分組討論:分4個專題組,入選論文的宣讀和討論(頒發論文宣讀證書)。

【會議時間】2018 年 6 月 23-24 號,22 號下午 14 點開始接待報到,23 號上午九點半開會。

【會議和報到地點】呼倫貝爾市山水酒店(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學府路11號)

【到達路線】1. 呼倫貝爾(東山機場)出租或滴滴打車 10 元到達。

2. 列車海拉爾站,出租或滴滴打車 15 元到達。

本次集結出版2018 NALLTS國際會議文集,進入《社科與人文國際會議錄索引(CPCI-SSH)即ISTP》和中國知網(CPCD)檢索。本次論壇將頒發2018NALLTS論文獲獎證書。關於論文,詳見徵稿啟事。

【會議費用】會務費人民幣 1000 元,研究生 500 元,旅費和住宿費自理,標準間 280 元/間,大床房 300 元/間,合住 140 元/人。請參會者提前將會務費和房費匯到對公賬號(戶名:華宸衆星(北京)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賬號:中國農業銀行北京硅谷亮城支行11251401040002913),同時將參會回執發送到論壇郵箱 m info@nallts.com 和 1034501032@qq.com。回執(網站 m www.nallts.com 下載)截止日期為 5 月 30 日,報到時領取正規發票。參會者需持交費回執編號或房間號報到。

【聯系方式】NALLTS 秘書處: 024-31994562 聯系人:郝博 15640288993

呼倫貝爾學院外國語學院: 0470-3103317 聯系人:張鎖軍 胡布欽

華宸衆星國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海拉爾辦公室: 0470-8133456 聯系人:王志聞 13947022600

論壇網站: www.nallts.com (內有詳細說明和簡介)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組委會
呼倫貝爾學院外國語學院

CALL FOR PAPERS

Business Translation, Periodical of SIBT

“Business Translation” the quarterly Periodical (ISSN 0257-2478), the first and only scholarly Periodical dedicated to business translation studies,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ts inaugural issue at the begin of 2018.

The Periodical is organiz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usiness Translation and Teaching Studies (SIBT), co-organized by ENRP Edu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hosted b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nd published by New Vision Pres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 teaching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suppor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cademic exchange of business translators. The Periodical has been included in CNKI.net and hopefully, will be indexed by CPCI-SSH (ISTP) soon.

Taking paper quality and topic relevance a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publication, the Periodical is inviting papers on an ongoing and year-round basis, specifically,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 Business translation theories, practices, and teaching
-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 Inquiries and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industry
- Reviews on translation works, etc.

Your papers may be written in Chinese, English, Russian, Japanese, Korean, or Spanish, and it should contain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English translations:

- Article title , author name , author school and zip code ,
- Abstract ,Keywords , Correspondence address
-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short biography, one paragraph)

Your submission should be in .doc format, no less than 3 pages; accepted manuscripts are typed with 1.5 spacing and with a font point size of 12 (as submitted in Microsoft Word format); and the reference should follow the APA style, i.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Format (6th Edition, 2009). Since any submissions to the Periodical will be submitted to single-blind review,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list such identity information as the article title, author name, degree, title, and affiliation, and sponsored project only on a separate page.

If your submission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our Periodical, it shall not be published in any periodical(s) elsewher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Please remember that the Editorial Office reserves all rights to refuse submitted work. Therefore, you may be asked to remove extreme graphic material or excessive language, unless otherwise declared ahead. Your submission would be at your own disposal and not be returned in case of no notice for revising or publication within the referring period of 5 weeks upon receiving it.

Editorial Office(China):

Email: sibt_j@163.com ; 123388728@qq.com

TEL:0411-84710460; 13840855218

Add:315, Shixuezhai, No.217 Jianshan Street,Dalian

《商務翻譯》期刊徵稿啓事

為促進中國商務翻譯研究與教學領域的活躍和發展,提高商務翻譯人才培養的品質和效果,學術季刊《商務翻譯》(ISSN 0025-3167)將於2018年初創刊。該雜誌由商務翻譯和教學研究國際論壇(SIBT)組委會主辦,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協辦,美國新視野出版社出版,系全球第一本專門研究商務翻譯的學術刊物。該刊被中國知網(CNKI)收錄檢索,待進CPCI-SSH(ISTP)國際檢索。

《商務翻譯》按照國際學術期刊慣例實行同行專家匿名評審制度,以稿件品質和本刊宗旨作為刊發標準。現面向從事商務外語、商務翻譯等相關教學科研工作的高校教師及商務翻譯實踐從業人員常年徵集稿件:

1. **主要欄目:**商務翻譯理論研究、商務翻譯教學研究、商務翻譯學科建設與發展、機器翻譯理論和實踐、商務翻譯案例、翻譯產業探究、相關翻譯書評、優秀譯文及評論等。

2. **來稿要求:**需遵循一般學術規範,可選用中、英、俄、日、朝鮮語、西班牙語等六種文字撰寫;但標題、作者姓名及簡介、通信地址、摘要及關鍵字等內容請附對應英文。有關正文及參考文獻的格式要求,請參照“美國心理學會(APA)論文格式(第六版)”。

3. **投稿要求:**請以 Word 文檔格式排版(1.5 倍行距,字體大小 12),以 E-mail 附件形式投稿。來稿力求精煉,但不得低於 3 個版面,每版中文 1500 字符。為方便匿名審稿,請作者另頁標注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學位、職稱、單位、資助課題等資訊。

4. **稿件處理:**本刊審稿週期為五周,超過五周末獲通知,請作者自行處理稿件,恕不退稿。對擬刊用稿件,除非作者事先聲明,本刊有權做文字性或技術性修改,或要求作者修改。請勿一稿多投,來稿文責自負。

投稿信箱:sibt_j@163.com;123388728@qq.com

聯繫電話:0411-84710460

編輯部連絡人:鄒靜 18640877276 章愛民 13840855218

編輯部地址:大連市尖山街 217 號 東北財經大學 師學齋 315 室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Calls for Papers

The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s, Literature & Teaching (NALLTS) serves as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to promote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exchange in Northeast Asia (Once a year). The high-quality paper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NALLTS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The New Vision Press. All NALLTS proceeding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PCI-SSH International Index and CNKI database.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NAFLS) is the periodical of NALLTS, which is published by The New Vision Press and co-organized by Dongshirui-pu Educ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Ltd., Co. Included in CNKI. The ISSN is ISSN 0025-7249 and ISSN 0257-2478 (online). As an academic periodical for language experts, scholars and teachers, the content focuses on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periodical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and some of them may enter the CPCI-SSH International Index if they apply and qualified.

Northeast Asia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is a bimonthly periodical which is published on the 25th of the odd number month, that is January, March, and so on. The price is \$6.98.

Columns of the periodical are as follows: linguistics,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evaluation research, graduate BBS, foreign language information and so on.

Each page of the periodical may contain about 1500 Chinese or 3000 English. Three pages would be the minimum publishing coverage. When contribute, the author need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work unit, address, postcode,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the title, abstract and key words of the article. The article can be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but the title, the abstract and key words must b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f the article is written in Chinese).

This periodical is specialized for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special educ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welcome.

Email : nafls@vip.163.com 和 1164026978@qq.com **Website:** www.nallts.com

Editorial Office Abroad :

8414 Opulent Ave, Las Vegas, NV 89147

TEL: 469 867 2050

Email: williamliu0515@gmail.com

Editorial Office in China :

2202, Dejun Mansion, No.217 Huigong Street, Shenyang

TEL: 024-31994562 15640288993

Email: nafls@vip.163.com

期刊《東北亞外語論壇》徵稿啓事

東北亞語言學文學和教學國際論壇(簡稱NALLTS),是立足于東北亞旨在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的國際平臺(每年舉行一次),入選論文由美國新視野出版社出版NALLTS文集,進入《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國際會議錄索引(CPCI-SSH)》數據庫檢索,同時中國知網(CNKI)全文收錄。

《東北亞外語論壇》(NAFLS)為NALLTS期刊,中國知網全文收錄,國際刊號:ISSN 0025-7249和ISSN 0257-2478(電子版),由美國新視野出版社出版,由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協辦,是一份面向外語界專家、學者和教師的關於語言學研究、外國文學研究、翻譯理論實踐、外語教育教學研究和跨文化交際等領域學術期刊。入選本期刊稿件,經作者本人申請和專家組審查合格,可編入NALLTS文集進入CPCI-SSH檢索。

本刊為語言、文學和教育類專刊,欄目設置如下:語言學、外國文學、翻譯理論、外語教育理論、外語教學實踐、評價研究、碩博論壇、外語資訊等欄目。本刊為雙月刊,每逢雙月25日出版,定價:6.98美元。

本刊3版起發,每版中文1500字符,英文3000字符,作者來稿要求提供作者信息,即工作單位、通訊地址、郵編、聯繫電話、電子郵箱,文章的題目摘要和關鍵詞等相應信息。稿件用中文和外文均可,但題目、作者單位、摘要和關鍵詞必須有英文。

投稿信箱:nafls@vip.163.com 和 1164026978@qq.com

論壇網站:www.nallts.com

編輯部(美國):

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華立大街8414號,郵編89147

電話:4698672050

郵箱:williamliu0515@gmail.com

編輯部(中國):

沈陽市惠工街217號德郡大廈2202室,郵編110013

電話:024-31994562;15640288993

郵箱:nafls@vip.163.com

以技能為核心 以就業為導向 助你走上成功之路

中華商務翻譯技能等級考試CBTT

China Business Translation Skill Grade Test

隨著CBTT影響和規模的增大，應CBTT考試各地參考單位要求和資訊科技發展現狀，經上級主管部門同意，自2015年12月起，場地考試和網路考試同時交叉進行。CBTT考試將以專業性培訓系統、科學測評體系，嚴謹的考務流程、統一評卷的新形式，贏得良好的社會效益。頒發中華商務翻譯學會 商務翻譯技能證書，可以網上查詢編號。

一、CBTT考試語種

英語、俄語、日語 及韓語和西班牙語。

二、CBTT報名和考務安排

- 1、到就近的培訓考試基地（考點）報名繳費，領取教材參加培訓後進行場地考試。
- 2、CBTT網上報名繳費。考生可隨時報名，接到教材後按考試管理辦公室統一安排，確定地點和機考時間參加考試。

三、CBTT網上考試方式

與場地考試一樣，各個語種考試由兩個模組組成：筆譯模組和口譯模組。筆譯模組考試時間是60分鐘、自己下載答題紙拍照郵寄；口譯模組考試時間是15分鐘，在電腦或移動終端上答題並現場錄製音頻，後臺評測。

四、CBTT考試級別與報考條件

1. 翻譯員（四級）：由通過公外AB級考試的專科生和各專業本科生及專科高職外語專業學生報考。
2. 助理翻譯師（三級）：由各專業碩士生、外語專業本科生和商務外語專業專科生及持翻譯員證書報考。
3. 翻譯師（二級）：由商務外語專業本科生和外語專業碩士研究生及持助理翻譯師證的考生報考。
4. 高級翻譯師（一級）：由商務外語專業（含外語專業）講師及以上職稱者持翻譯師證書報考，經考評委員會審核確認。

符合報考條件的未通過者，可免費補考一次

五、CBTT考試日期時間

每年5月第二個周日和6月第一個周日14點；11月和12月第一個周日14點

六、聯繫地址

中華商務翻譯學會技能認證研究中心：

100024 北京市塔營北街甲6號信德大廈6407 電話：010-56213728

中華商務翻譯技能等級考試管理辦公室：

110013瀋陽市惠工街217號德郡大廈2202（東師瑞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24-31994562 15640288993 郵箱：info@bflttst.com 1034501032@qq.com

中華商務翻譯技能等級考試網址：www. bflttst.org

QQ:1034501032



培訓考試基地：_____ 電話：_____

聯繫人：_____ 電話：_____



(接封二)

學術講座和主旨發言等,分別由渤海大學程迎新教授、湖州師範學院梁正宇教授、長春師範大學馬建華教授、南京財經大學肖輝教授等主持。

SIBT組委會秘書長丁俊華博士主持閉幕式,吉林華僑外國語學院東方語學院院長王志國教授宣讀吉林省商務外語學會第一屆理事會成員名單并宣布學會成立,吉林省商務外語學會會長楊玉晨教授代表學會講話并代表承辦方致告別辭。

SIBT組委會副主席董廣才教授、楊玉晨教授向第五次SIBT承辦單位大連大學英語學院代表高巍和孫蘊春教授傳遞論壇會旗,高巍院長講話表示,一定要把第五次SIBT辦得更好,大家2019年大連再見。論壇主席張紹杰教授在長沙向大會發來視頻賀辭。SIBT組委會副主席董廣才教授做本次論壇總結并致閉幕詞。



ISSN 0025-7249



9 770025 724694

\$ 6.98